

【本期特稿】

我国经济增长与空间均衡问题

唐杰，戴欣，唐文，袁帅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广东 深圳 518055〕

〔摘要〕中国经济为什么要转型？转型的方向是什么？如何转型？转型面临的难题是什么？这些问题不仅在经济学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也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被讨论着。本文认同我国经济存在着周期性因素，但更关注从长期经济增长角度分析中国经济转型及面临的问题，与此同时，本文尝试从理论和实证研究的角度，提出经济增长理论与空间均衡理论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增长 创新 资产泡沫 空间均衡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623(2017)01-0007-09

〔作者简介〕唐杰（1955—），四川德阳人，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宏观经济学、空间（区域）经济学；戴欣、唐文、袁帅：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济管理学院，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学。

一、导言与文献综述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及其后爆发的欧洲债务危机，使全球经济、贸易与投资增长大幅回落。至今接近9年，全球经济贸易仍未出现明显的复苏。我国经济增长率已经连续7年明显低于过去30年约10%的年均增长率。目前，我国经济下滑已经非常接近底部，L型的中长期增长趋势正在成为共识。这意味着我国经济下滑不再是常规的、围绕相对稳定的潜在增长率的周期波动，而是长期潜在增长率向下漂移的供给侧问题。外部危机引发的短期需求萎缩当然会对经济增长有影响，在全球经济复苏后，我国经济完全有可能再度出现7%以上的年增长率，但未来30年，8%以上的平均增长速度应当是个小概率事件。较低的经济增长率和较高的经济增长质量，将成为我国经济转型是否取得成功的标志。

坦率地说，过去几年里，我国经济发展方式

的转型还没真正起步，成功的转型案例不多。从全国范围看，只有京沪深的转型取得了实质进展，其中深圳提供了一个比较完整从低向高渐次转型的案例。与此同时，我们正在面临一个显而易见的悖论，成功转型的京沪深正在引领我国的房地产泡沫，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如何避免创新转型因资产价格泡沫走向崩溃？这是紧迫的现实问题，也是重要的理论问题，其中蕴含的深刻的经济学逻辑思维，一定是确定空间上的经济现象，离开了空间的经济增长一定是不存在的。本文尝试建立一个经济增长与空间经济内在统一的理论框架，尽可能揭示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中有规律的空间特征。对此，本文参考了近年来国内外代表性较强的相关理论及文献，综述如下。

萨默斯提出（2014）^①，工业化以前的2000多年，人类的生活水平变化十分缓慢，工业革命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人类的生活水平发生了迅速的

Lant Pritchett Lawrence H. Summers: ASIAPHORIA MEETS REGRESSION
TO THE MEAN Working Paper 20573 <http://www.nber.org/papers/w20573> NBER1050
Massachusetts Avenue Cambridge, MA 02138 October 201

变化，人均寿命空前提高。1820年出生的欧洲人，期望寿命是40岁左右。1820~1860年欧洲生活水平提高了大约40%，相当于在此前2000多年的增长。即使如此，工业化以来全球经济增长的平均增速也不过是2%。只有极少国家和经济体能够实现连续10年6%以上的高速增长。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打破了一般趋势，缔造了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长的高速增长期。在过去的35年当中，中国经济每年以9%的速度增长，每8年生活水平翻一番，35年的时间内增长了16倍。发展之迅速，涉及面之广，与世界经济互动如此之强，在工业化史、世界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在《“亚洲欣快症”与经济增速回归全球均值的典型化事实》一文中，普里切特和萨默斯提出了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论点，经济增速回归全球均值是经济增长领域唯一的典型化事实。依此规律，中印经济增速均会大幅放缓。印度，尤其是高速增长的中国，持续增长的时间已经是常见的典型高增长的3倍，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将回归全球均值，而且不能以中印经济减速来说明出现了重大政策失误。

伍晓鹰（2014）认为^①，过去百年，中国的发展模式具有很强的一致性，都是自上而下的资源动员的追赶型增长模式，几乎所有重要的政策都和保证增长速度有关。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后，出现了中国经济史上最快的全要素增长。其中的主要原因是，骤然扩大的外部市场使得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获得了突发性的比较优势。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间竞争在促进高速增长方面的作用突出，但并没有解决经济增长效率问题，引起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本边际收益下降。世界银行（2013）对中国生产率下降和增量资本产出比例不正常上升表示过担忧^②，认为中国政府为保经济增长正在消耗越来越多的资本，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即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需要的投资，在过去20年中已经从3.6上升到2012年的5.4。相比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高速增长时期的2.7~3.2，显然过高。

青木昌彦（2015）指出^③，2008~2012年，中国年均GDP增速为9.1%。去掉同期0.5%的人口增长率后，人均GDP增速为8.6%。劳动人口从生产效率低下的农业地区，转移到生产率高出5倍的城市，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约为3.11%。未来，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会逐渐消失，这是日本和韩国的发展

经验。过去10多年，中国资本产出比例持续上升造成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高。受边际收益递减的影响，单纯的资本量增大，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将逐渐衰减。在新常态下，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加对人均GDP增长的影响将比以往更加重要。

弗纳尔德和琼斯将美国1880~2000年间约2%人均收入年增长率，分解为四个因素：投资、人力资本、研究开发（R&D）和思想创意，投资拉动或是资本产出比例（K/Y）的贡献率为0%，教育或是人力资本投资贡献为20%，研究开发为58%，创新增长即专业化劳动力的思想创意的贡献为21%。白重恩和张琼（2014）证明^④，我国经济在30多年高速增长中，投资对生产率贡献率逐渐下降，教育贡献率的显著性降低，知识积累则明显提高。

刘世锦等（2015）对如何防止中国经济跌入边际收益递减的陷阱进行了分析^⑤，将后发经济体的增长过程划分为三个类型，一是已有技术的平面扩张；二是缩小与先行者距离的追赶型增长；三是原始创新与源头创新性增长，提出人口红利即将消失时，经济转型的核心是从追赶型增长模式转向源头创新增长。

格莱泽等（2014）基于对美国2003~2012年房地产泡沫分析提出^⑥，房地产泡沫是货币现象，但不仅仅是货币现象，城市间房地产价格差异与城市房地产供求关系、经济状况及由此产生的预期差异的关系明显。2003~2012年，在巨大的地产泡沫蔓延崩溃过程中，城市之间出现了明显差异，多数城市出现了泡沫和崩溃；一些城市避开了泡沫也避开了崩溃；部分城市区经历了繁荣但没有破灭；少数城市，如底特律只经历了崩溃而没有繁荣。格莱泽在另外一篇文章中（2016）以巴西、中国、印度和美国为例，讨论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异同^⑦。有效率的经济增长表现为有效率的空间均

伍晓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再思考”，《比较》No.6.2014。
World Bank: East Asia Pacific Economic Update, October 2013 - Rebuilding Policy Buffers, Reinvigorating Growth.

① 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比较经济学观察”，青木昌彦：《比较》No.2.2015。

白重恩，张琼：“中国经济减速的生产率解释”，《比较》NO.4.2014。

刘世锦主编：《中国经济十年增长（2015-2024）：攀登效率高地》，中信出版社2015年。

Edward L. Glaeser Charles G. Nathanson “HOUSING BUBBLES” Working Paper 20426 <http://www.nber.org/papers/w20426> NB ER1050 Massachusetts Avenue Cambridge, MA 02138 August 2014

⑦ Juan Pablo Chauvin, Edward Glaeser, Yueran Ma, Kristina Tobio: “WHAT IS DIFFERENT ABOUT URBANIZATION IN RICH AND POOR COUNTRIES? CITIES IN BRAZIL, CHINA, IND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orking Paper 22002 <http://www.nber.org/papers/w22002> NBER 1050 Massachusetts Avenue Cambridge, MA 02138 February 2016

衡，城市规模结构依照齐普夫法则指数为负1的降幂排列，内含了大中小城市有序与协同发展。在此过程中，产业和人口在空间的自由流动会引发城市间实际工资趋于均衡，会因聚集收益引起产业集中，也会因聚集成本引起在连续空间上有序扩散，形成城市间差别化的产业升级过程。格莱泽等发现，自1980年代以来，与印度相比，中国城市化过程更加接近美国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空间均衡。当然受到户籍制度限制等因素的影响，还存在比较突出的问题。例如，美国人均收入与租金的弹性值为1.6，巴西为1.4，中国为1.1。理论含义是，中国大城市在不断吸入人口和资源时，遏制了房屋租金的上升，吸引人口不断向大城市聚集，形成了以中小城市经济增长乏力为代价的大城市经济繁荣。

二、我国经济转型的困难与曙光

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核心是调整结构，推动新一代产业崛起，实现对低效率产业的替换，不断提升创新能力，同时改变经济增长对投资的过度依赖。

一是结构调整。传统制造业曾是推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力量，过去几年已经成为经济增长拖累。这与全球经济下滑和国际贸易收缩有密切关系，但劳动密集为主、资源密集为主、高耗能和高污染行业增速下滑的主要原因不是需求，而是劳动力和土地成本上升和明显的生产过剩。从此角度看，目前增速较快的先进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科研技术服务和金融业，假以时日会成为新一代替代性支柱产业。短期内，前者总量大，下降得快；后者总量小，上升得虽然更快，但不足以弥补传统产业下滑的缺口，合理的经济结构调整引发了经济增长持续下滑和失业增加。转型与调结构是客观合理的，也是艰难痛苦的，要经历痛苦的忍耐与坚持才能实现。

二是创新能力增强。创新是用新产品、新企业、新产业、新生产方式替代传统的过程，是一个渐进过程。评估创新进展不能仅观察新技术和新企业已经形成的地位，还要观察创新能力的变化，其中专利技术，特别是可以横向跨国比较的国际专利申请量有重要价值。PCT国际专利申请是国际知识产权组织（WIPO）推动建立的最重要的知识产权申请

与保护体系，有132个国家加入了PCT专利申请系统。WIPO的2016年度国际专利申请报告中显示^①，2015年向本地（经济体）申请的专利总数是595400件，增长5.2%，其中国际专利218000件。当年，中国国际专利的申请量增速为16.8%；日本作为全球第二大申请国，增长4.4%；美国作为第一大申请国下降了6.6%。发展中国家开始了专利申请的高增长，2015年沙特阿拉伯的国家专利申请增长了148%，智利增长了45.5%，马来西亚增长了25.4%，土耳其增长了24.7%，南非增长了19.6%。

我国国际专利申请量自2004年开始起飞，当年位居全球13名，是美国的3.9%，日本的8.4%；2008年上升到近70000件，全球排名第6，占全球份额3.7%，相当于美国和日本的11.7%和21%，超过了英国，2009年超过法国，2010年超过韩国，2013年超过德国，成为PCT国际专利申请量第三名。2015年美国排名第一，占当年全球国际专利的26.3%，日本占20.3%，中国占13.7%。中国PCT国际专利申请约3万件，是美国的52%，日本的62%。

过去十几年，我国创新能力进步非常快，PCT国际专利申请件数的增长远远高于经济增长速度。不过横向比较，日本国际专利申请量的基数很大，增长速度不算低。未来5年，按照线性外推美日PCT国际专利申请量，以非线性外推我国的加速成长，中日之间的缺口仍然存在，中美之间绝对数量的差距还会扩大。我国实现追赶的时间还要15年或更长时间。考虑到国际专利申请量只是国家创新能力的一个子项，日本近年来出现的诺贝尔科学奖增加，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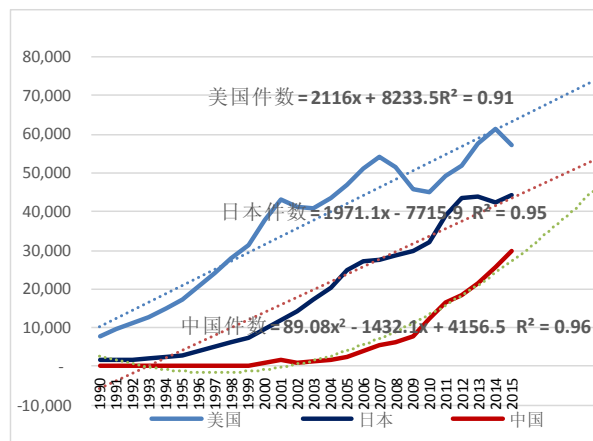


图1 中美日PCT国际专利申请比较与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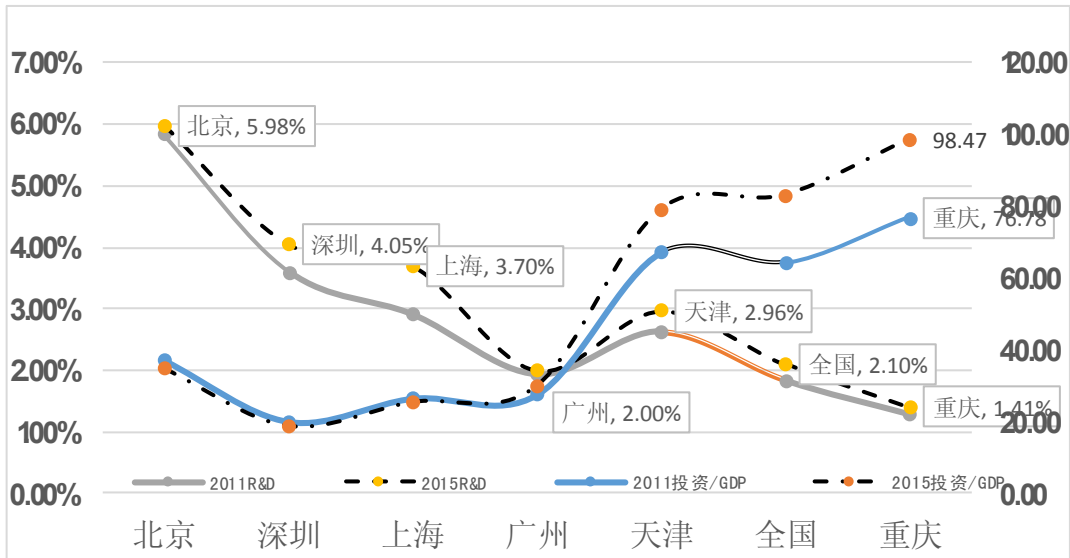


图2 全国及主要城市投资率及R&D占比

经成长为科学强国，我国走向创新大国步伐还需要更快。

三是我国从投资依赖转向创新驱动有亮点，但总体看转型的步伐很慢。鉴于目前我国数据样本还太少，不足以进行全面的经济计量分析。本文尝试选择代表性样本进行比较。我们选取了“十二五”期间，全国投资率平均水平、四个一线城市和天津、重庆两个直辖市作为观察转型的样本。数据均取自国家统计局和各城市历年正式发布的统计公报。

依赖物质资本投入的增长过程是典型的索洛增长，早在60年前，索洛就给出了要素边际收入递减最终导致经济增长停滞的结论。如今，经济增长理论早已超越索洛认识，知识、教育、人力资本作为取代物质资本投入，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中国经济要实现追赶型增长模式向创新增长转变，就是要打破传统模式中要素投入边际收益递减的魔咒，从持续不断的创新中挖掘要素投入边际收益递增的增长，当更多的投入得到更低的效率时，唯一的选择就是放弃不恰当的短期经济刺激，寻求速度与效率之间新的平衡点。

由此假设，经济转型步伐快慢的标志应当是出现了高投资率和创新驱动贡献的拐点。图2中的右坐标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率，即投资占GDP的比重；左坐标是研究开发费用（R&D）占GDP的比重。以广州为中心点向右，广州、天津、全国和重

庆投资率在上升，广州的投资率从27.5%上升30%；天津从67%上升到了79%；全国平均从低于64%上升到接近83%；重庆从77%上升到了98.5%^①。从中可以看出，过去5年，青木昌彦和伍晓鹰观察到的我国资本产出比上升，经济增长需要更多的资本推动的资本边际收益递减情况仍在恶化。本文没采取伍晓鹰使用的增量资本与产出比例（ICOR），而是直接使用固定资产投资率的倒数，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当年带动的经济增长量，非常直观地分析平均投资效率变化。不难看出，“十二五”期间，广州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创造的GDP从3.6下降到3.3元；天津从1.5下降到1.3元，全国从1.6下降到1.2元，重庆从1.3下降到1.015元。如果全国投资效率降到了只有1.01的临界点会发生什么？这显然是不需要再加以说明的结论了。

以上似乎得到了一个非常悲观的结论。但是从广州向左看，可以发现转型的亮点。北京的投资率从37%下降到35%；上海从26.4%下降到25%；深圳从20%下降到19%；北京的投资效率从2.7上升到2.9元；上海从3.8上升到4元；深圳则是从5上升到5.3元。从研究开发费用（R&D）占比看，尽管城市之间高低悬殊，但全国和各城市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北京和深圳已经达到了全球的高点，上海也达到

需要说明的是，各城市之间及与全国平均的价格水平存在差异，GDP平减指数不同时，固定资产投资率是不可简单比较的。不过，在没有各城市之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价格指数比较时，仅对GDP进行不变价处理相对于现价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现价GDP,并非更准确可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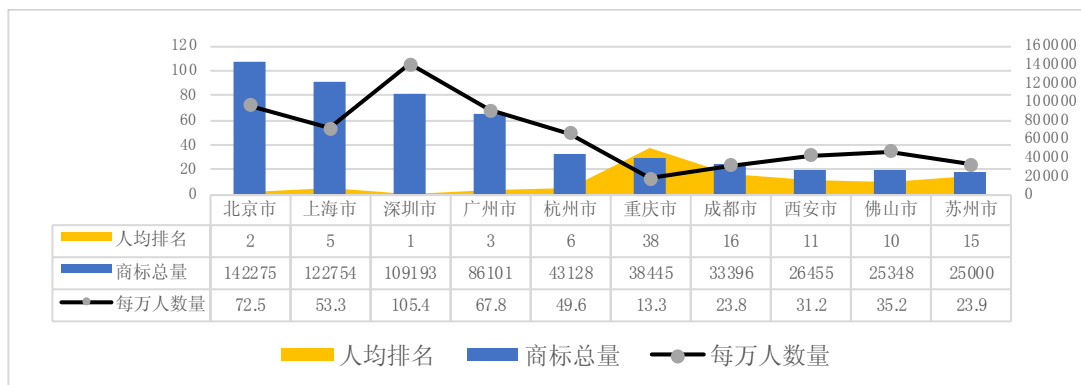


图3 2015年商标总量、人均及万人拥有量排名前十名城市

了较高水平。由于数据限制，尽管不能直接证明高资产投资率会挤出研究开发支出，但低收入的重庆和高收入的广州，投资率上升和R&D比例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天津的高收入和高投资率显著低于京沪深R&D比率，显然值得引起关注。近年来国际SNA统计标准做出了重要调整，按照创造知识更重要的原则，不再把R&D作为一般性支出，而是作为持续创新的中长期投资来统计。这个统计标准的更改不仅仅是增加了高R&D支出的发达国家GDP，而且实实在在改变了我们对经济增长源泉的认知和评价^①。

总之，当全国和一些代表性城市在传统增长模式中似乎越陷越深的时候，京沪深作为我国经济转型的亮点值得认真研究。回顾历史，京沪深的高速增长也与投资拉动密不可分。过去35年，深圳每平方公里的投资超过了20个亿。现在的京沪深超越了投资依赖型增长。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最高和创新能力最强的三座城市，占全国经济总量的份额已经接近10%，具有了带动全国加快经济转型的能力。

三、深圳经济的持续动态转型

深圳是一个由无限个传奇故事编织起来的年轻大都市。它处在不断的转型过程之中，30多年里，深圳经济走出了一条由低向高、渐进持续的经济转型之路^②。

第一阶段依托全球化，走向工业化。特区建立之初的深圳是典型的农业和渔业经济，没有工业。1985年深圳提出“以外商投资为主、生产以加工装配为主、产品以出口为主”^③，加快对外开放步伐，以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与香港形成前店后厂、中心-外围关系，到90年代初以OEM生产方式为代表的

加工贸易企业成为支持经济高速增长重要力量，深圳经济规模迅速扩大，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大大加快。

第二阶段走向模仿性创新的生产制造。1995年上半年两个外部因素在一个时点上碰撞，引发了深圳经济增速大滑坡。前者是1994年7月广深高速公路全线通车引发了OEM产业沿广深高速向北迁徙，东莞崛起，逐渐取代深圳成为全球重要的OEM中心。后者就是所谓的“特区不特”，经济特区的地域性优惠政策让位于沿海及更广泛的对外开放的普惠政策。但从本质上看是深圳OEM的成本在提高，简单的低水平的出口导向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失去了竞争力。在危机迫使深圳转型时最典型现象是，深圳成为著名的山寨城市，模仿国外品牌进行规模化生产成为深圳转型中的重要的发展阶段。深圳幸运，在山寨当中很快就走出自己的制造之路，涌现了华为、中兴、比亚迪、研祥、大族激光等一大批享誉世界的著名品牌。

第三阶段完成从深圳装配向深圳制造的转变。华为、中兴、比亚迪等企业异军突起，同时也崛起了具有核心技术、在国际产业链关键环节占有重要地位的专业化创新型的中小企业群体。深圳因此从大规模制造走向横纵向的网络化产业分工，以产业链为核心的分工体系推动了深圳的持续转型。北上

^① "Depreciation of Business R&D Capital",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R&D Satellite Account Paper. Wendy C.Y. Li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Rebecca Blank Acting Secretary, ECONOMIC AND STATISTICS ADMINISTRATION Mark Doms Under Secretary for Economic Affair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J. Steven Landefeld Director, Brian C. Moyer Deputy Director. October 2012, www.bea.gov

^② 参见唐杰、戴群、李战杰：“深圳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J]. 中国经济特区研究，2010（1）。

^③ 唐杰：“新常态增长的路径路径和支撑”[J] 开放导报 2014（6）。

参见《李灏深圳工作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10。

表1 2015年全球PCT排名前三十名的中美公司

名次变化		国别	申请件数	2014年+/-	
名次	2014				
1	0	华为	中国	3,898	456
2	0	高通	美国	2,442	33
3	0	中兴	中国	2,155	-24
10	15	惠普	美国	1,310	484
12	-6	英特尔	美国	1,250	-289
14	20	京东方	中国	1,227	674
18	8	哈里伯顿能源	美国	1,121	321
20	-3	腾讯	中国	981	-105
23	n/a	微软	美国	860	860
26	-4	谷歌	美国	721	-196
27	-4	华星光电	中国	710	-194
29	-1	3M创新	美国	676	-20
30	-11	联合技术	美国	661	-352

广深确实是走在前列的创新强市，而从人均指标看，深圳的分工专业化水平显然是一骑绝尘，遥遥领先。除杭州外，其它进入前十名的城市在专业化分工与创新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事实上，当我们定义专业化分工推动创新时，也就定义了市场化水平与专业化分工的关系。

第四阶段向深圳创造转型。琼斯和罗默（2009）提出^①，现代增长理论在大家熟悉的实物资本和劳动的投入要素基础上，添加了思想和人力资本存量。思想带来了规模经济效果，好的制度有利于新思想的规模化创造，新思想是驱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在现实世界中，科学发展以及距科技前沿的距离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决定性因素。

过去10年，深圳加快从制造向创造的转型，已经成为全球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的引领者，在基因测序和测序装备材料产业、新材料、新能源、新能源汽车、显示技术等领域形成了居世界前列的自主创新能力和深圳也是全国最重要的时尚品的设计中心。深圳地域狭小，缺乏自然资源，最富有的资源是庞大的创新创业的企业家群体。目前，深圳拥有国内外上市公司350家，销售收入超过千亿的企业近20家，过百亿企业上千家，过十亿的约万家，过亿元的企业已经难以统计。众多的创新企业聚集在产业链的不同环节，快速分享与传播新思想、新知识、新技术，形成创新的汇聚，形成潮涌式的相互推动的一波一波创新过程。

2014年在全球前25名企业中，美国有6家公司，高通、英特尔、微软、联合技术、谷歌和惠普；中国有4家，华为、中兴、腾讯与华星光电。有些令人意外，所谓中国4家就是深圳4家。深圳4家当年PCT专利申请数7611件，若加入华为公司下属的华为终端单独申请的件数，深圳4家企业申请件数与美国6家公司只相差130件。

2015年，华为的申请件数仍然是第1名，中兴是第3名；美国高通和惠普公司分别是第2名和第10名。在前30名里，美国8家，中国5家；美国申请数合计9041件；中国申请数合计9272件，减去京东方公司，加入华为终端申请件数，深圳公司申请数为8487。2015年深圳企业申请的全部PCT国际专利件数超过了1.3万件，连续10年占中国总件数的50%。韩国PCT国际专利申请件数位列全球第5，也只会比深圳领先一年。未来，深圳PCT国际专利申请件数超过韩国可能一点都不令人意外。一个曾经如此落后的城市，只用了30多年时间走向了世界创新的前沿，意味着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再难但只要坚持就不难，从投资依赖走向创新驱动，真正的驱动力是法治化的市场经济，是在市场经济海洋中竞争的企业。

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依赖于空间均衡

现在来讨论一下有关转型面临的悖论。京沪深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代表，而在现实中京沪深又是当今中国内地房地产价格最高的城市，是创新带动了房地产泡沫，还是房地产泡沫会吞噬创新？

首先，房地产作为资产，价格泡沫一定是一种货币现象，而且是具有周期性的货币现象，只要是泡沫就一定会破灭。但反过来说，房地产价格上升并不一定是资产价格泡沫。我们也不能从城市之间房地产价格高低差别来定义泡沫。

其次，经济增长理论经过了漫长的发展。斯密发现了分工引发增长，马尔萨斯发现技术不变条

^① 罗默是内生增长理论的发轫者，也是致力于经济增长理论区域化城市化的先行者。THE NEW KALDOR FACTS: IDEAS, INSTITUTIONS, POPULATION, AND HUMAN CAPITAL, Charles I. Jones, Paul M. Romer, Working Paper 15094 <http://www.nber.org/papers/w15094>.

件下人口增长与土地稀缺引发贫困陷阱，马克思发现积累与竞争推动增长，熊彼特看到了创新引起增长，索洛规范化和公式化了马克思积累与增长的命题，解释了摆脱马尔萨斯贫困增长的路径，即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效率的要素边际替代率可以实现平衡的增长过程。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发现，现代科学技术和大规模的贸易加速了知识的传播，人类物质财富快速增加，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意义不断降低，新知识、新思想的发现与广泛传播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人力资本取代物质资本成为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

显而易见的是，尽管经济增长理论取得了巨大进步，但距离有效解释现实中的经济增长过程仍然相差甚远，这是因为只有在城市经济无差异的假设下，才可以将城市生产函数加总为国民经济总产出。从一切经济增长过程都是确定的空间行为出发，经济增长理论对空间经济形态的研究，不仅需要在标准增长模型中加入距离运费和土地稀缺地租上升的变量，也要考虑要素在空间自由流动所形成的收入均衡与结构差异，空间集聚与扩散是连续发生的过程，要素组合重构的空间异质性而不是一致性决定了空间边际收益递增的过程。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市场选择过程，而不是行政干预的政府行为^①。

罗森（1978）和罗巴克（1982）的开创性研究为研究经济增长的空间均衡提供了简明的思路，它被称做“RR空间均衡定理”，核心是以城市的工资和租金溢价来解释城市的空间集聚和扩散带来的空间均衡过程。简化的表达式可以写为：高名义工资+高房价=低工资+低房价，亦可变形为高工资+完善的基础设施与功能+多样化城市生活+高房价=低工资+宁静的生活+低房价；名义工资扣除房价是实际工资，或是企业收入扣除土地租金是实际利润；RR定理还可以写成：高房价+低通勤成本=低房价+高通勤成本之间的均衡。在此过程中，空间均衡表现为，城市范围不断扩大，大都市区周边的中小城市化使城市区的边缘不断蔓延生长，从单一发展或是恶性竞争发展的独立城市，走向相互关联协同合作的城市群。在大都市工作和周边城市之间，出现人口密度和房价租金以核心大都市为中心逐步递减，产业以大城市为核心形成阶梯形分布等等。

第三，美国工业化城市和后工业化时代空间均衡与城市房价关系。美国大规模工业化和城市化时

期的1870~1940年代，城市工资溢价持续上升，从高于农村10%持续上升到35%以上。大规模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带来了城市人口密度大幅上升，城市租金溢价从1918年的20%开始上升，1930年代达到最高峰，超过了100%。此后美国城市工资溢价和租金溢价保持大约40年的稳定。1980年计算机产业和信息技术革命爆发后，美国城市化进程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大都市人口密度，工资溢价和租金溢价进入新的上升期，按照对工资溢价弹性和土地租金弹性高低开始了产业替换过程^②。空间经济增长与空间均衡的演进，使得分工从人的分工专业化，走向企业的分工专业化，走向城市的分工专业化。在大规模城市化开始的时候，由于城市相对于农村，大都市相对于中小城市有着更高的生产率，有着更多的工作机会，会出现工资溢价的持续上升；随着人口和产业聚集，租金与房价溢价开始较低上升，大都市相对于中小城市的工资溢价与租金和房价溢价的差距缩小，人均实际收入水平从显著扩大，到逐步缩小，直到出现均衡。这个均衡过程就是产业和人口从大城市向周边中小城市扩张的过程。大都市走向人力资本聚集程度更高，产出工资弹性更高，产出土地价格弹性更高的产业形态；中小城市则是按照距核心大都市的远近做相应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由此出现了，城市发展水平趋同，但城市间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异质化而不是同质化的过程，这是一种内生的大城市或是创新中心向周边区域持续扩散的内生升级过程。没有了RR定理阐述的依效用等价的空间扩散与均衡过程，实际上就不会有真正的经济转型与升级。

第四，中国主要城市经济转型与房价关系。考虑到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房地产投资所占比例在25%左右，因此城市之间可以比较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例，也就是可以比较的房地产供给水平的代理变量，即投资率越高，房地产的供给就越多。不失一般性，房地产需求可以定义为收入水平和人口密度，将某个城市的人均GDP乘上单位土地人口密度可以作为城市间可比较的房地产需

Aaron Chatterji Edward L. Glaeser William R. Kerr "CLUSTERS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NBER Working Paper 19013 <http://www.nber.org/papers/w19013>.

Leah Platt Boustan Devin Bunten Owen Hearey, "URBAN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1800-2000" NBER Working Paper 19041 <http://www.nber.org/papers/w190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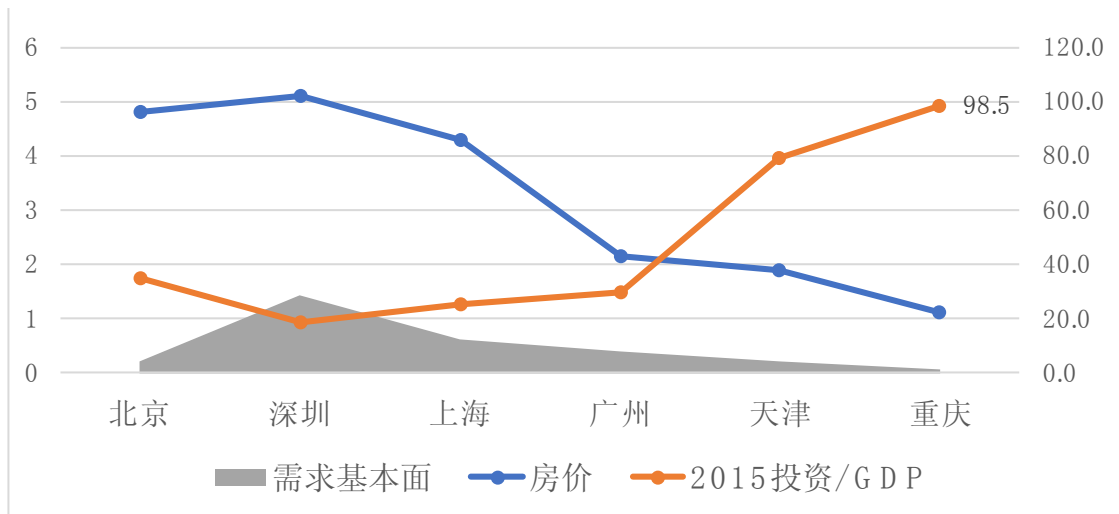


图4 主要城市房地产价格与供求基本面

求强度。深圳的人均GDP和人口密度最高，需求强度也最大，依次是上海、北京、广州、天津和重庆（考虑到重庆地域面积太大，城市化比重仍低，本文选取了2.86万平方公里城市化水平较高区域的人口密度）。从供给角度看，深沪京的房地产的供给水平显然比较低，穗津渝的供给水平显然比较高。一个不会引起太大争议的结论应当是，京沪深房地产市场的特征是需求大于供给；穗津渝房地产市场的特征是供给大于需求。由此引伸出更加符合经济学逻辑的结论是，供不应求价格高，供大于求价格低。图5中各城市的房地产价格（取自中国房地产协会发布的中国房地产行情2016年8月的住宅价格，其中重庆是以南岸和江北区代表全市平均房价），应当是比较好地反映了各城市房地产市场的供求情况。

现在回到有关转型面临的悖论问题。当我们扣除了房地产泡沫因素，仅讨论城市间房地产价格比较时，可以看到，城市间房地产价格差异首先决定于城市房地产市场特征的差别。若进一步扣除城市间房地产供给的差别，决定城市房地产价格差异的需求因素可以分解为，人均GDP收入水平和单位土地人口密度。引入RR定理以实际收入定义空间均衡及其过程的分析，可以发现京沪深经济转型的空间效应是创造了更高的产出工资弹性和更高的产出土地价格弹性。由此引出的问题是，要防止高房地产吞噬京沪深转型创新成果，关键在于三座样板城市可否实现持续的产业扩散，以及产业结构与人口结构与规模的调整，在空间均衡过程中不断提升产出工资弹性和产出土地价格弹性。京沪深要走向更高

端的产业形态，成为引领全国的创新中心和引导资源配置均衡分布的枢纽，关键不是所谓的行政性地限制人口聚集和房价与租金的上升，而是要打破现有的行政壁垒，以市场化的思路，通过高于工资溢价的租金溢价，推动人口和产业向周边中小城市扩散。

第五，美国大都市区经济结构调整与空间均衡。本文依据2001~2013年期间美国六大都市的产业结构变化^①以及对纽约和洛杉矶两个大都市群的统计数据为基础进行了初步的实证分析。我们得到的统计结论是，2013年，美国6大都市群的经济总量占全美GDP的89.8%。2001~2013年，6大都市群制造业产业占全美制造业的比重从83%上升为90%。当以Xi部门的区位商作为城市专业化分工水平的代理变量时，可以发现6大都市群制造业区位商从2001年的0.93，上升为2013年的0.961。可以说，大城市群不仅是美国制造业重心所在，而且地位有上升的趋势。进一步的细化分析表明，在纽约、波士顿、芝加哥、洛杉矶、旧金山和圣地亚哥等6个核心大都市中^②，纽约制造业的区位商稳定在0.5，波士顿略有下

赵登峰等：“深圳服务业核算比较研究”，深圳决策咨询委研究课题，2017年1月。根据其附表：美国都市区—387个都市区分行业数据以及世界银行发展指标之美国数据进行核算。

在美国城市统计规范中六大都市的纽约大都市是指横跨纽约州、新泽西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纽约，纽瓦克市和泽西城；波士顿大都市是指横跨马萨诸塞州和新罕布什尔州涵盖了芝加哥、坎布里奇和牛顿市；芝加哥大都市是指横跨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和威斯康辛州的芝加哥、内伯维尔和埃尔金市；洛杉矶大都市是指加州的洛杉矶、长滩和阿纳海姆地区；旧金山大都市是指加州的旧金山、奥克兰和海沃德地区；圣地亚哥大都市是指加州的圣地亚哥和卡尔斯巴德。美国大城市群的统计则是指，大都市区直接辐射影响的城市地区。例如，纽约大城市群又名为美国大西洋沿岸城市群或波士顿-华盛顿城市带（BosWash、Bosnywash、Boshington、Northeast Corridor or Northeast megalopolis）。包括5个联合统计区（CSA）和29个都市统计区（MSA），涵盖了纽约、波士顿、费城、巴尔的摩和华盛顿5座大城市，以及40个10万人以上的中小城市，人口达到6500万，占美国总人口的20%。作为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的神经中枢之一，纽约占据了区域内的核心地位，而位于波士顿郊区的128号公路两侧则聚集了数以千计的研究机构和高科技企业，也是美国最大的制造业中心，占全美约30%。

降,芝加哥从1.02上升为1.11,洛杉矶有明显下降,从0.92到0.8,旧金山保持稳定,圣地亚哥从0.69上升为0.73。

当我们的分析视角从大都市区扩展到大城市群后,可以清楚地观察到,当信息技术革命席卷全球时,大城市群内部的核心大都市与中小城市间存在着差异化的工资溢价和租金房价溢价,不同产业部门对两个溢价影响的反应明显不同,具体化为产业间的产出工资弹性和产出土地价格弹性的差别。制造业单位产出的土地需求量最大,对地价上升最敏感,会率先从核心城市向周边中小城市迁移,其次是零售业、批发业等。以大城市群作为一个整体,在城市之间专业化分工与结构升级过程中,制造业等产业部门从大都市退出,在其它城市集聚,从而形成产业在大城市群内部差异化均衡分布。所谓大都市一定是去制造业的,所谓大城市群又一定是一国制造业的精华所在,仍然是一个国家的制造业中心。

2000~2015年,纽约和洛杉矶大城市群内部结构变化与空间均衡表现为如下特征:一是信息及信息服务产业成为纽约和洛杉矶的优势产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及金融业的区位商在不断提高,制造业区位商在1以下继续下降,去制造业化过程仍在推进;二是零售业、制造业、交通运输业成为大城市群内中小城市的专业生产部门。在一个连续空间上,以距大都市距离,周边城市依次沿着零售与批发业的中心和高端制造业中心实现结构转换和产业升级。三是在中小城市,教育、医疗部门的区位商普遍高于核心大都市,教育医疗部门产出占中小城市GDP的比重还在上升,成为中小城市重要的专业化部门。这值得引起我们的特别重视,显而易见的,公共服

务和准公共服务的空间均衡是改变大都市工资溢价高,实际工资水平高的重要条件。当最优质的教育和医疗资源高度聚集在大城市,却采取行政手段限制人口进入大城市的时候,本应意识到,这将是一个永远无解的解决办法。当我们不能有效地推动产业空间扩散,实现空间公平的时候,大城市特别是少数特大城市的房价持续上升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结果。京沪深走向创新的转型也就很难避免被高房价所吞噬。

五、结语

本文围绕经济增长理论的演变对我国经济方式转型的目标方向、困难以及成功案例进行了讨论,提出空间均衡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内容。从中美城市实证分析的角度,讨论了空间均衡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与创新驱动的重要意义。从现实出发,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已经走完了依靠工业化创造集聚效应以快速推动城市化的过程。未来,我国城市化将进入以要素空间扩散实现空间均衡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城市之间会依照聚集收益和聚集成本的比较,形成各具特色的城市经济结构,相互依存地成为一体化发展的大城市群。

深化市场经济改革,打破城市间的行政壁垒,推动生产要素在空间自由流动,强化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构建分工协调创新发展的要素边际收益递增型内生增长的制度基础,这是我国经济新常态的题中之意,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更是防止我国转型升级走向泡沫化的治本之策。

Issues of Economic Growth and Spatial Equilibrium in China

Tang Jie, Dai Xin, Tang Wen, Yuan Shuai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henzhen), Guangdong Shenzhen 518055)

Abstract: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faces a series of issues including why and how to promote the process as well as the difficulties, which have not only aroused widespread discussion in the field of economics, but also been discussed in the broader society. Despite identifying the cyclical factors of Chinese economy, this paper pays more attention to Chines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its proble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ng-term economic growth. Meanwhil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put forwar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Theory and Spatial Equilibrium Theory from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search.

Key words: Growth, Innovation, Asset bubble, Spatial Equilibrium

(收稿日期:2017-02-06 责任编辑:廖令鹏)

【本期论题】

抵达刘易斯拐点的中国道路

——关于城市化瓶颈的若干思考

文贯中

(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 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 上海 200433)

[摘要] 全球化面临的再调整, 使中国深化自身经济体制的改革更为迫切。迄今为止, 中国主要借助非市场机制配置土地和农村人口的进城定居。不少学者以工资上涨为由, 认为中国已抵达刘易斯拐点, 但现实却和刘易斯原意相去甚远。由于在现行土地制度下没有挤出效应, 农村留下的人口以老弱病妇和儿童为主, 土地经营规模狭小而低效, 城市的户籍制度和高房价也不利于外来农村人口定居。近40年的实践证明, 只要现行土地和户籍制度不彻底改革, 通过城市化将农村人口提升到高收入阶层的理想将难以实现。

[关键词] 刘易斯拐点 中国道路 农村逆淘汰 排外性城市化 社会流动性陷阱

[中图分类号] F29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17)01-0016-07

[作者简介] 文贯中(1946—), 原籍湖南, 上海生人, 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教授, 兼任上海财大特聘教授和该校高等研究院农业与城乡协调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清华大学政经研究中心特邀教授, 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特邀研究员, 上海发展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委员, 研究方向: 中国农地制度、农业全要素生产力。

一、逆全球化暗流给我们的警示

都说世事难料。全球化突然变得凶吉未卜, 便是一例。工业革命后, 一直以全球化坚定旗手自居的英国,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不惜凭藉枪炮、战舰, 推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 将英国治下的全球化强加在各国头上。后来居上的美国, 则通过推动殖民主义的终结和建立包括世行和IMF在内的四大国际组织, 将贸易自由化和全球化推向新的高度。然而, 因对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究竟是福是祸, 莫衷一是, 两国一半左右的民众近来竟生出深深的悔意。英国选择了退出欧盟的惊人之举; 美国则选出

了扬言要重新谈判乃至废弃各种贸易协定的川普担任下一任总统。不但一直以来作为全球化旗手的英美两国萌生急流勇退之心, 面对全球化带来的苦乐、利弊在各国间的分配严重不均, 不少民众对全球化也日益观望。逆全球化潜流正悄然兴起。

全球化出现逆转, 并非第一次, 原因还在于全球化从一开始就面临各国五花八门的理念和参差不齐的制度所构成的障碍, 全球化带来的增益在各国间苦乐不均的分配也容易引起反弹。

近代以来, 英国带领的全球化, 其实是其国内奉行彻底市场化的必然结果, 因而由英国引领的全球化其实是基于市场原则, 即基于等价交换, 自由贸易。全球化的潜在增益首先来源于李嘉图所证明

的比较优势。按照这一理论，国家不分大小，无论是否经济发达、效率超人，或是经济落后，效率低下，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比较优势，以此得以通过自由贸易获利；全球化增益的第二个来源在于由克鲁格曼所证明的规模报酬递增。具有这种特征的产业，即使位于国内市场狭小的国家，也能因全球市场的开拓而得以大大降低单位生产成本，更不要说具有市场的天然优势的大国。这两大增益来源要真正实现，非借助全球化不可。所以，问题不在全球化能否带来真正的增益，而在于其增益能否为大多数人分享，而不为少数人独占。作为“旗手”的英美两国在民意的挟持下，似有急流勇退之意。这一事实显示，在强调效率的同时，不能一味忽视收入分配。

本文将基于市场化原则，能够兼顾效率和公平，作为良性全球化的定义。作为全球化新力量的中国，今后面对的最大挑战，不但是如何借助全球化促进各国合理分工，提高生产效率，而且无法回避全球化增益的分配公平问题。事实证明，全球化只有成为上述定义的良性过程，才能行之久远。而且，如果在推动良性全球化的同时，中国能以自身的榜样做世界的表率，则更能令人心服口服，事半功倍。

二、良性的全球化，必须首先实现要素在国界内的自由流动

主流经济学的结论是，如果生产要素，例如土地、劳动、资本和人力资本等，在所有方向上都能自由流动，自由交换，则不但能促进效率，也有助于收入分配的公平。

要发现要素的长期均衡价格，必要条件是允许要素的自由流动和自由交易，这其实就是市场化。既然全球化追求的正是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自由交易，所以，全球化必然以市场化为前提。正是基于这个理由，良性全球化必定要求在一国边界之内允许要素的自由流动和自由交易，一旦全球化后，才不会加剧本国的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阶层之间的收入差。如果一部分要素借助自己的地理、政治或教育等的优势，得以通过全球化，通过自由交易，实现自身更高的价值而获益；而另一些要素因为没有上述优势，而被屏蔽在全球

化过程之外，无法分享全球化带来的获得自身增益的机会，则这部分要素的收入分配就会相对恶化。

要素的流动可分水平方向和垂直（指阶层之间）方向。一般来说，地理障碍仅仅是造成要素在水平方向上流动阻滞的障碍之一，更主要的是禁止要素自由交易，禁止货物自由贸易的制度。与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相比，地理障碍毕竟还容易克服。即使并无舟楫之利的远古时代，人类都发生了横跨大陆，或远渡重洋的大迁移。到了近代，技术的改进和财力的增长，修路、铺桥、建设机场、开通港口的能力大增，越来越多的地方交通变得大为便捷。影响水平流动自由度的越来越是制度性的障碍，地理障碍的影响日益下降。

和要素在水平方向上的流动性障碍相比，要素在垂直方向上的流动阻滞则主要来自不合理的制度，也是今后大家更应关注的。如果一部分要素获得制度性特权，能够比较自由地流动，例如中国的城市土地，另一部分要素受到制度性的歧视，不得入市，或转换用途，实现更高价值，例如中国的农村土地，则要素的收入差异就难以弥合。影响垂直流动的主要障碍除了制度性的，另一个主要障碍来源于个人拥有的人力资本的差异，使蓝领和白领之间难以自由转换，因而低收入阶层难以向上流动。城乡教育质量的良莠不齐，既可能来自农村教育设备的简陋，也可能来自农村学生因机会不平等，觉得读书无用。两者都可能造成人力资本差异。所以，教育设备和社会制度两者相互交叉，造成教育质量在城乡之间的显著差异。

消除不同阶层在人力资本上的差异，并使就业机会不因户籍的不同而不同，既与推广教育的努力有关，也与废除歧视性的制度安排有关。东亚一些国家的经验表明，农村人口在接受良好教育之后，如果没有进城定居的制度性阻隔，仅仅几代的时间便能从社会底层整体性地上升到中产阶级。

在现有全球化框架下，非熟练劳动和土地这两种生产要素在国际间并无自由流动性，唯有资本和熟练劳动深受各国欢迎，获得高度的流动性，因而资本和熟练劳动的拥有者的收入高出一般民众。例如，资本可以从劳动成本比较昂贵的国度流向劳动廉价的国度，在那里和廉价劳动结合，生产各类劳动密集产品，然后高价返销本国，获取暴利。如果要防止本国非熟练劳动收入的恶化，就要帮助他们

提高自己的技能。又如，如果资本可以容易流向土地供给严重短缺的地方，当地土地的用途转化又受到不当管制，造成了地价和房价的奇高，则资本可轻易获得该处的地产和房产的暴利。

由以上分析不难理解，为何对全球化持有最多疑惑的是美国中西部的广大居民。恰成对比的是，东西两岸居民却大多支持全球化的深化。细思其中的原因，其实和要素流动自由密不可分。主要由于地理，而非制度的障碍，美国广大内地的要素要和世界融合毕竟多了一层距离带来的障碍，因而无法像东西两岸一样得到全球化的眷顾。几十年来，这些地方知识和技能较高的人口可以逐渐移往东西两岸，代表资本利益的当地企业可以更迅速地移往别处，甚至外国。当地剩下的居民因在技能和知识的升级上（所谓垂直的流动性）受到阻滞，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收入水平难以提高，当地居民对全球化的怨愤自然会与日俱增。

此刻回顾一下卡尔多—希克斯改进的定义，会有特别启发。帕累多改进所需的条件过于严格，要求某人福利的改善不得损害任何人的利益，使得现实中很难有改进的机会。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将条件放宽，只要某种改进对获益者所带来的增益大于受损者的损失，便值得尝试。不过，这样一来卡尔多—希克斯改进的可行性的焦点也就聚到一点：如何说服受益者拿出足够的增益补偿受损者？

这里除了涉及如何估算增益和损失，关键是如何对受益者和平征收他们的部分增益，公正地转移到受损者的手中。由政府担任这个角色自然最为合理。这就对政府提出很高的要求。如果政府本身没有诚信，贪污、腐败，中饱横行，或者软弱无力，没有国家能力，无法实施征税和收入转移，自然无法担任这一重任。潜在的受益者和受损者如果对政府没有信心，这种利大于弊的改进就难以发生。如果将上文中的“改进”理解为改革，则所谓的改革就难以推行。

当然，全球化的潜在增益远未穷尽，总会吸引各国或迟或早，或快或慢地重新参与到全球化中来。但是，全球化的增益在各国之间的分配，以及在各国内部的不同利益集团和地区之间的分配，因为各国内部对要素自由流动实行不同的限制而有不同的结果。在现有的国际秩序下，并无整个世界的统一行政当局，强制各国实行要素自由流动，更无

法对国际间因全球化带来的增益和受损实行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在这种情况下，提倡全球范围内要素自由流动的困难自然比在一国之内更为困难。

观察英美两国之所以能够长期担任全球化旗手，原因并不简单。两国不仅各自产生许多杰出的经济学家，提倡各种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理论，而且先后成为允许境内要素自由流动的表率，才能各领风骚一百年。以美国为例，首先实现了所有要素在境内的自由流动。标志之一，美国从南北战争时期主要还是一个农业国，到今天农民占总人口的比例已下降不到2%，其余的农村人口都已转移到城市部门，并大都上升为中产阶级；标志之二，本来集中在南方农业州的黑奴，其后代通过进城打工并定居，不但成为美国城市化最高的族裔，而且主要集中居住在城市中心地区。美国不但允许境内的各种要素自由流动，而且主动开放自己的土地市场、资本市场和产品市场，让本国的要素市场成为国际洼地，吸引全世界的资本、产品、知识、技术和人才汨汨流入。

美国虽未完全开放一般的劳动市场，但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建国以来吸纳了来自各国的成千上万的移民，也是不证自明的事实。今日美国光非法移民，人数就高达几千万，而其中大多是非熟练劳动。美国的熟练劳动市场的开放性在世界上更是首屈一指。美国的做法，暗合老子所提倡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如此看，美国不仅允许要素在自己的边界内自由流动，而且允许界外的要素和产品比较自由地进入自己的市场。公正地说，美国通过向世界开放自己的各种要素市场，确实为全球化作出了表率，才能成为过去百年间全球化的核心和主要推动力。鉴于在要素如此自由流动的英美两国，民间对全球化带来的苦乐不均都已产生严重反弹，对于边界之内要素尚且不能自由流动，却又立志于推动全球化的中国，不啻提出了及时的警示。

三、中国抵达刘易斯拐点的独特道路

中国在各种国际场合大力呼吁，要求允许生产要素在国际间有更大的自由流动的便利，这自然十分正确，也击中全球化面临的一个要害问题。只是推动所有要素在国际间自由流动，却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实现。就拿非熟练劳动来说，所面对的语言、

文化、宗教和政治信仰等的障碍在短期内就是难以克服的。所以，主流自由贸易理论也只能退一步，提倡欠发达国家通过输出劳动密集型产品，以变相输出劳动的形式，借助世界市场消化本国的过剩劳动。然而，对发达国家的非熟练劳动来说，他们原来的生产岗位必然因大量流入的廉价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而消失。除非他们能够获得新的、收入更高的工作，不然他们迟早会对全球化产生反弹。

上文指出，美国的收入差别并不表现在城乡之间，而在地区和阶层之间，即在东西两岸和广大内地之间，以及蓝领和白领之间。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却主要表现在城乡之间。两者的收入差距仍在恶化之中。据曹光四和张启良的研究（2015），虽然城乡收入比近年来有所下降，但城乡收入的绝对差实际上仍在扩大：“自2008年突破1万元后，到2013年这一差距扩大到1.8万元。”2015年这一数字已扩大到1.9773万元，如果四舍五入的话，差3元就是2万元。这一切发生在政府近年来加大了支农力度之后。

除了城乡收入差持续恶化外，根据陈锡文的研究，中国农业本身还面临以下四大难题。首先，日益丧失国际竞争力，表现在农产品的价格普遍高于国际价格，进口日增；其次，农产品的生产成本普遍高于国际水平，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十分缓慢；其三，农业越来越依赖于政府的财政补助才能生存；其四，生态环境恶化，农业对资源环境的压力越来越大^①。

现在农业在GDP中的比重已经下降为不到10%，但是农村人口还占总人口的44%。如果加上持有农村户口的两亿六千万进城打工的农民工，约占总人口的20%，则农村户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仍占了60%以上。由此可见，报道的高达56%的城市化率其实是有很大的水分的。更为严峻的是，近年来农民进城打工的人数锐减^②。这本来是城市化的最主要人口来源，也是中国借以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途径。农民工进城速度的减缓乃至停顿，则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就难以下降，使中国陷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大为提高。

很明显，城市化本来应该成为农村人口上升到中产阶级的最主要通道，但现在却在一定制度上成了城市自我现代化。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发达，才能支撑其他一切产业的持久发育和成长。

但是，在制造业一跃而为世界第一，城市的日新月异的繁华美景得到世界赞叹的今天，农业、农村和农民反而陷于困境，失去内在活力。那么原因何在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回顾一下关于刘易斯拐点的争论很有意思。学界从2003年起，针对城市工资不断上涨，开始讨论中国是否已经抵达了刘易斯拐点。以蔡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中国已经抵达刘易斯拐点。城市的工资确实在不断上升（蔡昉，2010）^③，流入城市的农民工也在急剧地减少（李铁，2016）^④，从这些表象看，中国似乎确实抵达了刘易斯拐点。

但是，包括笔者在内的不少经济学家却认为，这种提法仍需商榷（文贯中，2016）^⑤。刘易斯第一拐点的抵达，意味着边际产品为零的农村劳动力彻底消失。而刘易斯第二拐点的抵达，意味着农村劳动生产率和他们的人均收入应该和城市拉平（参见本期熊金武《刘易斯经济模型与两个拐点的顺序》一文，以下称“熊文”）。如果真是这样，农业应该具有国际竞争力，农村应该融入了市场经济，实现了现代化。令人遗憾的是，从包产到户在1978年的重新出现算起，将近40年过去了，由刘易斯拐点的抵达所预言的城乡一体化的美好愿景并没有出现。农村主要剩下的是老弱病残妇的人口，中国家庭农业的规模仍然过于细碎，农业日益失去国际竞争力，而城乡收入差仍在继续扩大之中。显然，即使说中国抵达了刘易斯拐点，但抵达的路径十分不同于刘易斯所设想的收敛道路。中国的道路为何会产生与刘易斯的本意十分不同的结果呢？

从刘易斯拐点的原意来看（参见熊文），如果中国已经抵达刘易斯第一拐点，则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应该完全吸收殆尽。这意味着农村的人口不应该主要由老、弱、病、残、妇组成，而应该留

陈锡文：中国农业发展的焦点问题，见共识网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china/ggzl/20150611125671_all.html。

李铁：中国城镇化速度严重放缓。在该文中，“李铁表示，按照原有经验，中国每年大约会有占比1%的人口、约2000万人进入城市。按照这个趋势，到2020年，中国城镇人口将达到8亿多，2030年将达到9亿多。”“不过，李铁表示，从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角度看，数字要小很多。2010年至2015年间，农民工总体增量从1245万人下降到了352万人。其中，跨省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增量从802万下降到了63万，2015年与2014年相比增长0.4%，“几乎零增长”。”详见：<http://m.china.caixin.com/m/2016-12-16/101027990.html?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蔡昉：迎接“刘易斯拐点”充分发掘人口红利。2010年09月22日《中国共产党干部论坛》。详见<http://theory.people.com.cn/GB/12794480.html>。

李铁等：城镇化视角下的人口发展。见中国乡村发现网：<http://www.zgxcfx.com/sannonglunjian/94188.html>。

⑤文贯中：城乡收入差距拒收不收敛的制度原因。详见2016年07月12日 财新网：<http://opinion.caixin.com/2016-07-12/100965550.html>。

下以青壮年农民为骨干的农业生产主力。没有竞争能力的农村劳力应最先被淘汰，最先进城就业。这显然与事实不符。如果中国抵达的是刘易斯第二拐点，则农村人口应该大量减少，农村的人均务农纯收入应该和城市的非熟练劳动的人均收入接近。这显然也与事实不符。从农场的规模和效率来说，不管抵达的是刘易斯第一拐点还是第二拐点，农场的土地经营规模平均来说应该越来越大，劳动效率应该越来越高。这些农场应该逐渐成为中国农业生产的骨干，并具有国际竞争力。这显然也和事实不符。

四、决定抵达刘易斯拐点顺序的制度前提

细察刘易斯模型的制度前提，就会发现，在他的模型中，要素的配置必须由要素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才会使城市吸收农村劳动力时顺着边际产品由低到高的次序，使农村留下边际产品越来越高的农民，直至他们的劳动边际产品和城市相等，使城乡收入差完全消失。刘易斯拐点抵达的这种顺序是由要素市场，特别是土地市场和劳动市场共同决定。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有内在的动力不但使生产率最低的农村劳力首先从农村中淘汰出来，而且首先被城市吸收（文贯中，2016）。而一旦被城市吸收，得益于城市积累的大量资本和人力资本，也就是城市的集聚效应，这些劳动力的生产力就会显著提高，收入也会高于农村。这就使这种城市化是一个城乡收入差逐渐收敛的过程。

使农村劳动力按这种顺序流向城市的动力来自两种效应：一种是挤出效应，即务农效率低的农户在土地市场上竞争失败，其土地被务农效率高的农户收购、兼并，拿了卖地所得，自愿流出农村；另一种是拉出效应，即一部分农户被城市的更高的收入所吸引而主动离开农村。值得注意的是，在存在要素市场机制的地方，两种效应都不会首先使有丰富的务农经验，劳动的边际产品较高，因而有较强的务农意愿的人离开农村。在有大量农村剩余劳动的条件下，城市的初始工资在一段时期内只需比农村的制度工资略高一些。在这种情况下，要务农经验丰富，劳动的边际产品较高的农民首先放弃务农，接受城市低廉的工资，由于机会成本太高，一定会使遭到他们的拒绝。这就使这些对农业生产最

有用的劳动力保存在农业中。

用熊文的图作说明， OM_0 段代表农村劳动边际产品为零的劳动力， M_0M_1 段代表边际产品为正，但低于城市劳动边际产品的农村劳动力。由于土地市场的缺位（不准自由买卖土地），没有挤出效应，中国城市吸收的农村劳动的顺序是先跳过 OM_0 段代表的农村劳动边际产品为零的劳动力，而从劳动供给曲线的A点开始向右移动。A点本来是刘易斯第一拐点，中国的城市却从刘易斯第一拐点直接开始吸收农村劳力。在吸收完了 M_0M_1 段，抵达作为刘易斯第二拐点的B点之后，除非回过头来去吸收 OM_0 段所代表的劳动边际产品为零的农村劳动力，不然只好沿着供给曲线BC段继续上行，劳动的成本越来越高，使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的相对优势逐渐丧失。今后城市的制造业吸收劳动的能力将越来越低。

五、使刘易斯拐点的顺序逆转的制度障碍

在中国制度条件下，土地不允许自由交易。土地承包权的分配只能由村子行政手段分下去，而根据的原则并不是使用土地效率的原则，而是每家在村里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劳动的配置也没有完全实行市场化。户口制度限制了农村劳动在打工地的落户。首先，农户并不能通过竞争和兼并稳定地获得土地。事实上，农户仅凭集体成员的身份，就可获得一份土地。这样，越是无效的农户越能留在农业。越是能干的农户，越会感到无法稳定扩大土地经营规模的痛苦。所以，能干的农户纷纷流向城市，出现了和刘易斯预言相反的结果，农村越来越成为老、弱、病、残、妇这样的劳动边际产品较低的人口的归宿，而流出的却是劳动边际产品较高的人口。其次，在现行户口制度和土地制度下，城市虽然通过拉出效应，得到了青壮年劳力，但又设立很高的定居门槛，使他们大部分被排斥于城市户口的大门之外。加上就业机会多的城市，地价和房价飞涨，使他们无力定居。在他们年老力衰，或结婚育儿之后，为了养老或抚养小孩，很多人会被迫流回老家。这就进一步增加农村老弱病残妇的人口比例。同时，这种户口制度又使农村劳动在打工地难以实现家庭团聚，完成人口的再生产和下一代的真正融入市民社会。

由上文分析可以看出，全球化必须以市场化

为前提，才能使配置资源的有效性获得客观标准。但是，在重视效率的同时，绝不能漠视分配不公带来的后果。如果市场化不彻底，仅仅允许一些要素自由流动，自由交易，实现自身的最高价值，另一些要素由于地理或制度的原因而被摒除于全球交易之外，无法有机会在全球范围内参与自由交易，以便和其他要素自由组合，就必然无法实现自身最高价值。如此，则全球化带来的巨大增益就被局限在能够参加全球化交易的要素之中，全球化就变得具有极大的局限性。少数精英固然获利很多，但全球化有脱离广大民众的倾向。这种全球化显然不是一种良性的、包容性的和分享型的过程，因而无法持久。

为了使新一轮全球化成为一个良性的、普惠的，和可以持之以恒的过程，中国显然必须借鉴英美和自身的经验教训，并成为新的表率。无论英国，还是美国，在它们崛起担任全球化的旗手的时候，都是追求本身国界之内的要素的自由交易之余，再推而广之，追求全球范围内的要素自由流动。在当时的条件下，应该承认他们为世界如何面对全球化做了极好的表率。

中国由于本身要素市场的发育不全，城乡之间的资源配置不但效率低下，而且城乡收入差在恶化之中。世界为中国开放了市场，中国的制造业的规模和能力世界第一，中国铺设高铁、公路、桥梁、和造城的能力也举世无双。但是，作为国民基础的农业却不但没有首先现代化，而且再次沦为国民经济最落后的部门，丧失了国际竞争力。

尤其棘手的是，当中国的制造业正在像那些非熟练劳动严重短缺的发达国家一样，讨论如何升级换代，如何向资本密集和知识、技术密集转型，甚至在讨论如何用机器人替代人工的时候，农村里仍留有大量以老弱病残妇和留守儿童为主体的农业人口。最能吸收这类农村非熟练劳动的经济发展阶段，也就是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主的发展阶段正在逝去。随着地价和房价的急剧上升，城市的劳动工资必定面临不断上升的压力。如此一来，今后的制造业也只能向高、精、尖产品升级，因而将主要吸收熟练工人。这种劳动成本的变化必然使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衰落，所能创造的就业速度将大大减缓。

当然，除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外，服务业本

来也应该提供非熟练劳动力就业的机会。服务业中既有高端的，例如金融、法律、咨询、教育、科研等，需要的主要是拥有大量人力资本的人士，更有大量是低端的劳动密集型的，例如公交、运输、餐饮、家庭服务、建筑、城市卫生、保安、物业、环保、地勤、物流等等。但是，这类服务业一般需要人口和产业的集中，即以城市化为前提。同时，它们的生产力较低，所能支付的工资也较低。除非城市的生活成本不高，不然难以吸引农村劳动力进城从事这类工作。

遗憾的是，在有工作机会的城市，目前的房价与当地工资的比例已变得完全离谱。高昂的租金使低端服务业难以发展，使其中的就业人员难以生存。况且，只要户口制度不彻底改革，即使已经进城的青、壮年劳力在结婚生子，或接近晚年的时候也会被迫重返农村。因此，这种以老、弱、病、妇为主的农村人口会源源不断地被再生出来。令人遗憾的是，一边中国企业在抱怨劳动工资日益上升，一边广大农村仍存在好几亿的农村人口，每人拥有的土地十分狭小而零碎。显然，中国未能有效利用自己的劳动资源。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时候，即使大幅度增加对农村贫困人口的补助，以图缩小城乡收入差都会无济于事。补助少了，不解决问题；补助多了，不但政府负担不起，而且在农村户籍人口仍占人口一半以上的今天，且不说滞留于农村的贫困人口今后更无动力外出打工，连已经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都会辞职不干，一窝蜂地返乡，领取补贴。因此，如何使滞留于农村的以老弱病残妇为主的人口不陷入中等收入的陷阱，而是和城市户籍人口一起与时俱进，一起富裕起来，显然是中国面临的极大挑战。

六、推进要素市场化 是中国成为良性全球化表率的需要

由此看，借助非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结果，留下十分严重的后遗症。只要中国现行的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不彻底改革，现下的配置机制必然只会暂时性地利用农村人口中的精华，而将老弱病残妇和留守儿童滞留在农村，甚至农村精英中的许多人在被城市利用，年老体衰之后，也不得不回到农村。因而目前一些农村衰败，农业落后，农民相对贫困

化的所谓三农局面就无法根本改变。

如果中国在自己的国界之内都拒绝让要素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后果又如此的严重，又如何通过自己的表率，事半功倍地去推动全球范围内的要素自由流动和收入分配的公平呢？显然，中国农村，农民和农业的现状十分严峻。我们必须正视现行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的弊端，尽快按照市场化和良性全球化的要求，彻底改革这两种制度。我在《吾民无地》一书中已经提出具体的改革方案，并在《财经》发表的题为“土地制度改革急需新思维”（2016）^①作了进一步的说明。愿意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的，谨请参阅该书和该文。因为篇幅的缘故，这里不再赘述。

如果中国能够尽快改革阻碍国内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障碍，则仅仅因此而出现的中国国内市场的潜力就是不可估量的。如此，不但中国将能克服全

球化暂时出现的逆流带来的困难，而且一定能以自己的巨大市场容量为新一轮全球化提供巨大市场。

如果美国仅仅3亿人的市场便首先支撑了欧洲在二次大战后的复兴，支撑了以日本为代表的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最近20多年之间，又支撑了中国的崛起的话，可以想见，一个要素能够自由流动和组合，拥有将近14亿人口的中国，一旦结束城乡割裂的局面，成为一个城乡统一，繁荣分享，均衡发展的经济，不但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表率，并将以自己的巨大而又开放的市场，为新一轮的全球化提供源源不绝的动力。

文贯中（2016），详见 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1658.html>。

China's Approach upon Reaching the Lewis Turning Point: Analysis on the “Bottleneck” of Urbanization

Wen Guanzhong

(Th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Research,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Trinity College, 300 Summit Street, Hartford, CT 06106, USA)

Abstract: The coming adjustment in globalization makes it very urgent for China to deepen the reform of its own economic system. Up to now, China has mainly relied on non-market mechanism to allocate land and the settlement of rural migrants in urban areas. Numerous scholars believe that China has reached the Lewis turning point, using the rising urban wage as an evidence. However, the reality is far from what Lewis predicted if an economy has reached the turning point. As a result of no squeezing-out effect under the current land system, the rural areas are increasingly inhabited by those who are aged, weak, sick, and female, plus the children whose parents left them for urban jobs. Consequently, the average scale of land operation of a typical rural household is small and inefficient. In addition, the urban authorities are using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to exclude non-local rural migrants from settling down. The nearly forty years' experiment shows that it is next to impossible to realize the grand plan of uplifting the whole rural population into high-income group through urbanization without thoroughly reforming the current land system and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Key words: The Lewis Turning Point, The Chinese Path, The Rural Inverse Elimination, Exclusive Urbanization, The Social Mobility Tra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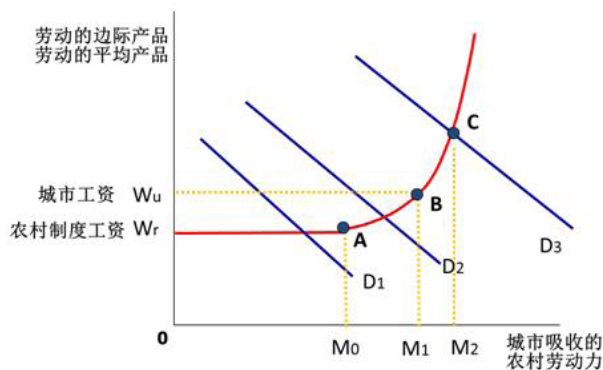
(收稿日期：2017-01-06 责任编辑：垠喜)

【贴士】

刘易斯经济模型与两个拐点的顺序

熊金武

威廉·阿瑟·刘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 1915~1991年）因对发展经济学作出首创性贡献，而于1979年与芝加哥大学的T. W. 舒尔茨共获第十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于1954年发表的《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一改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力有限供给的假设，提出了二元经济模型（也称两部门模型 Dual-sector Model），用农村过剩人口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长期陷于低收入陷阱的原因，提出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吸收农村剩余人口作为走出陷阱、迈入现代化的出路。在他的二元经济模型中，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由传统的农业部门和现代的城市部门构成（见下图）。



上图中，横轴表示的是由农村进入城市部门的劳动力数量；竖轴表示的是劳动的边际产品或平均产品。 W_u 为城市工资，由城市的劳动需求曲线（由递减的劳动边际产品曲线 D_1 表示）和劳动的供给曲线（由 W_uBC 曲线）的交点共同决定。 W_r 为农村工资。在刘易斯模型中，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

存在，出于生存需要，农村工资演变为等于农村劳动力的平均产品，即农业总产量除以农村全部劳动力。 W_u 高于 W_r 的部分代表城市化的红利，可以用于支付农村劳动力进城所必须支付的迁移成本和城市较高的生活成本。 W_rAB 段曲线可理解为农村劳动市场上的供应曲线，代表被城市更高的工资吸引而潜在愿意进城的农村劳动力人数。 W_uBC 曲线为城市的劳动供给曲线。基于以上理由，从图中可以看出，在B点的左边，劳动供应曲线在城乡之间是分叉的。 W_uB 段位于 W_rB 之上，在B点之后汇合成一条统一的劳动供给曲线，表示由于城乡劳动边际产品的差异消失，城乡劳动市场完全统一。 D_1, D_2, D_3 分别代表劳动需求曲线随着城市部门的扩张而向右位移的情况。

有趣的是，刘易斯对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在经济学上的区别做出了自己的独特定义。根据他的观察，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地区，通常以劳动的边际产品支付工资，但是这些国家的农村地区却十分不同于城市地区，平均产品被用来代替边际产品作为农村工资。他的解释是，农村存在大量的边际产品为零的劳动力。如果农村也像城市一样，对每个农村劳动力支付的工资等于其劳动的边际产品，则边际产品为零的劳动力及其家属将无法生存。因而，发展中国家在其长期的生存挣扎中，发展出一种社区共享的文化习俗。虽然这种习俗使人口过剩到每个人只能维持最低的生存水平，却使人口全体保存下来了。刘易斯将这种平均工资称为制度性工资（institutional wage），并将这种分配方式作为传统社会的特征，以区别于现代市场经济下工资由劳动的

边际产品所决定的收入分配方式，因而现代化过程也可以说等价于用劳动的边际产品取代劳动的平均产品所决定的收入分配方式的过程。

上图中，OM0就代表农村劳动边际产品为零的这部分劳动力。由于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使得传统农业部门一开始就可以对现代城市部门提供具有无限弹性的劳动力。当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城市部门逐渐吸收完毕，抵达第一个转折点，即“刘易斯第一拐点”M0之后，如果城市部门的扩张仍然需要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则会先吸收M0M1段代表的农村劳动力。尽管农村劳动力边际产品已经为正，由于城市工资仍高于其边际产品，所以他们仍会被更高的城市工资所吸引而进入城市。M0M1这部分农村劳动可被视为准剩余劳动。如果城市部门继续扩张，则在M1点之右，由于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城市部门的劳动边际产品已完全相等，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于是正式形成，经济发展就结束了二元经济的状态，转化为新古典学派所说的一元经济状态。此时，无论在农村就业，还是在城市就业，他们的劳动收入是相等的。在M1之右，劳动供给曲线相对AB段更加陡峭。M1被称为“刘易斯第二拐点”。

“刘易斯第一拐点”的到来预示着剩余劳动力

无限供给时代即将结束，“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刘易斯第二拐点”的到来，则表示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的彻底结束。由此看，在正常的市场经济下，抵达刘易斯第一拐点的时间必定在抵达第二拐点之前，必定在吸收完了剩余产品为零的农村劳动力之后，才接着开始吸收那些边际产品为正的农村劳动力；必定在吸收完了边际产品较低的农村劳动力之后，才接着开始吸收那些边际产品较高的农村劳动力。这是刘易斯模型隐含的根据吸收农村劳动力边际产品，由低到高吸收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的顺序。在20世纪下半叶，以东亚经济体为代表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利用“人口红利”，不但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而且实现了农业现代化，一跃而进入发达经济体的行列。不过，不少发展中国家却迟迟没能抵达刘易斯拐点，或者在抵达刘易斯拐点之后，没有找到新的经济增长方式，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深入考证和解析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和如何抵达刘易斯第一拐点、刘易斯第二拐点的先后顺序，对于正在努力防止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尽快跨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当代中国，应该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收稿日期：2017-01-06 责任编辑：垠喜）

【本期论题】

特大城市：放松户籍管制探讨

陈钊

（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摘要] 特大城市的户籍改革是当前的政策焦点，特大城市严格的户籍控制使城市现在与将来都会付巨大的代价。未来改革的思路是在顺应大城市发展道路的前提下加快放松户籍管制，并实现基于常住人口的人大代表选举。

[关键词] 户籍制度 放松管制 城市化

[中图分类号] D03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 (2017) 01-0025-03

[作者简介] 陈钊（1973—），浙江舟山人，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研究方向：中国问题（应用微观），涉及产业政策、环境治理、城乡与区域发展等。

一、特大城市户籍改革是政策焦点

在中国，户籍制度的内涵是不断变化的，如今中小城市的落户已经变得相对宽松，而特大城市的户籍门槛仍没有明显变化，依旧实行着严格的政策控制。与此相关的，政府对城市化道路的选择也在不断调整，对大城市的人口导入限制有所放松，但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仍然受到政策的严格控制。

在近期有关户籍制度改革的政策文件中，2016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实施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若干财政政策的通知》（国发〔2016〕44号），与之前的有关政策文件相比有较大的突破。该文件内容有三点尤其值得一提：第一，扩大公共服务，包括义务教育、中等职业教育，都要向外来转移人口放开。政府财政要对向外来人口提供义务教育、中等职业教育的地区进行转移支付；第二，随着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各项改革措施、制度需要衔接，

很重要的就是医保的接续，能够实现异地就医结算。第三，维护农民土地权益，包括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可以在获得城市户籍身份的同时予以保留。最后一点如果真的得以实施，可以说这一步迈得相当之大。

从实践进展以及政策动态来说，户籍制度改革已经取得不少成绩，但最终的焦点也显得越来越为突出，那就是，对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应不应该人为限制，特大城市是不是应该加快放松户籍准入。换个角度来说，眼下我们需要回答的政策问题是，如果政策按照国发〔2016〕44号文的内容来推行，对特大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就显得不那么紧迫了吗？而我想说的是，虽然政策有了很大突破，但放松特大城市的户籍管制，既符合特大城市的长远利益，也符合国家的整体利益。

二、特大城市户籍严格管制代价高昂

看起来，对大城市利益的强调恰恰是当前户籍管制的重要理由之一。以户籍积分制为例，其背后所反映的理念就是，通过人为的方法控制谁能够落户，谁不能够落户，而积分的高低恰恰反映了这个城市的管理者所认为的落户者对城市的价值。对市民化成本的讨论也反映出类似的理念。言下之意，如果给外来人口解决一个本地的户口指标，城市就要为他提供各种公共服务，而这是要由城市来支付成本的。因此我们应当要算一笔账，如果市民化成本太高，就应该通过严格的户籍管制对落户加以控制。

但既然要算账，就必须算一笔明白账，应当把潜在的成本与收益都考虑在内。事实上，目前严格的户籍政策也在让特大城市付出代价，只是我们对此有所忽略。例如，对于那些在城市里面长期生活的“农二代”们，他们或被城市吸引，或早已不能适应农村的生活，想让他们彻底离开城市是不现实的想法。如果城市为了控制人口规模，不让他们融入市民化，甚至在他们未成年之时就通过限制教育等手段来“教育控人”，那么不仅他们未来的人力资本积累，还有他们的心态，都会受到不利影响。这一定会让城市在不久的将来付出代价。试想一下，在北京上海户籍管制最为严格，而这样的特大城市，也正是我国老龄化问题最为严重地方，不可避免地，这样的城市以后需要大量的年轻人提供养老服务。而在这些预备为城市提供养老服务的人里面，其中相当一部分，不正是现在城市不太想让他们进城，或是城市无法将他们赶走，也不想为其提供更好公共服务的“农二代”们吗？就算他们被挡在城市之外，成了大批留守儿童中的一员，也有研究告诉我们，他们的人力资本积累会受到影响。在未来的10年、20年，这些人的人力资本、技能水平，包括他们的心态能够为城市提供满意的服务吗？这对城市来讲不是一笔损失吗？这个账不能不算进去。

特大城市的产业升级也需要户籍管制的放松。当劳动力、土地的成本不断提高时，未来特大城市的竞争力需要依靠产业升级来保证，而这又势必对劳动力的技能水平提出更高的要求。产业升级如何

实现？现在看来应有两个办法，涉及两种投入要素，一个是物质资本，一个是人力资本。依靠物质资本就是增加投资，甚至用先进的机器人代替劳动力。依靠人力资本就是为大量的产业工人、农民工提供技能培训，包括从一开始就给他们提供更好的教育服务，让他们拥有更好的人力资本积累。第一种做法是有风险的。我们是投入大量的机器设备，但这些机器还是需要人来操作的。此外，即使劳动力很大程度上可以被机器替代，那么，这就意味着以后可能有大量的低技能劳动力失业，全社会的收入差距就会越来越大。这些都是潜在的危害。

事实上，我们不用等上太长时间，户籍管制让城市所付出的代价我们早已经在承担。目前特大城市希望通过户籍门槛筛选出高端人才留在城市，而将所谓的低端人才挡在城市之外。但事实上我们真的很难对人才作这样的区分，政府想像中的低端人才很可能是城市更为需要的，城市缺的往往是保姆而不是大学毕业生。为什么不交给市场来决定人才的去留呢？诸如保姆、钟点工、快递员、专业司机等等的流动人口只要在城市有立足之地，就不应当人为限制他在城市的发展，不然的话结果肯定是这部分人的供给不足，从而致使城市的生活成本和服务价格偏高。相信这种状况对高端人才的生活需求及福利水平也免不了有影响的。

而且，这样的户籍制度对农民工家庭的幸福和谐也有不小的负面影响。应当看到，这不只是农民工自己的事情，也不只是农村人口的事情，如果他们不和谐，不幸福，与城市的福利水平差距过大，就一定会通过各种渠道对城市产生负面影响。这可能表现为城市的食物安全问题、城市的生活治安问题，这是笔更大的账，我们也必须得算。

我们也可以反过来看放松户籍管制带来的潜在好处。一旦劳动力要素能够自由流动，资源在空间配置的效率就会提高，城市的产业升级与中国的国际竞争力也有了更好的人力资本保障，城市化、工业化与市民化也就能够同步实现，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就会缩小。

三、未来的改革思路

我曾在另一篇文章中，以公共服务的付费机制为核心，从扩大公共服务、完善付费机制、措施先易

后难这三个层次讨论过未来户籍制度的改革步骤^①。这一改革思路在目前仍然适用。此处，我想结合前述国发〔2016〕44号文件，讨论未来的改革思路。该文件与以往相比，在政策上有很大的突破，但对特大城市的户籍问题依然没有放松的迹象。而我们前面所分析的户籍管制的各种代价，主要都集中体现于特大城市。因此，特大城市的户籍改革是无法绕开的问题。对这个问题认识不清，则可能在其它的改革措施上产生偏误。例如，44号文提到了市民化的奖励机制，其中一条是向中西部的中小城镇倾斜。这就与劳动力向东部沿海地区，向大城市集聚的市场趋势相悖，不是有效率的做法。

44号文在赋予进城落户的农业转移人口保留宅基地权利、土地承包权利、农村集体收益分配权的同时，也提出要健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的市场，建立土地权利的退出机制。这事实上是给进城农民更多的选择。但可惜的是，目前这样的产权流转仍被严格限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对交易范围的这一限制将使农民土地权利的市场价值大打折扣。在这一点上，我们仍然有很大的制度创新的空间。正如该文件中提到要多渠道筹资支持进城农民居住、创业和投资，而所有可能的渠道中，恐怕最重要的

还是农村土地权利的变现。只有这样，外来转移人口才可能在生活成本日益提高的特大城市真正实现市民化转变。

最后，我想再次强调，户籍制度改革事关民生和国家发展，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关键性制度变迁。我国城市户籍制度改革面临的问题现实而又紧迫，在一些中小城市，本地户籍人口本来就比较少，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外来人口就愈来愈超过城市本地人口。尽快实现市民化，让外来人口真正成为城市中的一员，他们真正建立了公共意识，城市社会才是和谐的。我认为，未来实现城市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制度保障，就是进一步推进基于常住人口的人大代表选举，让主流渠道成为农业转移人口进行利益诉求的通道，这是比户籍制度改革更为一般性的未来改革的方向。

参见：陈钊，2015，《面向和谐发展的城乡融合：目标、难点与突破》，《国际经济评论》，第3期。关于户籍制度改革与城市化问题，读者也可参考与本文相关的其它研究：陈钊、陆铭，2008，《中国如何在平衡区域发展时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学习与探索》，第3期；陆铭、陈钊，2009，《为什么土地和户籍制度需要联动改革——基于中国城市和区域发展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学术月刊》，第9期，78-84页；陈钊、陆铭，2009，《在集聚中走向平衡：中国城乡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实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陈钊、陆铭，2011，《户籍制度改革的多赢方案》，《文汇报·文汇报》，3月28日；陆铭、陈钊，2013，《户籍制度改革步骤、措施及可行方案》，《东方早报》，8月27日；陈钊、陆铭，2016，《迈向社会和谐的城乡发展：户籍制度的影响及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陆铭，2016，《大国大城：当然中国的统一、发展与平衡》，上海人民出版社。

Megacity Behemoths: Relaxation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Control

Chen Zhao

(China Center for Economic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Abstract: The key point of Hukou system reform in China is to deregulate population control in mega cities in order to avoid efficiency loss.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hould also encourage all urban residents to vote members of local People's Congress.

Keywords: Hukou system, Deregulation, Urbanization

(收稿日期：2017-01-04 责任编辑：垠喜)

【本期论题】

征地留用地在城中村转型中的作用

王瑞庆

(西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重庆 401120)

[摘要] 征地留用地是政府在征用集体土地时,按照征地面积的一定比例核定用地指标,让被征地村级集体用于发展二、三产业,壮大集体经济,安置失地农民。虽然征地留用地仍为原“村籍”农民共有,但土地性质已转为国有,开发和使用不存在制度障碍。通过物业入股、合作开发、自主开发等多种留用地开发方式,引导原村级集体经济由出租物业经济向投资型、产业服务型经济转型。公司制或股份合作制管理模式使原村级集体经济逐渐向市场主体转型。折股量化的收入分配方式使原“村籍”农民转为“股民”,解决了村级集体经济产权虚置难题。留用地是我国现有土地制度下集体经济成功转型的一条途径,建议国家将其法制化和制度化。

[关键词] 城中村 集体经济 留用地项目 杭州

[中图分类号] F30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17)01-0028-06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5YJC820016)。

[作者简介] 王瑞庆(1981—),河北保定人,西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土地政策。

一、引言

推进“城中村”城市化,是一项整体、系统的改革。从目前普遍采取的失地安置补偿政策看,失地农民已经获得一定的土地增值收益和与市民等同的社会福利。然而,由于失地农民受劳动技能的制约,就业和长远生计问题仍是制约城市化质量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事实已经证明,发展原来村级集体经济是失地农民经济收入的稳定保障。

当前“城中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虽然经济结构已经实现非农化,但普遍以土地为依托,以物业经济为主导,多数实行非企业化经营,难以向投资型、产业服务型经济转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城中村”集体经济只有向市场主体转型才能实现持续发展。不过在现行的土地制度下,集体经济转型面临四重困境:一是集体土地如何归属;二是“寄生型”经济形态如何参与市场竞争;三是“政企不分”的管理体制如何转为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四是模糊的集体产权如何转为产权清晰的现代产权制度。突破口在哪里呢?运行了30多年的征地留用地安置政策,在原集体经济在向市场主体转型方面也表现出了明显优势。但是目前学界和媒体对征地留用地仍持疑虑。对留用地合法性的质疑,一是认为留用地与现行法律冲突,二是认为留用地政策的落实缺乏法律支撑和保障。对留用地政策可行性的忧虑,主要观点是认为留用地政策适合在“城市规划稳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房地产市场成熟,土

地需求较为旺盛的地区实施”，但是还面临着规划衔接、地权归属、管理困难等问题。这也是征地留用地一直没有上升为国家层面的土地政策的重要原因。目前的研究和认识以“问题——对策”为主，对征地留用地发挥的作用还未全面认识，尤其是在“城中村”集体经济转型方面的作用，鲜有论述。

杭州的征地留用地开始于1999年，现在已经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果。我们依托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多次走访职能部门咨询相关政策，并且深入调查丁桥镇、三义社区、江口社区等留用地项目，对征地留用地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本文拟在梳理当前集体经济发展困境的基础上，结合杭州留用地项目开发和发展的情况，分析留用地在“城中村”集体经济转型中的作用，以期对当今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有所裨益。

二、征地留用地可扫除 城中村集体经济转型的制度障碍

（一）征地留用地的法律属性

学界对“城中村”城市化过程中集体土地的归属问题存在很大争议，有学者甚至提出修改宪法。事实上，这个难题在现行法律体系下是可解的。因为《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6条第2款规定：“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的，应当将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交回发包方，承包方不交回的，发包方可以收回承包的耕地和草地。”

《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条第5项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全部成员转为城镇居民的，原属于其成员集体所有的土地归国家所有。”由此看来，农民转为市民后，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土地符合法律程序。当然，前提必须是农民享受与市民平等的社会保障和国家福利。因此，将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土地和将农民转为市民同时进行，不是制度方面的障碍，而是农民是否真正享受了市民待遇。杭州在农民市民化方面采取的措施是：按照“房改房”的标准对原“城中村”的“农转非”房屋办理“三证”——《房屋产权证》、《房屋契证》、《国有土地使用证》，允许失地农民的拆迁安置房转为国有土地上的商品房。同时，为失地农民办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就业培训、提供最低生活保障等。这种措施对农民个体来说，确实享受了市民

的待遇。而对于村级集体经济来说，随着农民转为市民，其附着的土地也就转为了国有土地。因此留用地也并不是如学界所说的没有法律依据。

目前，全国征地留用地都已经转为建设用地，但有些地区还存在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两种形式，比如惠州就规定城市规划区内的留用地为国有，规划区外则无限制。两种不同的权属，在转让、出租、抵押等方面有很大差异。有些地区在留用地使用权取得方面也不明确，例如，广州以“无偿返拨”的方式返还留用地，但相关文件中又没有“返拨”的概念和操作方式。杭州留用地的获取方式协议出让，不过社会上对杭州征地留用地的性质还存在误解，认为是集体土地上的“小产权房”。事实上，杭州“撤村建居”地区的留用地已经参照征收集体土地的补偿标准予以补偿，统一纳入市政府土地储备库（杭市委[2001]29号文件），由市政府整理成“三（五）通一平”的成熟地块，然后以国有土地划拨的方式返还给原村集体。留用地上的项目可以办理“国有土地证”、“契证”、“房产证”。这样，留用地项目与国有土地上其他项目的开发经营几乎没有区别：先由村集体（撤村建居之后是社区）向发改委申报立项，然后须同国有土地一样走“招拍挂”程序，再进入开发阶段。以国有土地划拨的方式，给原村集体返还留用地，土地权益、性质、经营等方面的难题也就迎刃而解。另外，留用地项目仍为原村集体所有，产权不能分割到户或转让，但盈利折股量化到户（人），所以产权不能分割，对原“村籍”农民收益的影响不大。

有学者质疑征地留用地的公平性，认为现在的征地补偿标准太低，应将大部分土地增值收益留给农民。这一观点忽视了我国土地公有制和土地增值收益的特殊性。在我国现行土地制度下，影响集体土地增值的主要因素：一是区位因素。二是制度“红利”。在城乡二元土地制度下，我国采取严格的土地使用管控，建设用地稀缺，集体土地只有转为城市国有土地后，使用范围才更加广泛。三是土地使用性质的转变。集体土地农转非后，会有更多机会积聚资本，地价也会迅速增长。四是土地物质环境的影响。“城中村”土地级差地租显然要受到周围国有土地上的直接投入、大型配套设施建设的影响。可见，“城中村”集体土地增值的主要因素就是制度因素。我国实行的是土地公有制，如果在

农民获得与市民等同的社会福利后，继续让这部分农民及集体源源不断地获得巨额的土地增值收益，则会形成双重保障，又造成一种新的不公平。因此，给原“村籍”农民留一定比例的国有土地来解决就业和收入问题，具有合理性。

有学者认为在政策文本上各地留用地的比例不一致，相关文件也没有明确规定，容易损害失地农民利益。事实上，由于各地城市规划稳定性不同，经济发展水平有差异，更适宜各地因地制宜的划定留用地的比例。目前多数地区采用10%~15%这一比例，这一比例究竟是如何确定的，我们在相关的研究成果和调研过程中都没有获得准确的答案，此问题留待以后再作专门研究。

（二）征地留用地指标的落实

“城中村”改造和开发的形势比较复杂，各村情况不一，落实比较困难，这也是目前学界对留用地质疑的一个因素。杭州留用地指标落实方式比较灵活，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落实难和开发难的问题。

1. 留用地指标折抵。留用地指标可以折抵符合要求的“未办理出让手续的村属企事业单位地，”也可以折抵“多层高层农居建设中的配套公建”（杭政办[2005]128号文件）。这种办法解决了原村级集体企业转型的制度障碍。西湖区古荡村的浙江国力大酒店项目就是折抵了留用地指标。

2. 留用地货币化。如果留用地指标无法定点或折抵，可由村自愿选择“指标货币化收购”，收购价格按同类地段商业用地基准地价乘以年度地价指数乘以55%确定（年度地价指数由市国土资源局统计后确定），货币化收购资金由各级财政支付（杭政办[2005]128号文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受财力、物力和人力等因素限制自动放弃安置留地的”（浙土资发[2006]23号文件），可以货币形式回购安置留用地。这种方式确保了无地可留的情况下留用地指标的落实。

3. 留用地指标置换。为了资源整合，达到最大的集聚效益，留用地可以打破乡镇、村的界限，由区、乡镇政府统一组织、统一协调，相对集中使用（杭市委[2001]29号文件）。例如，拱墅区的孔家埭与石塘的经济合作社，就进行了指标置换。孔家埭出48亩地，用石塘的留用地指标开发。建设时，各24亩地，既有了用地指标，也有了区位优势。

杭州这种“固化权益，虚化区位”的做法还

有更深刻的意义，一是消除了原村级集体建设用地发展的瓶颈，转为国有土地后，在转让、出租、抵押等方面将获得很大收益；一是解决了留用地落实难、布局分散、使用效率低的问题。地块规划选址，主要集中在区位较好、市场发展相对熟化的区域，提高了留用地项目的商业价值。一般认为，在指标落实过程中，指标如何兑现，如何落实，目前没有文件明确规定，主动权在政府手中，失地农民处于被动地位。其实解决这个难题完全可以通过法律文件进行规范。

三、征地留用地项目的开发和管理 带动集体经济向市场主体转型

目前，全国各地留用地的开发有三种方式，一是农户个体独立经营，二是由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经营，三是政府主导经营。学界对这三种方式都有疑虑：农户个体独立经营留用地，会有效率低下的问题；集体经济组织在资源发生转让、定价的时候，信息成本比至于自用陡然上升，更容易攫取成员的权益。政府主导经营容易使农民处于受制于人的不利境地。虽然政府主导模式确实容易出问题，但是也有一定的优势存在，姚如青研究了杭州集体开发模式和温州的个体开发模式，认为政府主导的重组集体开发模式更能使留用地可持续发展。在我国现行土地制度下，土地增值主要是制度红利，农民个体分散开发利用土地的收益实际上不能与国有土地集中利用获得的收益相比。下面看一下杭州的情况：

（一）征地留用地项目的开发

“城中村”的亲缘、地缘、血缘特性决定了集体经济的自我封闭性，这是制约集体经济取得规模效益和转型的重要因素。杭州留用地的物业入股、合作开发、自主开发、产业服务等多种开发模式，打开了面向社会融资的渠道。

1. 合作开发。允许原村集体以土地或土地指标折价入股的方式找开发商合作开发，但村集体持股比例不得低于51%。依据公司法或者经济合作社组织法进行经营管理。一般原集体经济实力比较弱的采取这种经营模式。江干区四季青街道三义社区的新业大厦和广新商厦项目、五福社区的五福新天地项目、三堡社区的东方大厦、笕桥镇佰富勤商贸广场

项目等，都属此类模式。

2. 租赁经营。按土地面积收取每亩七至十万元的固定回报，并在几年后按比例提高租金，租期一般是30年到50年，期满收回物业。例如，三墩的创美华彩国际和剑桥公社就是租赁形式。这种方式不管原来村集体有没有经营能力，都可获得稳定收益。

3. 自主经营。一些经济实力较强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会选择自建，如留下村建造的商业综合楼，虾龙圩村建造的虾龙圩综合楼（紫金港大酒店）。这种经营方式保证了集体的绝对占有权，而且从自营逐渐转向与社会资本合作经营，将农村集体拥有的各类资产和潜在优势转变为现实的增收能力。杭州在招商方面也进行了优化，引进银泰、美达等知名企业及项目，增强开发建设的投资吸引力。

（二）征地留用地项目的经济形态

就“城中村”集体经济目前发展趋势来看，虽然用地越来越收缩，但是随着利用征地补偿款等资金修建房屋来出租，出租经济呈现增强趋势。这种“借地生财”的发展模式，缺少自主产业和高附加值产业，抗风险能力差。各地对于留用地的经营一般没有严格限制，温州的留用地可用于开发房地产，而典型的厦门“金包银”模式、长沙咸嘉湖模式对留用地的开发都无明确规定。杭州对留用地的开发有严格限制：鼓励被征地集体利用留用地兴办二、三产业，并规定可用于发展除一次性销售的商品住宅外的所有二、三产业，包括标准厂房、商场、宾馆、写字楼等经营性项目（杭政办[2001]15号文件）。通过提高物业管理和改善投资环境，把留用地项目打造成以营利为目的的市场主体，引导集体经济向投资型、产业服务型经济转型。由此证明，出租经济也可以向实业经济转型，但是需要政府政策支持和引导。

（三）征地留用地项目的管理

“城中村”虽然以出租经济为主，却没有与之相对应的公司或者其他专门的经营实体，普遍以非企业化经营为主，由村集体领导班子管理，缺乏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而且容易出现腐败、寻租等问题。杭州“撤村建居”和“村改居”过程中已经将村委会的经济职能剥离出去，留用地项目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

一是实行集团公司制。原集体经济实力强的

合作社、村办企业成为集团公司的一个法人股东或原村经济合作社中的村民成为公司的自然人股东，依据《公司法》进行管理。拱墅区东新经济合作社与海外海集团公司进行整体合并后，上塘镇沈塘湾村经济合作社与建华集团整体合并后，都是实行的公司制管理。公司制管理模式能够理清企业产权关系，将企业转化成资本开放的社会性企业。

二是实行股份合作制。原村级合作经济实力较强，以二、三产业和租赁经济为主的合作社，将全部资产进行评估，剔除待处理资产后量化给原村全部村民。拱墅区的八丈井村经营者持股20%，原村民人人有股份。原村级集体资产由村和组两级所有的，将之分两级进行量化，村民享有村级和组级双重股权，分配时享有双重收益。拱墅区的李家桥村、阮家桥村、吉如村都是这种模式。公司制和股份合作制创新了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打破了集体经济组织资产的自我封闭式占有和循环，促进产业结构向高级化和现代化方向发展。

总体来看，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政府主导下的集体主义开发模式能够促进集体经济组织较为彻底的转为以营利为目的的市场主体。这种开发模式的形成，一是原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原本就掌握着大量的集体土地，如珠三角桑基鱼塘地区；二是政府在城市土地利用过程把“城中村”纳入统一规划，进行规模开发，也就是杭州这种情况，“打破乡镇、村设的界限，由区级、乡镇政府统一组织协调”（杭市委[2001]29号文件）。

四、征地留用地项目的收入分配 促使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

通过改革将集体资产量化到人，解决产权虚置问题，是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的目的。“城中村”改造过程中，农民虽然失去了土地，但他们仍然保留着“村籍”，并保留着村集体经济的股东权。留用地项目收益分配应该将集体经营性资产量化到人，实现“资产变股权、农民当股东”。

（一）留用地项目收益的量化

我国现在还没有集体资产量化分配的标准和规范，现在争议的焦点是集体资产的范围如何确定，是只包括集体经营性净资产，还是把经营性资产、非经营性资产和资源性资产都包括进来？事实上，

集体资产中的非经营性资产，基本上属于公益性资产，随着农民转为市民和集体土地转为国有，这部分资产也转为了国有土地上的资产，不需要进行量化。征收集体土地给予的补偿金，应该按照集体成员进行合理分配。集体土地上的经营性资产，收益量比较明确，容易量化。因此，集体资产量化应该以经营性资产的净资产量化为主。杭州对留用地项目收益分配也是采取的直接将净资产折股量化到户(人)(杭政办[1999]8号文件)的标准，以股权的形式明确社区成员(股东)在集体所有者权益中所占有的份额，并作为享有股利分配的依据。

(二) 折股量化的方法

对集体资产进行量化的关键问题是集体成员身份的认定。目前争议最大的是以“农龄”还是以“人头”为依据，以及股份是否可以转让。目前集体资产量化分配时，股权(份额)普遍以“农龄”计算。杭州的做法是：总量以“人口股”为主，对“城中村”改造以前已经转非的人口，依据“农龄”进行折算。“‘人口股’按撤村建居时实际在册的农业人口计数；‘农龄股’按社区成员满16周岁至退休前的农业户口身份年限计数。对撤村建居前已‘农转非’的原社区成员，可按其在本社内的‘农龄’，享受一定的折股量化股权或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偿。折股量化时对在校大中专学生、入伍战士以及劳教等人员的股权‘也可作相应考虑。在折股量化总额中’，以‘人口股’为主，具体比例由社区成员民主讨论后，按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同意的方案确定。”“原则上不随人口增减而变动；维持现有持股成员(股东)的稳定”(杭政办[1999]8号文件)。原“村籍”农民个人没有集体资产的处置权，只有收益的分配权。

五、结论和建议

依附于土地性质转型的集体留用地项目，不但可以促进集体经济的发展和转型，还顺利跨越了现有土地制度下的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之间的“鸿沟”，实现城市、社区、集体经济组织与村民、市民的多方共赢。虽然这一政策发挥实际效用，要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但是通过近年来杭州开发建设的尝试，在保证农民持续增收、加快城乡区域统筹发展、促进集体经济转型等方面，留用地已

突显出其独特的助推作用。尽管杭州的发展模式不能全盘复制，但是借鉴杭州经验，结合其他地区留用地的特点，对照集体经济转型的困境，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希望可以为“城中村”集体经济的转型提供参考。

1. 以政府文件形式，明确留用地政策。目前全国十几个省市都已经实行留用地政策，而且已经有了近30年的探索经验，取得了显著成效。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制”、“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2014年的中央1号文件中强调“加快推进征地制度改革。因地制宜采取留地安置、补偿等多种方式，确保被征地农民长期受益。”留用地政策也符合集体土地流转和征地制度改革的国家方向。因此，建议全面梳理《土地管理法》、《物权法》等法律中的相关规定，以政府文件形式，明确留用地政策，促进农村集体经济顺利转型。

2. 留用地政策文件中，需明确：(1)留用地使用权的取得方式。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土地被征用后，应以国有土地划拨方式取得留用地，面积控制在被征用的可转为建设用地的农用地总面积的10%~15%以内。(2)留用地的经营方式。留用地可用于发展除一次性销售的商品住宅外的所有二、三产业，包括标准厂房、商场、宾馆、写字楼等经营性项目。(3)留用地指标落实的方式。留用地指标可以通过指标折抵、货币补偿、指标置换的方式进行落实。(4)留用地项目的管理方式。留用地项目实行集团公司制或股份合作制管理，原村集体必须持有一半以上的股份。(5)留用地项目收益分配方式。采取直接将净资产折股量化到户(人)，以“人口股”+“农龄股”为折股方式。

[参考文献]

- [1]钱存阳, 易荣华, 等. 城镇化改造中集体经济对失地农民保障作用研究——基于浙江9个地区的调查数据[J]. 农业经济问题, 2015, (1): 50-58.
- [2]陈金田. 失地农民留地安置的个案研究——对厦门市“金包银”工程的分析[J]. 中国农村观察, 2006, (4): 56-64.
- [3]郑鸿伟. 海南省失地农民补偿安置对策研究——以国际旅游岛先行试验区为例[D]. 海南大学, 2015.
- [4]赵晓菊. 被征地村集体经济发展不可忽视——山东平度城郊农村失地农民和集体经济出路调查[J]. 农村经营管理, 2012, (10): 25-26.
- [5]赖丽华. 城中村集体经济改造模式研究[J]. 企业经济,

2011,(9):28-31.

[6]李晓伟.留地安置：现行法律框架下的困境与解脱[D].西南政法大学,2012.

[7]王权典.统筹城乡征地留用地保障政策之法律研析[J].行政与法,2010,(2):36-40.

[8]黄亚云,金晓斌,等.征地留用地安置模式适用范围的定量评价与实证研究[J].城市发展研究,2009,(3):68-72.

[9]金晓斌,魏西云,周寅康,等.被征地农民留用地安置模式适用性评价研究——分析浙江省典型案例[J].中国土地科学,2008,22(9):27-32.

[10]张善斌.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的障碍排除与制度完善[J].法学评论,2014,(2):95-102.

[11]黄忠.城市化与“入城”集体土地的归属[J].法学研究,2014,(4):47-62.

[12]李培林.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8.

[13]2014年《杭州城市问题(“城市病”)问卷调查·土地问题卷》数据库。

[14]唐健,李珍贵,王庆宾,等.因地制宜地稳妥推进留地安置——基于对10余省份留地安置的调研[J].中国土地科学,2014,28(4):91-96.

[15]王惠.留地安置政策存在的问题及法理分析[J].农业经济,2008,(9):26-29.

[16]郑沃林,谢昊,郑荣宝.农村留用地开发问题与对策[J].中国土地,2016,(6):24-27.

[17]周其仁.产权与制度变迁 中国改革的经验研究 增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11.

[18]付伟.政府中心论压垮留用地政策 [EB/OL].(2009-06-22)[2016-02-04]. <http://house.hangzhou.com.cn/20090728/ca1763777.htm>.

[19]姚如青.农村土地非农开发和集体经济组织重构——基于浙江两种留地安置模式的比较[J].中国经济问题,2015,(6):37-48.

[20]周锐波,闫小培.集体经济：村落终结前的再组织纽带——以深圳“城中村”为例[J].经济地理,2009,29(4):628-633.

[21]方志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若干问题[J].中国农村经济,2014,(7):4-14.

The Role of Land – retention Land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Village

Wang Ruiqing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chool of Marxism, Chongqing 401120)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role of return land for land-lost peasants in urban village collectiv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Method of case analysis was employed.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transfer of ownership between the nation and the collectiv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dicators, the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of the project of return land resettlement pattern in Hangzhou city, which has achieved two goals: First, it realized an industry to upgrade with transition; Second, it turned into the market entity. It is concluded that this is a successful way in the existing land system, which should be legalized and institutionalized.

Key words: Urban Village, Collective Economic, Return Land for Land-lost Peasants, Hangzhou

(收稿日期：2016-12-28 责任编辑：廖令鹏)

【本期论题】

东西部城市差别化土地政策讨论

马长发，叶剑平

(新疆财经大学统计与信息学院、新疆社会经济统计研究中心，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2；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100872)

[摘要] 本文基于公平视角考察东西部建设用地资源配置中的公平问题。当前看似公平的土地政策实际对西部不公平，东、西部地区发展起点不公平的后期连锁效应，也很易导致其在发展过程和结果上的不公平。应基于差别原则，对西部地区实行更具政策梯度和实质优惠的差别化土地政策；基于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维护过程实际公平，按最佳城市规模采取城市发展用地中的分级限制政策。

[关键词] 罗尔斯公平理论 城市土地利用 政策

[中图分类号] F32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17)01-0034-04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263049)；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463054)；博士后基金面上项目(2016M602948XB)；新疆自治区社科基金项目(2015BJY018)；新疆人文社科研究基地重点项目(050314B01)；新疆人文社科研究基地项目(XJEDU010612C12)；博士后流动站研究项目：哈萨克土地政策对国际经贸合作影响研究。得到新疆社会经济统计研究中心的支持。

[作者简介] 马长发(1975—)，新疆乌鲁木齐人，新疆财经大学统计与信息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土地经济与土地政策；叶剑平(1962—)，福建沙县人，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土地与房地产政策。

我国30多年来经济快速发展实际是以土地大量投入为支撑的，随着土地资源的稀缺性日益显化，区域间和城市间争取建设用地扩张的竞争愈演愈烈。当前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很大程度上依然表现为效率第一，公平被忽视，农民的权益被轻易剥夺。计划内指标和城乡增减挂钩指标作为城市建设用地的两个主要来源在今后如何操作，如何在区域间和城市间比较公平地实现土地资源的分配，达到“效率与公平兼顾”，下一步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该怎么走，需要一些新的认识。

一、公平视角下的土地资源分配

城市化中土地资源分配的公平分配是以起点公平、机会公平及过程公平为基础和前提的，否则，分配就将是缺乏效率的，或者将是不可持续的。1994年中央政府实行分税制以来，各地方城市成为经济发展的竞争主体，土地资本化成为城市化发展的杠杆，对土地资源的占有和支配成为影响城市发展至关重要的因素。城市发展必然存在竞争，而城市主体之间“竞争能力”的非合理差异是影响城市

间竞争“起点公平”的主要因素，而由城市主体之间“资源占有量”存在非合理差异决定了城市竞争的非合理差异。因此，城市之间存在竞争起点不公平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城市主体之间“资源占有量”的非合理差异。

城市竞争主体的“理性”选择是追求利益最大化，为了获得竞争优势，各城市主体会采取各种不公平竞争的行为。因此，保证竞争过程的公平，是实现区域公平发展的核心。而中国的东部发达地区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目前正处在这样一个状态。在上世纪80年代，东部地区，尤其是特区，在土地、税收等方面得到了优惠，我国东西部的城市用地在竞争起点上存在着显著的“资源占有量”的非合理差异。区域和城市竞争中的竞争起点不公平是一个既成事实，我们应做的是基于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差别原则），并遵循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提供尽可能完善的差别化的土地、户籍、财税、金融等制度政策，以矫正各区域和城市主体之间在竞争起点上的各种“资源占有量”的非合理差异导致的持续影响，以程序的公正尽可能的引向资源配置的结果公平。

二、看似公平的土地政策实际对西部不公平

1. 发达地区以财政补贴政策打破了现有土地供给政策的实际公平

在当前我国政绩考核机制、财税体制、非市场化低价征地、以及地方政府竞争策略选择背景下，地方政府选择外延式扩张模式的经济收益和政治收益都明显高于内涵式扩张模式，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制度变迁等要素对生产率的提高更多表现在增量土地上，因此，在经济增长方式未获得转变前提下，未来较长时间内，无论东中西部都将保持对土地要素的高需求。

基于“理性人”选择，在国家统一的看似公平的土地出让政策和标准下，各区域为了取得相对的竞争优势会采取各种不公平竞争的行为。例如，当前土地“招拍挂”政策和“工业用地统一最低标准”等政策考虑了欠发达地区的经济水平，看似公平，但在执行过程中却因规则变异而失效。因为研

究发现：东部地区对开发区新增工业用地的补贴最多，中部次之，西部最少。东部地区利用自身已有的财政优势采取地方政府补贴，依然能够实行比中西部更优惠的招商引资供地政策。东部发达地区因为区位优势，先发优势，财力补贴优势而采取的不公平竞争的行为会严重破坏土地市场秩序，甚至使土地秩序彻底失效。这些不公平竞争的行为会严重破坏土地市场秩序，甚至使土地秩序彻底失效，进一步加剧不平衡发展过程。

2. 东部可以更高的“土地级差收益”获得更多发展机会，中西部落后地区处于发展受阻

现在发展最快的，是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这些基本都属于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先发展起来的大城市以更高的“土地级差收益”获得更多发展机会，小城镇本身级差地租收益低，无法与大城市“竞争”而造成发展受阻，因此，在竞争起点上居于优势地位的大城市在以后竞争过程中继续保持获得机会的优势，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处于发展困境。而我国“三大增长极”都位于东部，大中城市也多位于东部，这种现状导致在同样严厉的土地政策下，东部可以更高的“土地级差收益”获得更多城乡建设用地置换的机会，而落后地区本身级差地租收益低，无法与发达地区“竞争”而处于发展困境。

3. 西部为东部承担外部成本

城市化对耕地的前期占用和破坏，及后期保护和限制是普遍规律，但不同区域和城市作为资源分享的主体，其分享土地资源的权利和机会应该是平等的。东部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发达城市在改革初期都经历了大规模的廉价征用农地，低价，甚至负地价提供工业用地招商引资的阶段。东部早期为人诟病的“村村点火，户户冒烟”虽然有诸如环境生态等弊端，但却利用改革初期宽松的政策环境为城市发展极大降低了土地非农化的成本，为城市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规模基础，而后发展的区域或者之前“听话”的城市在后来的发展中却遇到了更严的土地管控和更高的扩张成本。东部发达地区在早期率先发展中通过“土地换资本，空间换发展”策略获得低成本高速扩张，造成的耕地紧张，环境污染等问题却要中西部地区同样承担“全世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西部为东部发达地区承担外部成本，在一定程度上是“东部生病，西部吃

药”。更需关注的是西部正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起步发展期，同样严厉的土地政策是“砍了东部的尾巴，斩了西部的头”。这种部分地区和城市先期非理性占地，后期所有地区和城市共担责任的事实，本质是前期公共管理政策的失误所致，是一种基于城市和区域发展的起点不公平，其后期连锁效应也很易导致城市和区域在发展过程和结果上的不公平。

4. 主体功能区规划可能存在的缺陷

资料显示我国22个限制开发地区，西部占了17个。主体功能区划分标准有欠严谨。和主体功能区战略配套的各种投资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环境政策、地方政府考评体系等方面存在不完善，这种现状势必导致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不仅在短时间内不会缩小我国的区域发展差距。相反，在相关配套政策不到位情况下，随着主体功能区战略的推进，我国区域间的差距将会扩大，而不是缩小。

主体功能区战略的确定很大程度上依据所谓因地制宜原则，其理论依据遵循静态比较优势理论，研究发现，改革开放30多年来西部只有资源密集型行业的比较优势得到了强化，基于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固有缺陷容易导致产业结构的“低端锁定”。根据对西部欠发达典型区新疆的研究发现，新疆资源优势未能有效转换为竞争优势，“比较优势陷阱”凸显，资源诅咒特征明显，甚至处于资源诅咒严重区。在这种现状背景下，由于主体功能区的核心逻辑是对外生条件和历史事件的绝对遵从，相比发达地区，主体功能区战略对落后地区具有更大限制作用，其“东西互动，优势互补”策略会不会加剧西部的资源依赖，加剧“资源诅咒”，也值得思考。

三、基于公平理论的解释

实际上，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西部大部分落后地区与沿海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差距并不明显，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1992年开始实行市场经济之后，东西部差距加速形成并不断扩大。西部地区落后的原因，一方面遵循西方经济理论所阐述的一般机理，另一方面也具有其特殊性，这是西方经济学的某一种理论所无法完整解释的。而根据公平理论则可以得到可能的解释：竞争起点不公平将持续影响过程不公平，并导致结果不公平。东西部城市发展竞争中，如果在竞争起点上

存在明显的“资源占有量的非合理差异”并进一步引起竞争力差异，随之而来的过程中，这种“不公平效应”将会被持续并放大，必然会导致“不公平的结果”。而这一“不公平的结果”进而又会在新一轮竞争中成为新的“不公平的竞争起点”，进入新一轮不公平竞争的循环。

如果能保持过程公平，东西部城市在竞争起点上虽然存在“初始条件的差异”，但有可能在竞争过程中通过自身努力缩小差距，但是，在起点上居于优势地位的竞争主体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竞争过程中的规则，其目的是在竞争过程中也保持竞争优势，这种形态的竞争常常“貌似公平，实质上却不公平”，最终导致非公平的竞争结果。因此，在竞争起点上居于优势地位的城市竞争主体在竞争过程中继续保持获得机会的优势，后发的地区和城市处于发展困境。欠发达地区欲享受东部地区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优势政策资源几无可能。在东西部城市用地政策方面，由于起点竞争不公平可能导致的过程（规则）不公平，有必要进行相应矫正，以利于东西部区域均衡发展，和谐发展。

四、结论和建议

研究发现，当前“中国最严格的耕地政策”，“集约节约用地”等政策虽然有合理性和必要性，但对于处在工业化初、中级阶段的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形成了客观上的制约作用，存在为先获得发展的东部地区承担外部成本的嫌疑。我国新的区域发展总体格局已全面形成“东部率先、中部崛起、东北振兴、西部开发”的所谓“四大板块”战略，区域间的激烈竞争表现在对产业的竞争。但我国区域援助政策体系存在严重缺陷，以前是“一刀切”，现在是普惠制，普惠制使得政策泛化，重点不突出，四大板块之间难以形成有效政策梯度，成为“都优惠就没有优惠”。甚至有研究指出落后地区获得的许多优惠是仿照东部的普及，并且西部的总体优惠水平还是低于东部，乃至不及“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的政策含金量高。

“公平分享”是改革发展成果分享的一个重大命题，公平化是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核心内容之一。针对东西部城市用地政策中存在的 unfair 问题，本文提出建议：

一是基于差别原则，对落后地区实行差别化土地优惠政策。当前的工业用地出让标准虽然是一种差别化地价的体现，追求“有保有压、区别对待”，但是否能体现基于公平理论的“差别化补偿原则”，尚有疑问。有必要对东西部土地政策落差进行时间上的纵向比较研究和现阶段空间上的横向比较研究，评价一下西部大开发的土地政策与东部早期和现阶段相比到底是优势还是劣势，然后结合各区域产业比较优势制订东、中、西部合理落差的土地政策，形成促进产业向西部转移的土地政策梯度，有利于东西部产业转移。

二是基于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维护过程实际公平。第一，对工业用地出让加强监管。虽然中央政府严令工业用地出让按统一标准进行，严格禁止财政补贴行为，但实际上由于信息不对称，中央政府甚至难以做好对地方政府违法用地的有效监控，对地方政府的变相补贴行为的监管将更难奏效，一方面，应该采取措施加强监管，维护土地参与宏观调控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土地政策的实际过程公平。另一方面，当前工业用地出让标准是否真实合理地反映了各地区之间经济差距，这个差距是否能够体现对落后地区合理的差别化补偿有待重新考量。本文认为基于差别原则，对西部“老少边穷地区”应该给予更优惠土地政策，甚至零地价政策，要保证土地政策竞争过程中的实质公平，并有利于土地政策梯度的形成。第二，按最佳城市规模采取城市发展用地中的分级限制政策。东部发达地区也有欠发达区域，西部落后地区也有发达区域，

无论东中西部，对发达区域和大城市应该提高土地要素价格，提高城市扩张成本，促进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对落后区域，中小城市和小城镇采取鼓励和支持性用地政策，有利于促进城市升级、区域均衡发展和提高当地人民生活水平。建议按最佳城市规模采取城市发展用地中的分级限制政策，据研究，城市最佳人口规模100~400万人口^①，按人均100平方米建设用地标准计算^②，最佳城市用地规模为100~400平方公里，建议在计划内指标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执行中都达到或超过最佳城市用地规模的城市采取分级限制，逐级严厉的限制用地措施，并利用土地级差收益规律引导改善城市空间和规模布局，引导产业布局朝这些地方转移，为大中小合理搭配，和谐发展的城镇体系服务。

[参考文献]

- [1] 罗尔斯. 正义论[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10 - 23.
- [2] 张清勇. 中国农地转用开发问题研究 [D].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0.
- [3] 薄文广, 安虎森, 李杰. 主体功能区建设与区域协调发展: 促进亦或冒进[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1, 21(10): 121 - 128.
- [4] 魏后凯, 邬晓霞. 我国区域政策的科学基础与基本导向[J]. 经济学动态, 2010(02): 57 - 61.
- [5] 李汉文. 下阶段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取向分析[J]. 贵州财经学院学报, 2011(4)

① 规模在100万至400万人的大城市，净规模收益最高，达到城市GDP的17%~19%。超过这个规模区间，净规模收益逐渐递减，而规模小于10万人的城市，则无法发现净规模收益。(见王小鲁、夏小林, 1999)。
② 建设部2005年重新颁发了《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国家用地标准的最大区间为60~120 m²/人，指定引导标准100m²/人。

Discussion on Differentiated Urban Land Utilization Policy i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China

Ma Changfa¹, Ye Jianping²

(1.School of Statistics and Information, Xin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Xinjiang Social and Economic Statistics Research Center, Xinjiang Urumqi 830012, China; 2.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bstract: This paper is to research the fairness in resource allocation of land for construction of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based on the Rolls-equity theory, and put forward appropriat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current land policy seems to be fair, but the actual to the west is not fair, not fair starting point for development of late-stage knock-on effect in eastern and western regions is also very easily lead to unfair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results. **Conclusion:** Based on the difference principle, to apply differential land policy for western areas;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fair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to maintain the process of actual fair and take city development land grading policy according to the optimal city size.

Keywords: Rawls Equity Theory; Urban Land Utilization; Policy

(收稿日期: 2016-12-27 责任编辑: 垠喜)

【本期论题】

长三角城市群格局与宁波都市圈建设

孙立锋^{1,2}，夏艺瑄²

(1. 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 200020；2. 宁波市发展规划研究院，浙江 宁波 315040)

[摘要]《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明确了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宁波都市圈作为长三角城市群“五圈”之一，发挥其在我国内外双向大开放中战略节点的作用，亟需强化亚太开放门户、制造业创新中心、海陆统筹发展等功能特色，构建“一主一副四带”空间构架，加强与上海和周边都市圈外联对接，强化区域内在融合发展，做强中心城市极核功能。

[关键词] 长三角城市群 宁波都市圈 融合发展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17)01-0038-05

[作者简介] 孙立锋(1979—)，浙江宁波人，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宁波市发展规划研究院规划部副主任，高级经济师，研究方向：国际投资与贸易；夏艺瑄(1990—)，女，浙江舟山人，宁波市发展规划研究院，经济师，研究方向：区域经济。

一、宁波都市圈对长三角城市群建设发展的意义

国务院新近发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较2010年的《长江三角洲区域发展规划》，在理念、框架、内容等方面都有了较大变化。新变化蕴含新机遇，宁波都市圈作为长三角城市群内联的关键节点和外接的重要门户，有条件集聚高端要素、提升城市综合功能，更有机遇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共同打响国际港口城市区域品牌。

新《规划》对标一流世界级城市群，就进一步发挥长三角城市群在国际、国内的重要作用做出了总体部署，在诸多方面进行创新和拓展，体现为新范围、新布局、新定位、新任务、新机制这“五新”(表1)。

《规划》作为指导长三角城市群未来一个时期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其对城市群内各城市的战略定位，将对相关城市未来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规划》综合考虑了宁波及周边城市的资源禀赋条件、区位优势、现有发展基础及在国家内外双向大开放中的战略地位，将宁波都市圈提升到较高的战略高度。因此，进一步深入挖掘宁波都市圈的功能特色，优化空间格局，对长三角城市群建设发展意义重大。

二、宁波都市圈的功能特色与空间结构设想

(一) 关于宁波都市圈的功能特色

总的设想是融入国家战略、体现圈域价值，既要服从国家《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确定的总体战略定位，更要立足圈内城市的地理特点、经济特点和人文特点，凝炼发展共识、明晰功能指向，更

表1 《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与《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比较

	《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
规划时间	2010-2015年, 远期展望到2020年。	2016-2020年, 远期展望到2030年。
区域面积	包括上海市、江苏省和浙江省的共25个城市, 区域面积21.07万平方公里。	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省的共26个城市, 区域面积21.17万平方公里。
空间布局	一核九带: 以上海为核心, 沿沪宁和沪杭甬线、沿江、沿湾、沿海、沿宁湖杭线、沿湖、沿东陇海线、沿运河、沿温丽金衢线为发展带。	一核五圈四带: 以上海为核心, 南京都市圈、杭州都市圈、合肥都市圈、苏锡常都市圈、宁波都市圈同城化发展, 强化沿海发展带、沿江发展带、沪宁合杭甬发展带、沪杭金发展带聚合发展。
战略定位	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门户、全球重要的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中心、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	总体定位: 面向全球、辐射亚太、引领全国的世界级城市群。 具体功能定位: 建成最具经济活力的资源配置中心、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全球重要的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中心、亚太地区重要国际门户、全国新一轮改革开放排头兵、美丽中国建设示范区。
主要内容	城镇发展与城乡统筹、产业发展与布局、自主创新与创新型区域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与布局、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社会事业与公共服务、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对外开放与合作。	打造改革新高地、争当开放新尖兵、带头发展新经济、构筑生态环境新支撑、创造联动发展新模式。

高层次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和区域一体化实践, 成为东部沿海有影响力的新兴都市圈。具体有四个定位:

一是亚太地区重要的开放门户。充分发挥港口、开放、产业等组合优势, 以打造颇具活力的资源配置中心为指向, 着力构建功能强大的“三位一体”港航物流体系, 加快对接国际贸易投资新体系, 打造全球一流的现代化综合枢纽港、国际航运服务基地和国际贸易物流中心, 争取创建自由贸易港区, 成为立足浙江、服务全国、面向全球的亚太重要开放门户。

二是全球有影响力的制造业创新中心。强化宁波和台州的制造业优势, 充分利用宁波中国制造2025示范城市等试点机遇, 主动服务制造强国战略, 推进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 在重点优势产业特别是新材料、高端装备、节能及新能源汽车、智慧信息等领域形成若干个千亿级产业, 建成全球领先的技术体系和产业体系, 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制造业创新中心。

三是我国区域一体化实践先行区。宁波、舟山、台州三市城乡统筹水平较高, 宁波城乡一体化程度位居全省前列, 区域一体化实践基础扎实。要按照国家新型城市化要求, 借力长三角打造有影响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契机, 深化宁波、台州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 提升圈内城市服务功能, 探索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机制与新路径。推动宁波、舟山、台州三市联动发展, 形成区域融合度和发展层次较高的都市圈, 为我国区域一体化实践提供样板。

四是海陆统筹发展创新示范区。作为浙江海洋经济发展核心区, 宁波都市圈承担以海洋科技创新为引擎、以港口开发为龙头, 引领海洋经济转型升级的历史重任。随着生态文明更加深入人心, 宁波都市圈作为长三角城市群的重要组成部分, 承担建设美丽中国示范区的新重任。统筹发展海陆生态文明, 保护与修复江河山湖海自然生态、塑造迷人的水乡城市, 将成为宁波都市圈建设的重要指向。

(二) 关于宁波都市圈的空间结构

依据区域总体功能定位, 立足现有产业基础、城镇分布与资源条件, 通过内联外接共同组成空间相近、功能紧密联系、相互依存的地域结构, 构建“一主一副四带”的空间构架。

做强“一主”。即宁波都市圈核心, 包括宁波市区与舟山本岛。这个区域是宁波都市圈功能联系最密切的地区, 未来要发挥区域中心城市的极核功能, 重点发展行政办公、航运服务、金融保险、商贸物流、信息科技、休闲旅游等现代服务业, 做强长三角南翼经济中心的核心功能。

提升“一副”。即宁波都市圈副中心, 包括台州市区。重点要加强台州与中心城市在港口、贸易物流、先进制造、民营经济等领域的对接合作, 加快融入宁波都市圈进程, 共同建设更具国际影响力的先进制造创新中心、经贸合作交流中心。

发展“四带”。环杭州湾发展带, 包括余姚、慈溪、上虞、海盐、平湖。全省重点打造的环杭州湾产业带, 一直以来都是宁波都市圈的重要增长极, 同时也是对接上海、杭州的前沿地区, 未来应

该进一步加快功能、空间的整合，发挥规模效应、优化产业分工，形成联动发展态势；甬台温发展带，主要指沿甬台温高速沿线一带，包括宁海、象山、三门、临海，以及温州的部分区域。该区域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旅游资源、滩涂资源等，具备优越的生态空间和湾区资源，长期以来在经济水平上落后于北部地区。未来可依托甬台温铁路、甬台温高速公路和沿海高铁等交通轴，推动轴线上城市(镇)、产业区、交通节点等的整体优化和协同发展，带动国际性产业集群和沿海城市连绵区域的形成；义甬舟发展带，主要包括宁波、舟山、嵊州、新昌、天台，辐射至金华的义乌、东阳、永康等地。义甬舟发展带位于省里确定的开放大通道，应强化国际航运、物流、贸易、金融等开放功能，对外连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对内服务长江经济带发展，共同打造对外开放重要门户功能区。同时，强化西部区域生态保育，建设生态屏障，适度发展休闲旅游；东部海洋经济发展带，空间范围包括宁波、舟山、台州海岛及海域，发展方向是海洋旅游和大宗商品储运、中转。这些海岛群距离大陆均较远，与宁波都市圈其他区域的联系有限，而且自身的经济规模比较有限，无法独立成长为具有较强综合功能和经济能级的区域。未来重点是发挥海岛生态优势发展海洋旅游，同时建设成为国家战略物资、大宗商品的储运空间。

三、加快宁波都市圈建设的重点领域

《规划》从服务国家现代化建设大局的战略高度赋予了宁波都市圈重要使命，一批重大战略、重大项目、重大平台被纳入其中，推进宁波都市圈建设应着力在强化“三大融合”上下功夫。

（一）强化宁波都市圈外联对接

正确处理好与上海和其它都市圈尤其是杭州都市圈的关系，是宁波都市圈参与长三角城市群建设的重要内容。

1. 积极融入上海全球城市建设

在新的长三角城市群版图中，上海继续处于最核心的位置，推进宁波都市圈融入上海发展，应重点做好“四个对接”。一是对接开放平台。以接轨上海自贸区为重中之重、实现借梯登高。实时追踪上海自贸区的制度创新动态，立足宁波都市圈现实

基础和发展需要，围绕投资开放、推进贸易便利、深化金融创新、优化监管服务等重点任务，第一时间复制和采用自贸区制度创新成果。二是对接制造体系。有计划地做好承接性对接和协作性对接，实现互利共赢。重点关注上海电子信息产业、海洋制造业、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的发展走向，主动承接向外转移和扩散的产业和项目，吸引企业落户；紧密跟踪生物医药、节能环保、高端装备制造等高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在产业链中找到宁波都市圈发展空间，实现协同共生。三是对接服务功能。借助上海国际化、高端化、综合化的服务功能，取长补短。强化与上海知名医疗机构、教育集团等多方位合作，提升宁波都市圈社会服务功能；重点强化与金融、保险、咨询、信息服务、文化服务等专业服务业的对接，完善宁波都市圈现代服务业体系。四是对接科创资源。主动接轨上海的高端科创资源，实现借力转型。探索共建园、园中园、飞地园等新模式，融入上海科创园区建设；以委托或合作研发等模式，接轨上海科研机构；以专家聘用、分时兼职等方式引进上海高端科研人才和尖端科研团队。

2. 探索与杭州都市圈的协调发展

推动与杭州都市圈协调发展，关键在于明晰宁波与杭州两大核心城市的发展方向，实现协同发展、错位发展，共同唱好“双城记”。产业创新领域，将发展智能经济作为再创竞争新优势的主攻方向，推进智能经济创新发展。以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和智慧城市建设为重要载体，以智能制造和智能应用为主攻方向，构建智能服务、智能装备及产品为主体的产业体系，打造成为我国智能经济发展的先行区、示范区。开放合作领域，充分发挥港口、贸易、物流等综合优势，推进国际港口名城建设。紧抓舟山江海联运服务中心和宁波港口经济圈建设契机，强化高端航运服务和贸易物流功能，打造更具国际影响力的港航物流服务中心和经贸合作交流中心。

（二）强化宁波都市圈内融合

宁波都市圈范围内的甬舟台三市地域相邻、人文相近、资源互补、经济互动，同城化发展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为全面实现更高水平、更高层次的一体化发展，应凝聚建设共识，着力做好“两个加强”。

1. 加强推进重点领域合作

推动交通互联、民生互惠。一是加快构建以轨道交通和高速公路为骨干，以普通公路、铁路为基础，以水运为补充，有效衔接圈内城市和小城镇的多层次快速交通运输网络。重点推进市域轨道交通串城，加快甬金、甬舟、沪嘉甬等铁路的谋划与建设，推进城际铁路的规划与建设，加快市域轨道交通延伸至周边城市。二是立足增强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协同推进智慧都市圈和民生都市圈建设。放大基本公共服务同城效应，加快都市圈市民卡“一卡通”建设，强化优质教育、医疗、卫生资源共享，构建统一的就业服务平台、联合征信平台等；整体谋划区域信息网络布局，实行都市圈区号统一、手机同城无漫游，推进信息服务均等化。

推动创新互促、智慧互用。一是加快构建宁波都市圈研究开发、成果转化、试验示范和产业化发展一体化的区域创新链条，推动科技基础设施、科技信息资源等共享共用，推进圈内产学研合作，加快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协作攻关创新；围绕科技成果转化对产业配套与空间发展等需求，结合各地产业发展重点和用地空间情况，强化甬舟台三地产业链的合理分工。二是大力实施人才兴圈战略，推动圈内人才发展规划、开发培养、市场配置、政策设计、制度创新一体化，畅通人才流动渠道；对都市圈科技进步、社会发展、公共安全、民生保障起到促进和支撑作用的年度重大项目，通过公开招标、课题委托、自由申报等形式，实行联合攻关，实现“智慧效益”区域最大化。

推动平台共建、政策共享。一是共建优势平台。高效整合三地海港资源和平台，共建江海联运服务中心、港口经济圈，打造全球一流的现代综合枢纽港、国际航运服务基地和国际贸易物流中心；联合利用北仑—金塘、梅山—六横一带的深水港和海关特殊监管区优势，以集装箱物流、大宗商品贸易、保税物流、保税贸易等业态为重点，共建自由贸易港区。二是共享试点机遇。利用中国制造2025示范城市机遇，充分发挥宁波、台州制造优势，在智能经济、新材料、高端装备、节能及新能源汽车领域取得突破，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制造业创新中心；利用宁波国家保险创新综合试验区和台州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改革创新试验区平台，发挥两地民

间资本优势，完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体系，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提供有力支撑；利用宁波、台州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探索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机制、新路径，打造全国率先探索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先行区。

2. 加强体制机制改革创新

推进要素资源自由流动。提速金融市场一体化，强化圈内银行业务合作，鼓励圈内各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村镇银行等跨地市参股，或组建跨地市的商业银行和金融控股公司，争取银行分支机构设立同城化；实施圈内金融票据交换业务一体化，推进异地票据同城结算；探索产权交易市场一体化，共享产权（商品）交易所；推进资源市场一体化；探索实施更加灵活的户口迁移制度，促进人口有序流动和合理分布。

探索成本共担利益共享机制。研究设立宁波都市圈一体化发展投资基金，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基金设立和运营，重点投向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生态环境共保、创新体系共建、公共服务共享等领域；积极推进与金融机构合作对接，为宁波都市圈重大项目、重大平台建设提供金融支持；建立地区间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区域生态建设投入激励机制等。

（三）强化宁波市域统筹

1. 做强中心城市极核功能

提升城市综合服务功能。提升文化服务功能，推进市图书馆新馆、宁波艺术剧院、宁波报业传媒大厦、宁波奥体中心等项目建设，规划建设市文化馆、河海博物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等；提升医疗健康服务水平，加快省医学副中心、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深化医联体建设，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立医院改革，倡导社会办医，引导创建国际化、高端化医疗机构；提升教育服务水平，鼓励、支持社会资本进入教育领域，推进中外合作办学等多种办学模式；优化投资商务环境，建设国际化人居环境，推进城市管理国际化。

提升开放门户功能。打造高端开放载体，大力推进梅山新区、空港新区、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等建设；加快建设国际强港，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构建高能级的多式联运国际枢纽中心；加快推进国际贸易便利化，争取实施自由贸易政策，建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国际进口商品基地，提升大

宗商品交易中心的国际定价权和话语权；加大双向投资，建设国际合作园和境外产业园，鼓励民营企业“走出去”，培育一批大型本土跨国公司。

提升创业创新功能。高水平建设新材料科技城、国际海洋生态科技城、国家大科学科技园等重要载体，扶持一批众创空间、创业园和特色小镇；引进共建新型产业技术研究院和产业创新中心，争取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落户；加快培育海洋高技术、生物医药、可穿戴设备、车联网等新产业新业态，推动高端装备、新材料、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发展。

2. 完善城市管理体制机制

提高市级统筹协调能力。围绕全域都市化建设，统筹推进行政、规划、财政等多领域体制改革，提高市级统筹调控能力。坚持全市“一张图”，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编制实施市域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推进“多规融合”；按照事权与支出责任对应原则，调整优化市本级和区级土地增值收益分成比例，增强市本级对城市建设的调控能力；完善土地收储和一级开发体制机制，提高市级土地收储调控和围垦用地管控能力；强化规划管理、土地利用、项目安排对县市的刚性约束，提高重大项目、重大项目和重要资源的市级统筹协调能力。

理顺功能区与行政区管理体制。以促进产城融合和提升平台能级为导向，研究推进新材料科技城、梅山国际物流产业集聚区、东钱湖旅游度假区、空港新区、保税区、南部滨海新区等市级重点战略功能区管理体制创新。加强功能区与行政区在规划编制、劳动就业、数据统计、社会管理、城市管理、公共服务、信息资源等方面的融合，建立一体化的经济社会管理体系；进一步完善与功能区发展相适应的精简、高效的行政管理体系，做好与市级审批权限下放和 policy 支持的衔接配套；建立健全市级功能区协调发展机制，引导功能区错位提升发展。

[参考文献]

- [1]许学强,周一星,宁越敏.城市地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 [2]胡彬.长江三角洲区域的城市网络化发展内涵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3(10):35 - 42.
- [3]柴攀峰,黄中伟.基于协同发展的长三角城市群空间格局研究[J].经济地理,2014(6):75 - 79.
- [4]覃成林,刘迎霞,李超.空间外溢与区域经济增长趋同[J].中国社会科学,2012(5):76 - 94.
- [5]罗蓉,刘乃全.城市对长三角经济一体化演进的影响实证研究[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7(10):71 - 76.

Pattern of Urban Agglomeration in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and Construction of Ningbo Metropolis Circle

Sun Lifeng^{1,2}, Xia Yixuan²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Ningbo Development Planning Institute, Zhejiang Ningbo 315040)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plan of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discloses the aim of building a world-renowned urban agglomeration. Ningbo metropolis circle, as one of five circles that makes up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if it wants to play the role of strategic node in China's inside and outside opening up, Ningbo metropolis circle should give prominence to its roles as the portal China connected to the world, the innovation center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the demonstration plot of flood-field joint development. Meanwhile, build a space structure that includes one core, one auxiliary, and four belts, strengthen its relationship with Shanghai and other cities inside and outside of the circle. At the same time, Ningbo should update its urban functions, as the hard core of the circle.

Keywords: Urban Agglomeration in Yangtze River Delta, Ningbo Metropolis circle, Joint Development

(收稿日期:2016-12-27 责任编辑:廖令鹏)

【本期论题】

苏州城市化的创新思路

李仙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北京 100085)

[摘要] 本文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苏州体制机制创新取得的成就, 以及当前面临的问题; 提出了要以市场化改革为重点的总体改革新思路, 为全面深化改革探索新的路径, 同时也为苏州工业化城镇化发展上一个新台阶, 打好体制机制的基础。

[关键词] 体制机制 苏州 新思路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17)01-0043-03

[作者简介] 李仙(1964—), 女, 湖北随州人,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副教授, 研究方向: 区域与城镇经济、行政管理。

苏州在体制机制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上走在了全国前列, 创造了令人瞩目的“苏州模式”, 可总结为“三个故事、三种精神”: 即乡镇企业(民营经济)异军崛起的故事、创立园区引进外资对外开放的故事和多种形式的农业股份合作土地集约经营故事, 以及由此产生的创新精神、实业精神和执著精神。未来苏州将以大数据产业为核心, 讲述高新技术产业崛起的第四个故事, 以体现出不断进取的新精神, 其中, 体制机制创新是关键。

一、体制机制改革已有的基础

在市场主体的改革和建设上, 苏州符合市场体制运行机制的现代企业制度基本建立。多样化混合型企业所有制格局基本形成。国有工业企业目前仅存14家, 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比重0.13%; 2015年私营企业4853家, 占规上工业企业的47.88%; 外资及港澳台工业企业4543家, 比重为44.82%。在全省

率先实施“三证合一”、“一照一码”和“全程电子化”登记, 企业自主的市场经营活动得到越来越充分的法律保障。

在市场体系建设和管理制度上, 产品市场体系基本建立, 要素市场体系正在形成。产品市场在城乡区域之间基本实现一体化, 网下与网上市场正在融合, 国内外市场一体化也取得一定成效; 市场秩序与竞争规范化、产品品牌和信用体系建设都取得较大的进步。苏州吸引了超过本地户籍人口多达600多万的外来务工人员就业和生活, 进行了城乡户籍一体化改革, 2015年城镇化水平达到74.9%; 农村建设用地上市条件逐步成熟, 城乡土地制度一体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一个多层次、直接和间接融资市场体系初步建成, 外资投资体系日益完善; 技术资本市场, 专利和技术市场活跃。

在政府职能转型和治理能力建设上, 一个有为的服务型地方政府体系基本形成。政府在法治建设、社会治安和秩序维护、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

障、医疗教育社会事业发展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等公共职能方面的治理能力越来越强。政府基本做到了主要提供良好的投资和经营软硬环境的作用，各类中外企业已经成为产品市场上的自主经营者。

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是现代企业制度有待完善，基础设施领域，一些公共服务业领域，特别是社会事业领域中国企比重仍然比较大；民营资本保护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经营行业和领域有待进一步拓宽；企业产品质量和品牌意识需要进一步提高，诚信体系建设和社会责任有待完善。二是市场体系还需进一步加强，尤其是要素市场体系建设尚需真正破题。如人力资本市场、人才市场、土地市场、资本市场、技术市场等，都还有待于实质性的改革。三是政府职能转变尚需加速，政府宏观调控和微观干预市场行为还不规范。四是地方政府机构规模与治理能力水平不匹配。2015年，苏州市常住人口规模达1061.60万人（其中外来人口394.59万人），已是一个超大规模城市；GDP达1.4504万亿元，居全国城市第七位，规模以上制造业总产值更是高达3.0546万亿元，居全国城市第二位，仅次于上海；城市体系完善，建设用地占比达28.8%，与日本相当。这些指标都远远超过一个普通地级市标准和体量，有些比中西部的一个省区的规模还要大。然而，苏州行政区划级别仅仅为地级市，其职能所能提供的社会公共服务远远满足不了需求，对企业总部的建立、人才引进和研发水平的提高、以及金融分支机构的设立等都有较大限制，对地方财政支出以及地方立法权限也有明显的影响。

二、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新思路

（一）指导思想与基本原则

按照市场决定性作用和不断提高国家治理水平能力的总体要求，抓住要素市场化的核心和关键，遵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总体战略部署，从企业制度、市场制度和政府职能转变三个主要领域入手，积极探索和实施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各项实践经验，不断加大社会、文化、生态和政治等领域配套改革力度，率先建立市场体制决定性作用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做出应有的体制机制上的保障和贡献。

基本原则要以要素市场化改革为阶段目标，落

实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部署，确保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改革促进发展主要应体现在市场准入不断扩展、要素市场不断完善、政府宏观调整合理到位、政府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完善有效等方面。坚持问题导向、重点突破和全面配套的原则。政府主动改革与民间改革相结合；注重改革时序和法治基础。

（二）改革新目标

总体目标，是构建包括要素市场化在内的、完整的现代化市场经济体系，包括四个方面。企业制度领域改革目标，进一步完善产权明晰保护有力的、所有制股份混合的、各类市场主体地位平等的现代企业制度体系。国有企业基本实现向国有资本管理的转变；民营企业股份制改造基本完成；外资企业基本实现国民待遇。在所有权保护、行业准入（负面清单）、诚信体系和社会责任等关键环节取得成效。市场体系领域改革目标，基本建立全面开放的要素市场化体制机制，进一步完善产品市场化体系，在要素市场体系建立、产品市场的完善、市场一体化、市场运行规范化等的关键环节取得成效。政府职能转变目标，政府职能基本转向公共社会服务领域，政府经济服务职能基本间接化。

政府机构与人口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目标，初步建立地方政府机构的大部委制，建立行政级别和规模设置与地方政府职能、当地人口和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的标准和制度，并建立有序定期调整机制。

三、全面深化市场化改革的主要任务

（一）市场主体培育与企业体制改革

1. 所有制调整与保护。一是加速国有企业向国有资本管理体制的转变，进一步降低国有企业比重，按照国有企业商业性和公益性分类进一步优化国有企业布局。二是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应进一步向公共社会服务领域集中，鼓励民营企业和外企业参与公共社会事业领域的投资与发展，实施更有效的产权保护。

2. 行业准入开放。在负面清单的指引下，为社会各界提供更加便利的行业准入和投资服务。在公共社会事业领域不断扩大对民营和外资开放力度。

3. 企业经营管理。金融类经营性国有资产要建立健全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类公益性国有资产，要引入竞争机制

提高配置效率，注意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和公平性。建立有力度的企业失信惩罚制度，促使企业诚信经营、照章纳税，培育核心竞争力。

（二）市场体系的形成与监管体系

1. 市场体系建设。一是人力和人才资本培育、配置市场化体系建设。要继续探索外来就业人员与本地福利待遇的均衡化、先行先试各类福利待遇统筹层次的提升办法和随人迁移自动转接的机制，以及中央财政医疗教育转移支付随人口流动调整的办法等难题，稳步推进义务教育、就业服务、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卫生、住房保障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逐步覆盖全部常住人口。

二是土地资源配制的市场化。让农村土地直接进入市，实现城乡土地市场一体化，以充分体现农村土地的价值并承认农民是集体土地出让收益的主要获得者，为农民致富提供一条正当的新路。

三是资本和技术市场化改革。实现对各类市场主体的全面开放，建立起基础性作用的证券柜台交易体系，尝试争办地方性“新三板”或其他直接资本交易机构和融资市场，切实推进证券投资的专业化和专门机构化，进一步加快民间资本申办正规中小银行的步伐。技术市场要强化知识产权保护，解决好职务性技术开发人员技术入股和收益合理分成难题。

四是产品市场化体系进一步完善。尽快建立和实施具有抑制投资需求、调节需求和供给关系、以及平衡收入差距作用的有效的房地产税体系，对公共社会服务产品中，可以市场化的部分，进一步加大对民间开放的力度。

2. 市场价格机制。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强化反垄断机制，完善税收调节机制，

有的试点案例基础上，探讨适合我国国情的房地产税收体系和政策。减少政府定价数量，推进定价项目清单化。

3. 市场一体化。在城乡区域要素市场深度融合上下功夫，努力构建更加均衡和迁徙流动更加自由的生产和生活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在先进技术和领军人才引进、国外市场开拓、“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等方面，继续讲好园区引资开放的苏州故事，率先打造线上线下市场一体化的商业贸易新体系。

（三）地方政府职能转变

就管理服务对象转变而言，主要管理好公共社会事务，积极完善各类社保体系，根据常住人口规模有效配备相关治安人员，率先建立污染破坏与综合治理分治体系。就管理服务方式转变而言，更有效和积极地落实中央政府宏观政策和其他经济政策，制定有为的地方性产业政策，维护企业公平竞争秩序，加强市场监管力度，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

（四）政府机构设置和调整

积极推行大部委制，探索政府行政部门决策和执行分离的合适方案，改革中要注意与上级政府机构的对应与配套。提升行政级别与优化机构规模，将行政级别与政府规模设置分开考虑，同级别政府需要按照其管辖范围内的人口和经济发展水平，确定其大中小规模类型，并按照其规模类型赋予其机构规模大小的设置。可以考虑建立地方政府行政管理能力建设与地方人口规模和经济实力定期协调与配套调节机制，对人口和经济增长较快的地区及时调整其行政级别或机构规模，以确保这些地区经济增长的积极性和良好的发展态势，为国家整体经济做出更大贡献。

The Suzhou Model of Innovation in Urbanization

Lixian

(Beijing University Of the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5)

Abstract: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summarizes the achievements and the current problems of the system and mechanism innovation Of Suzhou since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A new train of thought of the overall reform of productive elements mechanism of system as the focus in the future was put forward, so as to explore a new path for our country comprehensively deepen reform of the future, as well as to lay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for the Suzhou's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on a new stage of industrialization.

Keywords: System and Mechanism, Suzhou, New Thinking

(收稿日期：2016-12-28 责任编辑：垠喜)

【地方发展】

京津冀协同发展土地开发利用对策

高国力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 北京 100038)

[摘要]《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年)》,对全国的耕地保有量、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建设用地总规模三项主要指标进行了相应调整,京津冀三地这三项土地主要指标也面临不同方向和程度的调整。应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功能定位、空间布局、重点领域、重要功能区、土地市场化交易机制等方面,逐步建立健全有利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土地开发利用对策措施。

[关键词] 京津冀协同发展 耕地保有量 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建设用地总规模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17)01-0046-05

[基金项目] 201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拓展我国区域发展新空间研究”(15ZDC016)。

[作者简介] 高国力(1969—),山东淄博人,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区域经济理论和政策。

2016年6月,国务院批复国土资源部印发《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年)调整方案》[国土资发〔2016〕67号]。此次调整主要是根据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成果,针对各地出现的建设用地指标提前告罄、基本农田标准不一、质量下降等现实问题,进一步提高土地集约开发利用水平,维护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严肃性和可操作性,为“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合理的土地资源保障。全国各地土地开发利用将面临相应的调整 and 应对,京津冀三地的耕地保有量、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和建设用地总规模分别出现不同的调整,这一调整既反映了京津冀三地各自现有土地资源的赋存特征和开发利用现状,也充分考虑了京津冀协同发展带来的土地开发利用需求变化,将会对京津冀三地的土地开发利用结构调整和布局优化提出新的要求。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十三五”国家重大区域战

略,需要尽快确立适应新变化的土地开发利用对策,加快形成科学合理的土地开发利用结构,不断提高土地开发利用效率和效益。

一、《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年)》调整的重点

《纲要》调整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内容:一是耕地保有量、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建设用地总规模三项土地指标的相应调整,主要是基于第二次土地调查结果、各地土地资源开发利用出现的问题,和未来的战略定位提出的用地需求。二是对于土地开发利用的方向和重点进行了优化调整,主要是体现确保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区的质量、加大生态保护和建设用地供给、提高城乡建设用地的利用效益等战略导向(表1)。

表1 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关于全国土地利用结构的分布状况

土地类型	面积 (万公顷)	面积 (万亩)	比重 (%)
耕地	13538.5	203077	14.1
其中：基本农田	10405.3	156080	10.8
园地	1481.2	22218	1.5
林地	25395.0	380925	26.5
草地	28731.4	430970	29.9
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2873.9	43109	3.0
交通运输用地	794.2	11913	0.8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4269.0	64036	4.4
其他	18916.8	28375.2	19.7

资料来源：关于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主要数据成果的公报。

（一）调整的主要指标变化

关于耕地，坚守18亿亩耕地保护红线，确保实有耕地数量稳定、质量不下降，到2020年，全国耕地保有量为18.65亿亩，比《纲要》原来确定的耕地保有量增加6000万亩，增加3.3%。关于基本农田，按照基本农田数量和布局基本稳定、优质耕地优先保护的原则，到2020年，确保全国15.46亿亩基本农田数量不减少、质量有提高，比《纲要》原来确定的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减少1400万亩，减少0.9%。关于建设用地，按照严控增量、盘活存量、优化结构、提升效率的要求，到2020年，全国建设用地总规模为61079万亩，比《纲要》原来确定的建设用地总规模增加5219万亩，增加9.3%。在此基础上，分别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耕地保有量、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建设用地总规模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二）调整的方向和重点变化

一是调整优化基本农田结构和布局。允许各地依据土地二次调查和耕地质量等别评定成果，将现状基本农田中林地、草地等非耕地调出，不得将各类生态用地划入基本农田；原则上25度以上坡耕地不作为基本农田，将城市周边、道路沿线和平原坝区的优质耕地划入基本农田，实现基本农田数量稳定、布局优化和质量提升（表2）。

二是加强生态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用地供给。以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为基础，落实主体功能区规划及其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相关专项规划的协调衔接，确保原有生态用地不减少、新增生态用地能落地；严格保护水体、森林、山地、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生态空间用地，建设

表2 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关于全国25度以上坡耕地的分布情况

地区	面积（万公顷）	占全国比重（%）
全国	549.6	100
东部地区	33.6	6.1
中部地区	75.6	13.8
西部地区	439.4	79.9
东北地区	1.0	0.2

资料来源：关于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主要数据成果的公报。

用地安排要避让生态廊道、城市绿带、生态岸线、湿地等重要生态功能区。

三是合理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重点产业用地。保障水利、交通、能源、通信、国防等重点基础设施用地，优先安排社会民生、脱贫攻坚等基本公共服务建设项目用地，合理提供具有发展潜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国家扶持的重点产业发展用地，严禁为产能严重过剩行业新增产能项目安排用地。

四是严格控制超大、特大城市用地规模。适应新型城镇化战略实施要求，合理安排大中小城市用地，进一步通过旧城改造、城市更新等方式挖掘存量土地利用潜力，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逐年减少建设用地增量，促进串联式、组团式、卫星城式城市群集约用地，防范和杜绝“摊大饼式”城市扩张。

五是大力提升农村建设用地集约化利用水平。适应城乡统筹发展和新农村建设需要，加强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在具备条件的地方对农村建设用地按规划进行土地整治、产权置换，促进农民住宅向集镇、中心村集中，引导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合理布局 and 高效利用。

二、京津冀三地面临的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调整

《纲要》调整方案中京津冀三地的土地指标变化各不相同，总体上考虑了三地各自的土地资源开发利用现状特征，以及未来的发展定位和目标要求。

1. 北京市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调整

北京市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均大幅调减，分别下降48%和46%，建设用地总规模小幅调减，下降2.6%，表明“十三五”期间北京的土地利

表3 《纲要》调整方案中关于2020年京津冀土地主要指标变化情况

主要指标	耕地保有量		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建设用地总规模	
	增减规模 (万亩)	增减比重 (%)	增减规模 (万亩)	增减比重 (%)	增减规模 (万亩)	增减比重 (%)
北京市	-156	-48%	-130	-46%	-15	-2.6%
天津市	-155	-24%	-108	-20%	+56	+9.3%
河北省	-374	-3.9%	-591	-7.1%	+505	+17.6%
三地合计	-685	-6.6%	-829	-9.1%	+546	+13.5%
全国	+6000	+3.3%	-1400	-0.9%	+5219	+9.3%

资料来源：根据《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年）及调整方案计算。

用结构面临较大调整。基于北京市土地资源低山、丘陵较多、生产能力不高的现状特点，不再过多赋予北京市承担粮食生产和安全的任务，但同时调减的耕地和基本农田指标并没有相应转为建设用地指标的增加，而且建设用地总规模也进一步调减，意味着北京市仍将严格控制建设用地的增加，实行更加集约节约的用地模式。为了服务首都建设宜居、美丽和谐的首善之区，北京市调减的耕地和基本农田将主要转为园地、林地、草地等其他农业和生态用地。“十三五”期间，北京市郊区将提供更多的土地用来大力发展蔬菜、瓜果、花卉等都市农业，结合观光农业、休闲农业等现代农业新业态，不断增强供应首都人民绿色果蔬的职能。另外，北京市将大力实施退耕还林、退耕还草、退耕还湿等重大生态建设工程，林地、草地和湿地等占地面积大幅增加，进一步强化首都的生态涵养功能，有力支撑首都的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和生态文明建设。

2. 天津市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调整

天津市的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保护面积明显调减，分别下降24%、20%，建设用地总规模小幅增加，增加9.3%，表明“十三五”天津市承载的粮食生产和安全职能明显降低，但相比北京市仍然承担重要的粮食生产任务。考虑到天津市建设北方经济中心的发展目标，调减的耕地和基本农田将有少量转为建设用地，保障天津市基础设施、工矿开发、城乡建设等建设用地的需求，但是总体上仍坚持集约节约用地的原则，严格控制建设用地的快速增长。与北京市相似的是，天津市调减的耕地和基本农田大部分将转为园地、林地、草地等其他农业用地和生态用地，大力发展城郊现代农业和“菜篮子工程”，实施退耕还林、还草、还湿等生态工程，为天津市实施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提供有力保

障。

3. 河北省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调整

河北省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均小幅调减，分别下降3.9%、7.1%，建设用地总规模明显调增，增加17.6%，表明“十三五”期间河北省作为全国的粮食主产区，仍然承担重要的粮食生产和安全任务，但同时也考虑到河北省

工业化和城镇化所产生的建设用地需求压力，以及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承接京津产业转移带来的用地需求，小幅调减了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面积，明显增加了建设用地总规模。调减的耕地和基本农田将会有部分转为建设用地，满足河北省城乡建设所产生的用地需求，同时也会有部分转为园地、林地、牧草地等其他农业用地和生态用地，促进城郊农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用地总规模的增长，一方面将会不可避免地占用部分耕地和基本农田，另外更多的是开发利用缓坡丘陵地、盐碱地、荒草地、裸土地等未利用地和废弃地，挖掘未利用土地的潜力，特别是要严格控制甚至逐步减少农村建设用地的规模，有效提高建设用地的利用效益，促进河北省建设用地实现增量控制、存量优化、效益提升。

三、保障和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土地开发利用对策

1. 紧扣京津冀区域整体战略定位和三地各自功能定位，调整优化土地开发利用规模和结构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对于京津冀区域整体战略定位是“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区域整体协同发展改革引领区、全国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生态修复环境改善示范区”，要加大对有利于城市群建设、改革引领、创新驱动、生态修复等战略功能强化的土地资源配臵，合理调整和保护耕地和基本农田，扩大林地、园地、草地等生态用地规模，严格控制和高效利用建设用地，加快开发未利用土地和低效土地，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坚实的土地支撑。对于北京市的功能定位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要强化行政、外交、文化、科技、教育等服

务功能的土地保障，优先改造提升中心城区土地利用效益，重点疏解中低端高消耗产业、区域性物流基地、专业市场等第三产业，部分教育、医疗、培训等社会公共服务，部分行政性、事业性服务机构和企业总部等四类非首都功能，提升疏解后腾退土地的开发利用业态和效益。对于天津市的功能定位是“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改革开放先行区”，要加大先进制造、航运物流、金融创新等高端产业用地供给，统筹老城区改造和滨海新区发展的土地开发利用，严格不同类型土地用途管制，加强围填海土地、滩涂、岸线等特殊类型土地的开发管控和生态功能维护。对于河北省的功能定位是“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要为商贸物流、中高端制造业、新型城镇化等发展提供用地支撑，满足承接京津两地部分产业和功能产生的用地需求，不断强化作为粮食主产区和生态涵养区的土地资源保障。

2. 依托“一核、双城、三轴、四区、多节点”空间布局，实行差别化土地开发利用方向和重点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一核、双城、三轴、四区、多节点”空间布局结构，“一核、双城、多节点”指的是不同等级和规模的城市，要加大北京、天津两个超大、特大城市的土地利用调整力度，有序推进耕地转为园地、林地等城郊农业和生态用地，严格控制新增建设用地，加快老城区、旧厂房、废弃产业园区、低效利用土地等城市更新改造，着力提升存量建设用地的利用效益；适度增加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廊坊、秦皇岛等不同城市的建设用地规模，土地增量控制和存量优化相结合，不断优化城市生产、生活和生态用地结构。“三轴、四区”指的是从京津、京保石、京唐秦三个发展轴，以及中部核心功能区、东部滨海发展区、南部功能拓展区和西北部生态涵养区四个功能区，要加大建设用地供给向“三轴”的倾斜力度，保障“三轴”沿线产业、城镇和人口集聚产生的用地需求。对于四个功能区实施差异化土地利用政策，中部核心功能区，重点在于存量土地的挖潜，强化生态服务和生活配套功能的土地保障，提高土地利用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东部滨海发展区和南部功能拓展区，重点在于保障建设

用地合理有序供给，统筹分配用于基础设施、工矿开发、城乡建设等重点领域，加快承接京津两市中心区的功能疏解和产业转移，不断完善吸引要素聚集的综合配套功能；西北部生态涵养区，重点在于严格划定和落实生态保护红线，从严控制土地开发强度，稳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能力，保障区域生态涵养功能。

3. 瞄准交通、环保、产业三大重点协同领域，新增建设用地优先提供配套和保障

《纲要》调整后，京津冀三地建设用地总规模明显增加，这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土地利用结构优化空间。交通一体化方面，保障城际铁路、城市轨道交通、高速公路、国省道、县乡公路等新建和改扩建重点项目的用地，打通河北与京津两地间的“断头路”，改造提升三地之间的“卡脖子”，加强京津冀三地的互联互通，有效降低三地之间的物流成本，显著提升三地间要素流动效率。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保障污水处理、中水回用、垃圾填埋、垃圾焚烧、污泥处置、循环经济发展、环境产权交易等相关项目、设施和场所的用地需求，加强跨界水体断面、城乡结合部等重点区域的环境污染监控，推进环境污染治理联防联控，为实现京津冀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提供有力保障。产业升级转移方面，重点保障北京市高端服务业和部分高新技术产业的建设用地需求，加大天津市先进制造业、港口航运、金融等重点产业的用地供给，强化河北省承接京津两地的商贸物流、装备制造、科技转化等产业的用地保障，加强京津冀三地间的产业关联配套和分工协作，培育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

4. 加快微中心、卫星城、城市副中心、新城新区等重要功能区建设，有效发挥土地集约高效利用的示范功能

着眼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总体布局，选择一些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强、区位交通条件好、产业特色突出的城镇、园区，规划建设若干微中心，结合京津冀地区规划建设的卫星城、城市副中心、新城新区等重要功能区，加快探索土地集约高效利用的新模式，有效发挥对京津冀其他区域的土地利用示范辐射作用。加大新增建设用地合理有序供给，科学确定新增建设用地的利用结构，明确不同类型建设用地的开发强度和利用效益，有效保障建设用地的

利用效益。划定城镇和园区空间增长边界，统筹安排生产和生活用地，按照宜业宜居的原则划定功能分区，建设成为布局合理、产城融合的示范区。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功能，强化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功能的用地保障，规划建设灵活多样的绿道绿廊、循环经济园区、低碳社区、近零排放区、风道等新型绿色生态项目，推广应用国际上绿色循环发展的先进技术和模式，打造一批集约紧凑、智能高效、精明增长的特色功能区。

5. 探索建立灵活高效的土地市场化交易机制，切实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益

加强京津冀三地土地利用规划、城乡规划、城镇体系规划等融合衔接，促进土地交易、土地整理、土地储备等市场的对接统一，实现土地资源配置合理高效。创新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挂钩、建设用地增加与吸纳外来人口数量挂钩的模式，积极稳妥地率先推进跨县（市）“两个挂钩”的试点。协同推进京津冀三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进程，保持入市规模、节奏和价格的合理调控，促进城乡建设用地实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严格落实耕地“先补后占”、“占一补一”的占补平衡政

策，加强土地整理和复垦的统筹规划和政策支持，率先探索跨省级行政区的耕地占补平衡，满足京津冀三地差异化现实需求。鼓励多种方式开展城镇未利用地、废弃地、低效利用土地的再开发，探索灵活的土地置换和指标奖补方式，吸引更多开发主体和资金进入。借鉴新加坡的“灰色地块”、广东的“三旧”改造、重庆的“地票”等国内外有效做法，结合京津冀三地产业布局和人口流动的调整，探索形式灵活的土地供给模式和配套保障机制，实现土地利用结构优化和利用效益提高。

[参考文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年）[R].2008.
-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年）调整方案[R].2016.
- [3]文魁，祝尔娟主编.京津冀发展报告：协同创新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 [4]高国力等.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布局[J].财经，2014(19):110-112.
- [5]高国力.构建四大地区和三大战略协调互动新格局[J].全球化，2016(9):37-49.
- [6]薄文广，陈飞.京津冀协同发展：挑战与困境[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110-118.
- [7]孙久文，李坚未.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影响因素与未来展望[J].河北学刊，2015(4):137-142.

Countermeasures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n Land Exploitation and Utilization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Gao Guoli

(Chinese Academy of Macroeconomic Research, Beijing 100038)

Abstract: Three main land indicators, including cultivated land quantity, basic farmland protection area, total scale of the construction land, are adjusted correspondingly through adjustment of national comprehensive planning on land utilization (2016-2020). The new adjustment will cause significant impact on land utilization in different provinces and require new land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the 13th five-year plan, while it is obviously different in terms of changing direction and scope on the land indicators of cultivated land quantity, basic farmland protection area, total scale of the construction land in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province respectively. In order to promot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mong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province, it is imperative to establish policy system on land utilization from aspects of function orientation, spatial distribution, main developing fields, key function zone, and land market mechanism.

Key words: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Cultivated Land Quantity, Basic Farmland protection area, the Total Scale of the Construction Land

(收稿日期：2017-01-12 责任编辑：廖令鹏)

【地方发展】

天津自贸区中心商务区产业集群考察

王艳红，孟广文

(天津师范大学，天津 300387)

[摘要] 金融业、总部经济、跨境电商、文化传媒创意、科技与新一代信息技术已成为天津自贸区五大主导产业集群。同时，存在大企业入驻不多、“双创”类企业对经济的贡献较小、创业创新政策体系欠完善、政策执行实施不到位、金融发展潜力没充分挖掘、进出口贸易连续负增长等问题。应转变政府职能，加快政策实施，完善配套设施，深化金融创新，简政放权，扩大开放，推进投资和贸易便利化改革，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注重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与发展。

[关键词] 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 中心商务区 产业集群 京津冀协同发展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17)01-0051-04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境外自由经济区的发展路径及影响研究”(编号41571114)。

[作者简介] 王艳红(1968—)，女，天津人，天津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等；孟广文(1960—)，天津人，天津师范大学城环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自由经济区等。

天津自贸试验区总面积119.9平方公里，涵盖三个片区，分别是天津港东疆片区、天津机场片区和滨海新区中心商务片区。中心商务区2007年启动开发建设，自贸区成立后其功能定位是京津冀企业总部聚集区、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自由贸易试验区标志区、创新创业特区和天津市滨海新区核心区，同时肩负着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跨境电子商务示范区等一系列使命任务。本研究主要就中心商务区的产业集群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并针对存在问题提出若干对策建议。

一、中心商务区产业集群发展现状

(一) 经济发展概况

近两年，中心商务区经济保持了迅猛增长的良好

性态势，201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54亿元。中心商务区经济的高速增长，得益于招商引资工作的有力支撑。2015年以来，在建设自贸区、自创区和京津冀协同发展一系列重大利好作用下，中心商务区新落户企业呈现井喷式增长，累计新增各类市场主体9679家，合计注册资本金2450亿元。

(二) 产业集群发展现状

中心商务区大力发展以金融创新为主的现代服务业，推动贸易转型升级，加快双创特区建设。

1. 在新金融产业发展方面，于家堡金融区是中心商务区着力打造的亮点，聚焦发展总部经济和创新型金融产业，目标是建设成为京津冀企业总部聚集区和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金融业支柱地位突出，已聚集金融及类金融机构896家，涵盖了银行、保险、证券、租赁、基金、保理、交易市场、资产

管理等几乎所有金融细分业态，管理资产规模超过1.8万亿，其中持牌法人金融机构7家，持牌类非法人金融机构38家，创新型类金融企业851家。

2. 总部经济贡献也较显著，着力引进跨国型、总部型的销售公司、连锁企业、结算中心和投资性公司，促进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全国性大企业区域总部、市属企业集团等一批功能性机构和行业领先企业集聚。华夏人寿、天弘基金、中信金租、敏华品牌管理、民生银行北方交易中心、金城银行、中建八局等龙头企业和总部项目支撑作用明显，是推动中心商务区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动力。一批行业内高成长性龙头项目以总部形式落户，包括国内最大的跨境支付企业易支付、国内最大的二手车交易平台车易拍、微信最大的文化娱乐营销与发行平台“互联网+影视文化”、国内最大的商标代理和交易商中细软、国内知名房地产企业碧桂园北方总部项目，均在商务区设立了运营机构，并逐步将企业总部或核心业务总部转移到商务区。

3. 在推动贸易转型升级和跨境电商方面也取得显著成效，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发展。以于家堡地下商业街“环球购”项目为突破口，积极发展进口商品的保税展示交易。来自土耳其、德国、韩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的一大批知名商家入驻，天猫国际跨境电商体验店、各国特色商品、主题公园和街区汇聚，平行进口汽车展厅开业，已成为自贸区吸引京津冀三地客源的重要载体。致力打造符合区域特色的跨境电商产业生态体系，以发展一般贸易为核心，提供综合跨境业务服务、网购保税进口、海外直邮进口服务和海外仓储、海外清关、跨境清关服务。至2016年9月底，京津冀跨境电商产业联盟成员企业已经达到近百家，涵盖了电商平台、企业自营、服务商、国际物流和第三方支付等产业链多个环节，中心商务区跨境电商生态圈初步行成。此外，中心商务区还整合30个品类的上万种产品货源、20万平方米保税仓、12万平方米海外仓等产业资源。

4. 科技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方面，着力引进为制造业企业提供物联网、人工智能、节能降耗、资源回收利用等技术支持的研发机构和设备制造企业。加快打造培育一批位于产业链和价值链高端，高成长性的科技小巨人企业。如国内规模最大的肿瘤大数据平台零氦科技于2016年10月正式落户中心商务区。到2017年底，零氦科技有望发展成为全世

界规模最大的肿瘤大数据公司。11月8日，中钢集团创新创业基地——中钢科德孵化器在天津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正式启动，包括全国最大的3D打印设备研发企业多巴科技等在内的首批4家入驻企业集体签约。中钢科德还将联合零氦科技谋划建立国家级医疗大数据产业基地。

5. 文化传媒创意产业方面，重点推进文化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基地建设，打造涵盖创意、制作、营销、版权交易、衍生品开发的完善产业链条。吸引聚集新闻出版、影视制作、工业设计、数字内容等创意产业资源。在于家堡“环球购”商业项目打造首个航空文化体验项目，实现线上平台与线下体验店联动。未来，旅客可实现购票、候机、休闲、购物“一站式”航空体验。

6. 教育产业也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如天津师范大学音乐与影视学院和中心商务区管委会共同建设创新创业实践基地，正式落户于家堡自贸试验区创始空间。根据协议，天津师范大学音乐和影视学院将依托中心商务区的资源及平台优势，开展多种形式的教育培训、讲座、文化交流等活动。此外，备受关注的世界名校茱莉亚音乐学院天津分院设计方案正式出炉，并将于近期在中心商务区启动建设。

7. 在上述产业发展的同时，中心商务区还在加快双创特区建设，优化提升商务区载体功能，充分发挥自贸试验区、自主创新示范区“双自”政策叠加优势，在体制机制、人才引进、国际资金集聚使用等方面先行先试。2015年9月至2016年10月14日，商务区已累计落户创新金融、国际贸易和跨境电商、科技互联网和文化传媒创意等四类“双创”企业3875家，占到同期新落户企业总数的67%以上。自挂牌以来，中心商务区月均新增“双创”企业300余家，预计有44家企业年纳税额将超过1000万元。

二、中心商务区产业集群 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1. 大企业入驻不多，世界知名大企业更为鲜见。这与天津自贸区整体的国内外影响力不高有关，也与中心商务区的定位以及自贸区三个片区之间的分工和竞争关系有关。尽管天津机场片区重点发展航空航天、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高端制造业和研发设计、航空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但

也吸纳金融企业、企业总部等入住，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心商务区形成了竞争，削弱了中心商务区的核心吸引力。

2. “双创”类企业对经济的贡献比较小，创新创业政策体系还需不断完善。“双创”企业大多处于运营开发期，2016年上半年中心商务区企业增加值排名前40名的企业合计实现增加值142亿元，占中心商务区全部增加值的99.9%，其中没有一家“双创”企业。

3. 政策执行实施不到位，服务质量及效率还有上升空间。目前自贸区《总体方案》90项分解任务已完成57项；两批175项制度创新举措有141项已落地实施，尚有34项没有实施；“金改30条”的政策落地70%。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政策实施不到位问题。在执行过程中有时过于教条，政府服务不够灵活，对政策理解不深入，错失了一些引资机会，服务质量还需要进一步提高。

4. 金融发展潜力还没有充分挖掘出来。创新金融可以分为基础类新金融和应用类新金融。基础类主要有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债券、基金、融资租赁、风险管理八大类。应用类主要有民生金融、科技金融和产业金融，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科技金融和绿色金融，这两个领域未来发展极具潜力。

5. 进出口贸易连续负增长，外贸潜力特别是对日韩贸易没有发挥出来。2015年中心商务区对外进出口总额为17亿美元，比2014年大幅下降30.8%。2016年上半年，中心商务区进出口总额为4.32亿美元，比2015年同期的8.37亿美元下降48.3%，只完成全年计划的24.5%，其中出口完成全年计划的23.1%。中心商务区外贸额的大幅下滑既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特别是对日韩贸易发展潜力挖掘不足，也与国内经济增长减缓密切相关。

6. 教育、医疗、文化等配套设施还不完善，生活居住环境质量有待提升。目前中心商务区的幼儿园、小学、中学等教育配套还比较缺乏，医疗机构进驻较少，生活便利化水平较低，文化产业处于初期发展中，尚无法全面满足居民物质及精神生活的需要。

三、推进中心商务区产业培育与发展的对策建议

天津自贸区的总体目标是经过三至五年的改革

探索，将自贸区建设成为贸易自由、投资便利、金融服务完善、高端产业集聚、监管高效便捷、法制环境规范、辐射带动效应明显的国际一流自由贸易园区，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和中国经济转型发展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结合中心商务区的总体定位，针对上述产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特提出如下几点对策建议。

第一，转变政府职能，将自贸区各种政策执行实施到位，并使总体服务质量水平再上一个台阶，为各类机构加速向中心商务区聚集、开展业务创新创造条件。继续推动商事登记标准化，形成具有商务区特色的市场主体登记标准化操作规程。优化完善市场主体登记网上预约预审系统，提升整合有限公司、外资、合伙企业设立网上申报与变更功能，逐步实现商事登记全部网上办理。同时加快行政审批的效率，进一步深入探索“多项合一、多证合一”改革和“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

第二，在重视招商引资促进各产业集群发展的同时，努力完善教育、医疗、文化等配套设施，提高中心商务区居民精神物质生活水平。一方面通过招商引资提高配套，另一方面还需要政府的财政投入。要加快于家堡二期、响螺湾、天碱商业区和东西沽四大片区开发，谋划布局一批新的教育、医疗、商业、文化、住房等配套项目，推动区域配套环境不断提升。

第三，深化金融改革创新，大力推进简政放权、扩大业务开放，深化与海内外金融机构和专业机构的合作，促进金融创新产业的发展。中心商务区应借助创新金融体系，引导社会资金流向实体经济，并以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转型，构建创新金融鼓励政策体系。以首都金融企业、金融资产、金融业务、金融人才为金融招商的主攻方向，加快推进央企产融结合示范基地和资产管理业务创新中心、资产证券化业务中心、保理产业聚集中心、保险业创新中心、跨境投融资服务中心等“一个基地、五个中心”建设。

第四，推进投资和贸易便利化改革，进一步挖掘跨境电子商务的潜力。要加快拓展“单一窗口”服务功能，加强“互联网+”应用，发挥“双自”联动优势，进一步提升商务区投资便利化水平，促进京津冀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政策链深度融合，推动更多的首都优质资源向中心商务区转移聚

集。加快APEC绿色供应链天津示范中心建设，探索发展更多的新型贸易业态，同步建设完善跨境电子商务综合服务平台，积极尝试贸易发展的新途径新模式。要进一步丰富提升进口商品保税展示交易的形式和种类，建设完善一体化的贸易综合服务平台，优化提升“1+1+1”跨境电商产业生态体系。进一步完善对外投资合作“一站式”服务平台，组建龙头企业“走出去”服务联盟，鼓励有实力的企业出海并购全球核心资源，推进金融服务、服务贸易、科技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对外开放。

第五，在不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时，还要致力帮助驻区其他企业解决好融资、市场、用工等方面的发展瓶颈和现实问题。对于国有企业，积极落实国家和市区有关深化国企改革文件精神，理顺集团系统企业管理体制和投资运作关系，按照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完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实现集团化管理、专业化经营、市场化运作。对于那些对中心商务区经济贡献较大的驻区企业，要切实做好服务，保障企业平稳运行。针对发展前景好的中小企业，成立专门团队，帮助其对接各方资源，尽快成长壮大。

第六，全面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完善创新驱动体制机制。应以国家双创示范基地建设为

抓手，切实落实相关政策，激发中心商务区企业创新创业活力，完善创新驱动体制机制。努力引导扶持已落户众创空间不断提升服务孵化功能，打造专业众创空间，大力培植各类创新载体，推进众创空间转型升级。研究制定一系列新的政策举措，加快形成具有中心商务区特色和全国影响力的双创政策体系。着力塑造崇尚创新、鼓励创业、宽容失败的文化氛围，充分发挥京津冀众创联盟的作用，促进京津冀地区的创新创业资源跨区域流动。

第七，注重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与发展。中心商务区应结合产业集群发展情况与自身功能定位，注重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培育与发展，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对外开放，构建协调发展新格局。

[参考文献]

- [1]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R] www.china-tjftz.gov.cn
- [2]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管委会[R]. “关于中心商务区经济发展和规划相关情况”的报告.2016（10）.
- [3]《2016上半年中心商务区统计月报》[EB/OL]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官网www.china-tjftz.gov.cn
- [4]李迅雷.“新金融”发展的趋势与策略[N].21世纪经济报道.2012-9-10.
- [5]张芃,王艳红.浅析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背景下天津滨海新区发展对策[J].天津经济,2014（6）:5-9.

Investigation on Industrial Cluster Development in the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of China (Tianjin) Pilot Free Trade Zone

Wang Yanhong, Meng Guangwen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Abstract: The financial sector, headquarter economy, cross-border business, culture media creativi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a new gene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ve become the five leading industries cluster in CBD. At the same time, there had some ques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cluster, such as the shortage of number on the scale of large enterprises, the less contribution to the economy of "double innovative" enterprises, the imperfection of entrepreneurial innovation policy system, the policy implementation did not reach the designated position, the financial development potential is not fully improving and the continuous negative growth about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including transforming government functions, speeding up the free trade area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improving education, health, culture and other supporting facilities,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financial innovation, promoting new vigorously decentralization, opening wider to the outside world, promoting the reform of investment and trade facilitation and the full implementation of innovation 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Key words: China (Tianjin) Pilot Free Trade Zone,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Industry Cluster, Beijing-Tianjin-Hebei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收稿日期:2016-12-21 责任编辑: 垠喜)

【地方发展】

东莞松山湖及周边镇区的统筹发展

胡青善

(东莞市社科院, 广东 东莞 523083)

[摘要] 随着珠三角区域一体化和轨道交通的加快建设, 尤其随着深圳城市外扩和产业溢出, 松山湖及周边区域正成为新一轮发展热点, 园镇统筹发展最有条件也最为迫切, 应以规划统筹和行政统筹为主要手段, 重点建设松山湖大高新区和东莞城市副中心。

[关键词] 松山湖高新区 周边镇区 园镇统筹发展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17)01-0055-04

[作者简介] 胡青善(1975—), 湖南耒阳人, 东莞市社科院科研部主任, 助理研究员, 研究方向: 咨政研究与项目可研。

一、园镇统筹发展是东莞转型升级必由之路

(一) 主动承接深圳产业溢出, 加速东莞产业升级

东莞、惠州乃至中山(深中大桥开通后两者距离迅速拉近)受益于区位优势, 成为深圳产业和城市外扩的主要受益者。东莞临深区域自然是深圳外扩首选之地, 尤其华为终端总部进入松山湖, 加速了深圳产业、人才、投资和消费向东莞转移, 深圳由此也成为带动东莞转型升级的最强外部力量。在当前加工贸易退潮形势下, 主动对接深圳、承接深圳产业溢出, 必然成为东莞主要发展方向。但与惠州、中山比, 东莞土地瓶颈制约突出, 要克服短板, 提高综合竞争力, 最明智的选择就是加快统筹园区发展, 提升园区、工业区和城市发展水平, 高水平规划建设TOD商务区, 主动承接深圳高科技产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转移, 承接深圳投资、消费和人才的溢出。其中, 松山湖高新区在区

位优势、发展基础等各个方面, 无疑都是承接深圳产业转移的主阵地。但松山湖本部区域可用土地已非常有限, 即使合并生态园, 总规划面积达到103平方公里, 且生态园与松山湖空间上隔离, 松山湖要加速科产城融合发展, 乃至定位于城市副中心, 必须统筹周边镇区, 拓宽城市发展空间, 并与深圳无缝对接, 才能更有效吸引承接深圳产业溢出。

从东莞自身看, 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急需发展以科技园区和工业园区双轮驱动的园区经济。尤其当前, 东莞加工贸易持续退潮, 产业转型升级压力巨大, 必须改变过去依靠镇村分散发展加工制造业的格局, 走创新驱动之路; 必须加快发展园区经济, 以园区平台支撑科技创新、支撑高技术产业发展, 推动产业集聚集聚发展。

(二) 顺应城镇化发展趋势, 加快市中心区扩容、构建多支点城市副中心

从城市发展趋势看, 东莞前30年属于典型的工业化带动城镇化, 城市进程包括基础设施及生产、生活服务都滞后于工业化进程。当前, 服务业占比

已超过工业，上升为主导地位，城市发展引领产业升级成为主流，产业转型有赖于城市升级。目前东莞镇村环境普遍只能承载劳动密集型的低端产业，难以集聚高端产业资源，亟需通过区域统筹，为产业转型营造良好的城市环境。

从城区扩容看，目前市中心区商业与人口饱和，城市更新改造困难，交通拥堵等城市病异常突出，不仅行车难，停车更难，向周边蔓延扩张空间也非常有限，必须依托轨道交通向外“裂变式”发展副中心区。无论从土地空间、区位优势和发展势头等各个方面看，相比市区周边其他区域，松山湖及周边区域无疑是建设东莞城市副中心区最现实可行的选择。松山湖及周边区域地处深圳、湾区与市区中间，是东莞名副其实的地理中心，拥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科技产业。莞惠城际开通后，松山湖及周边区域与市区时空距离将迅速缩短，将很快成为新一轮经济开发热点。整合松山湖及周边区域，有利于进一步依托寮步对接市区、整合生态园，通过大岭山无缝对接深圳和长安新区，通过大朗对接常平和惠州，带动原东部工业园区区域加快发展，形成大高新区和科技新城格局。

（三）突破“各自为政”格局，实现区域一体化发展

当前，东莞处于各种传统优势弱化，新的竞争优势尚未形成之际，发展粗放、利益固化、产业低端、土地滥用、交通拥堵、城镇散乱、环境透支等诸多长期积累的问题逐渐暴露。其中，土地资源滥用、产城布局散乱和全市域范围交通混乱拥堵最为突出，深层问题则是长期“市辖镇”行政管理体制导致的“诸侯割据”和城市缺乏统筹规划、功能缺乏整合。要有效解决或者缓解这些问题，最根本的解决途径仍是强化区域统筹。而在目前行政主导体制下，区域统筹如果局限在“经济区”层面，不能在行政层面进行统筹管理，其力度非常有限。为此，必须强化行政统筹。有效破解松山湖受周边镇封堵而突出存在的“孤岛”困境问题，在更大区域范围而不是仅仅园区内进行资源配置，真正实现大区域范围的产城融合发展。

（四）提升综合实力应对外部竞争

园区发展已成为我国地方经济发展和竞争的关键和核心，园区竞争呈白热化态势，各地争政策、争资金、争科技资源、争外资和大项目非常激烈。

为增强园区的综合竞争力，各地普遍加强了园区的统筹力度和集聚程度。包括苏州、宁波、珠海、惠州和广州等园区普遍扩张，园区与周边区域不断统筹发展。

与国内先进园区比，东莞的园区发展，无论在发展时机、发展力度、发展规模、管理水平、土地空间及政策优势诸多方面都存在较大差距。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园区之间、园镇之间的产业发展、核心功能及规划管理方面缺乏统筹协调。必须整合各大园区与周边镇街资源，加强园区之间、园区与镇街之间的规划、政策、产业和管理统筹，转“单打独斗”乃至“内斗内耗”为“握紧拳头”、“合作共赢”，切实打造核心功能突出、辐射带动能力明显、具有较强综合竞争力的现代化园区。

二、加快松山湖与周边镇 统筹发展的重点目标及路径

加快松山湖与周边镇区的统筹发展，应以打造国家级大高新区和城市副中心城区为主要目标，以无缝对接深圳和市中心区为主要方向，以区域统筹发展为主旨、规划统筹为引导和行政统筹为重点，发挥松山湖大园区、大平台、大项目、大品牌优势及周边镇区产业基础和综合发展优势，强化园镇产业合作，整合区域资源，构建互利共赢机制，在更大区域范围谋求科技、产业、金融和城市融合发展，建设全国真正有影响力的大高新区和东莞城市副中心。

（一）建设松山湖大高新区和国家级自主创新示范区

1. 积极承接深圳产业资金与人才溢出。应抓住深圳产业外溢机遇，充分发挥松山湖区位环境、产业基础和创新平台优势，在配套服务好华为及其上下游产业发展同时，重点针对深圳高端产业项目和中小创新型企业开展招商引资。其中，大型高端产业项目，可重点向台湾科技园和生态园布局；中小微创新创业类项目，尤其是深圳南山科技园区成功孵化的高科技和现代服务类项目，可引导其公司总部设在松山湖各孵化园，生产布局在周边镇区的工业园或由本土制造商为其提供代工生产。在积极引进深圳项目的同时，要着力引进资本和人才，以资本和人才反向带动项目引进。引进策略上，要有的

放矢，针对不同类型企业的需求灵活制定政策。

2. 引导总部和现代服务类企业向园区集聚。目前松山湖已建成一批重大项目、科技平台和各类创新科技孵化器、加速器、金融园、电商园，尤其以华为终端为代表的一批重大项目的进入，奠定了其创新高地地位，对周边区域带动效应加快显现。但目前松山湖与全市尤其周边区域尚未构建有机产业链关系，园镇尚未融合发展，城市综合配套服务滞后，园内创新资源多处于闲置或者“半死不活”状态，“孤岛”困境突出，尤其北部工业园近年建设的包括中科创创新园、创意设计园、光大WE谷、国际金融园、青年创业公社等一大批创新创业类“园中园”普遍处于起步阶段，大量物业资源空置。要破解“孤岛”困境，必须打破行政壁垒，在全市域范围构建园镇合作和税收分成机制，引导大型企业总部、高科技企业研发中心和中小创新型企业向松山湖集聚发展，激活松山湖创新活力，形成总部经济效应；引导穗港台深乃至市域各类金融创投、科技服务、文化创意、商务休闲等各类现代服务企业项目和高端人才向松山湖集聚，形成创新集聚效应。

3. 推动园镇创新合作方式。考虑到目前，松山湖本部区域可用于工业发展土地和空间已非常有限，而周边的工业园环境和服务档次普遍较低，难以吸引高端产业和高科技人才。应推动园镇合作，共同改造一批高档大型的创新型工业园，承载深圳产业溢出。操作上，可以松山湖控股公司、镇属控股公司和村组集体为主体，按股权方式共同组建投资主体，统筹整合园镇村土地空间，遵照“资源整合、利益共享和企业化运作”模式开展合作，以松山湖某某镇某某工业园为统一品牌，松山湖方面重点提供招商、创新、人才、政策、资金和高端服务配套，镇村主要提供部分资金、土地物业和公共服务支持，力求以科技园区提升改造工业园区，以工业园支撑科技园发展，真正实现园镇联动发展。

（二）打造东莞科技新城和城市副中心

目前，松山湖与周边镇区初步形成配合发展格局，但整个区域由于各自为政，分散发展，缺乏统筹规划，导致区域城镇化水平不高，商业服务以低端为主，松山湖与周边联动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接下来，应抓住莞惠城际轨道交通发展机遇，跳出狭隘的园或镇概念，在更大区域范围综合考虑优化提升区域城市功能，提高城镇发展水平。重点应依

托莞惠城际轨道交通的集聚功能，重新规划定位创意生活城的功能，着力把创意生活城打造成为TOD区域综合服务中心；应针对科研办公集聚区的白领阶层，尤其具有创新创业活力的年轻创客们，提供思想碰撞、人文交流和创新创业指导孵化等服务，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氛围；应着力优化提升松山湖周边区域商务服务功能，引导寮步、大朗和大岭山三镇城市更新改造，提升城市发展水平，实现错位发展、特色发展，与松山湖形成一体化发展。

三、以行政统筹管理为重点 加快推进园镇统筹发展

考虑到松山湖高新区及周边区域目前已是发展成熟区，要打造松山湖大高新区和城市副中心区，关键问题不是财政投入，而是要破解区划分割。应针对园镇融合突出存在问题，因势利导，在更大区域进行资源整合和功能布局，通过行政统筹、规划引导、资源整合并构建统筹协调机制，推动区域一体化与产城融合发展。

（一）强化行政统筹

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可分两步实施：

第一步：当务之急可借鉴虎门港与沙田镇、滨海新区与长安镇所实施的合一管理模式，不增设区级政府，只是在领导决策层实施园代管镇，由市委市政府相关领导兼任松山湖高新区书记、主任，管委会与镇区相关领导互相兼任，甚至重点部门的领导也实施互相兼任，形成区域统筹决策领导机制，其他机构根据发展需要进行调整变动。

应该说，这种做法已有成熟经验可循，容易操作，能够避免改革可能面临的阻力，也能够充分发挥市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但考虑到松山湖及周边区域与水乡经济区在开发程度、发展任务和复杂程度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尤其水乡经济区主要定位于规划控制区，而松山湖及周边区域主要定位为高新开发区，前者面对的主要问题是要加大基础投入，后者主要是解决区域合作问题。就此而言，两者在统筹力度和效果存在较大差异。领导层面的兼任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管理协调作用，但毕竟不是整体系统性的改革，因为缺乏有效的机制保障，往往短期效益强，长期效应弱，仍难以根本突破“各自为政”格局，难以有效解决关键问题。因

此，建议在恰当时机着手推进区划调整，推动区域统筹发展。

第二步：从长远考虑，应借鉴广州南沙区和黄浦区、珠海高栏区、惠州仲恺高新区等周边城市的区划调整经验，设置松山湖大高新区区级行政机构，按照“决策统筹、办事集中、管理精细和园镇联动”的原则，统辖寮步、大朗、大岭山3个镇和松山湖、生态园2园，形成市-区-镇（园）-村四级管理架构。

具体实施中有三个环节要重点关注，一是在领导安排上，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可由市委市政府相关领导兼任，区级其他领导则兼任3镇、2园主要领导，由此在领导层面统筹管理架构；二是在机构设置上，建议以松山湖管委会为主体，参照深圳、顺德的大部制和国内其他园区先进管理经验，通过优化整合园镇相关部门职能和人员统筹组建区政府，优化配置园镇管理职能，形成一体化服务和管理格局；三是在职能设定上，可参照广州南沙、黄埔区做法，实施经济与城市社会管理分离模式，大松山湖区政府重点承担经济、科技和城市规划等方面领导决策和统筹协调职能，镇区应强化执行、服务和基层管理职能。

考虑到东莞长期实施“市辖镇”管理体制，增设区政府，改革幅度和力度很大，会触动利益关系的调整，预计会有一定阻力。为此，建议先组织开展前期调研讨论和规划论证，形成思想共识后下决心实行政统筹。在改革过程中，应注重市镇、园镇、镇镇之间的沟通协调，注重利益平衡和照顾弱势群体，支持欠发达村的发展，力求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做大做强，推动东莞更高水平发展。

（二）强化规划统筹

参照水乡经济区做法，编制区域统筹发展总体规划 and 系列专项规划，以规划统筹推动资源优化整合。在战略定位上，应突出引导松山湖及周边区域与市区和深圳无缝对接，定位于大高新区和城市副中心区谋划区域发展；在规划方式上，应突出总体规划、城市规划与国土规划的有效衔接乃至“三规合一”；在规划重点上，应突出轨道交通引导和TOD区域的综合集聚，突出园镇相邻区域土地空间整合，突出产业合作和城市功能优化布局，在更大区域范围推动产城融合发展。

（三）强化土地资源整合

把“三旧”改造与城市存量土地资源整合、城市功能优化、城市产业升级有机结合起来；集中土地管理，打破镇街自行支配土地格局，创新区域土地资源统一调控；围绕公共交通导向和重大项目建设，科学配置土地资源。要以土地规划、开发、利用过程的执法保障为抓手，统筹部门利益，完善制度建设，着力构建园镇土地整备、集约利用机制，重点构建利益分成机制，保证重大项目落地，推动城市资源、空间和功能优化调整。

（四）加快公共服务功能优化整合

应进一步强化区域公共服务设施资源的统筹利用，着力推动公共文化设施、公共交通设施、慢行系统设施、医疗卫生设施、智慧信息设施等公共服务资源的优化整合，构建分工明细、布局合理、功能整合、利用高效的区域公共服务设施资源格局，提高公共服务资源的科学化配置水平和整体使用效率。同时，要以区域统筹为引领和平台，着力打通城市品牌资源节点，着力整合创新平台、旅游休闲、莞香文化和篮球城市等重点名片，形成区域发展亮点。

Coordination of Dongguan Songshan Lake and Surrounding Towns

Hu Qingshan

(Donggu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Guangdong Dongguan 523083)

Abstract: With the speeding up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rail transit construction, especially as the shenzhen city expansion and industrial overflow, songshan lake and the surrounding area is becoming a new round of development hot spot, the town as a whole the development condition of the most are the most urgent. Should plan as a whole and administration as a whole as the main means, big large songshan lake high-tech zone, deputy center city and city development demonstration area.

Keywords: Songshan Lake High-tech Zone, The surrounding townships Development Park, Coordinate Development

(收稿日期：2017-01-09 责任编辑：垠喜)

【创新策略】

实体零售商业模式创新及发展空间

李富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国际商务学院, 江苏 无锡 214153)

[摘要] 基于零售商业模式创新理论, 文章分析了互联网时代国内实体零售业面临的困境与契机, 探讨了互联网时代实体零售商业的几种创新模式和创新策略。文章认为, 互联网时代实体零售商业虽然受到电子商务冲击, 但通过商业模式的合理创新, 前景仍然较好。

[关键词] 互联网 实体零售商业 商业模式 创新 发展空间

[中图分类号] F713.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 (2017) 01-0059-06

[基金项目] 江苏“青蓝工程”资助。

[作者简介] 李富(1974—), 浙江安吉人,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教研室主任, 副教授, 博士, 江苏青蓝工程学术带头人, 江南大学MBA企业导师, 研究方向: 产业安全、高职教育与产业发展融合。

在电子商务冲击下, 我国零售业实体店倒闭现象频现, 实体零售商业面临的生存压力不小。而相比之下, 发达国家互联网更加发达, 实体店虽然也受到互联网冲击, 但冲击程度明显比国内要小。在很多发达国家, 大部分服装, 甚至电子商品等, 消费者仍会选择在购物中心进行购买, 大型商场内仍然人头攒动。

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 零售业商业模式创新势在必行。需要根据营商环境变迁, 对一系列要素进行重组和配置, 满足市场需求, 同时也更好地实现企业自身的价值。

一、互联网时代发达国家实体零售业现状

发达国家电商在零售业市场所占的销售份额逐渐上升, 实体店也曾出现关闭潮, 或者申请破产保护。为应对电商日益激烈的冲击, 发达国家实体零

售商业采取了如下相关措施:

1. 借助强大供应体系降低价格。如很多国外实体零售业, 已开始朝着品类全、质量好、价格低的方向发展。百思买集团执行线上线下价格匹配制度, 从今年3月开始, 其店内价格将与包括苹果、亚马逊等在内的19家在线购物网站一致; 塔吉特承诺, 顾客购物回家后1周内, 如果发现某个电商的价格更低, 将会退回差价; 美国好市多提供优质低价可靠的服务, 优质低价到亚马逊等电商只能避开价格战, 靠以量取胜; 沃尔玛推出“扫描即得”, 一项基于iPhone的自助结账服务, 顾客在沃尔玛消费时, 只需用该软件扫描物品条形码, 就可直接自助付款结账, 完成整个购买过程, 显著提高了运营效率, 节约了成本, 抵补了与电商的经营差价。

2. 社区化、便利店式的零售商业快速发展。诸如沃尔玛之类的大型超市已开始转型, 在大学校园附近开设类似便利店的小型购物店, 这些新型店铺

每季度销售额增长速度甚至达到两位数。在日本，便利店已经成为日本超市之外最流行的零售业态，一些百货公司、大型超市开始探索小型综合超市、便利店，以适应家庭微型化、老龄化、少子化的消费需求。很多便利店在选址时，注重在地铁、车站周边、住宅区和都市写字楼集中地区，做到真正便捷与高效。

3. 差异化战略被零售商业精细利用。实施差异化战略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商品外观、技术等存在差异，二是塑造自己的独有品牌，在服务等方面保持自己独有特性。在早期阶段这二者分开的居多，现在互联网经济时代二者更加趋于融合。发达国家零售企业自有品牌创新不断，品牌不断细分，市场不断细分，强化品牌开发和市场推广，实现差异化经营，重拾商品定价权。越来越多零售企业针对越来越细分的各个阶层和各种不同兴趣的市场需求，进一步拓展自有品牌的范围，开发充满创意的产品，以及面向特殊需求的商品。如高品质、绿色、特味、瘦身等各种定位的商品正不断出现在市场上，吸引了不同购买群体的广泛注意。

4. 线上线下全渠道策略综合运用。发达国家零售实体企业开始主动对接互联网，利用网络分发优惠券以及组织各种促销活动。如当人们在店内用智能手机比价时，零售企业促销活动自动弹出，激发起他们参与店铺活动的热情。美国零售额排名前十的零售商基本上都同时开辟线上和线下市场，注重多重市场的整合运营，进攻即最好的防守。很多零售商认为，相比对电商这种新模式的冲击抵抗，主动利用这种新模式，不失为更好的选择，通过线上、线下的有机融合，以线上促销带动线下发展等，可以充分享受各种策略的益处。

5. 零售商业体验店拓展全新视角。实体店铺最大的优势在于营造购物的体验感。良好的购物体验环境和触觉能给顾客带来沉浸式的购物体验。美国著名的青少年服饰连锁 Urban Outfitters 纽约曼哈顿店，占地面积 5300 平方米，其实是快乐的生活放松中心，顾客在里面可以体验几小时，很有乐趣；阿迪达斯和英特尔携手，推出了虚拟鞋墙；美妆实体零售商丝芙兰采用独家传感技术，允许顾客自行体验气味族。在店铺内部他们还提供了更多的互动区域，包括护发产品演示吧、流行趋势展示台等，VR 技术也已经被一些商家运用到与顾客的线下互动

中。越来越多的店铺把更多的空间留给顾客，让他们无拘无束地在店铺里感受产品，增加店铺空间的体验感，加强了品牌与顾客之间的互动。

二、互联网时代国内消费者行为变迁及实体零售业困境

（一）互联网时代消费者行为变迁

1. 由“孤陋寡闻”转化为“见多识广”。在互联网、社交网络和大数据为消费者日益熟悉利用的情况下，中国零售商业的主导权发生了重大变化，真正进入到消费者主权时代，传统的以商家为中心，依靠优越地理位置占据垄断地位的商业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互联网时代新生代消费者不仅注重线下消费，很多转移到线上消费，消费者理念和消费者行为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消费者接收信息的方式和手段越来越丰富，接收到的信息越来越多，消费者再也不是“孤陋寡闻”的商品销售被动接受者，而转变为“见多识广”的商品比较者，彼此间沟通和交流更加通畅，信息交换异常迅速，对商品的评价也由“消极被动”转变为“积极参与”。

2. 由“消遣负担”转变为“追求便捷”。我国城市人口众多，特别是一些大城市，上下班拥挤，花费时间多，一些企业加班也是常事，去超市购物往往难有空闲，电商就很好解决了这个矛盾，让大家可以把更多的时间用在休息和娱乐上。而在发达国家，由于城市人口规模不大，百万级人口规模的城市不多，有的国家三点半以后就下班了，加班就更少，所以逛街、购物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消遣并不是负担，对电商的需求也没有我们这么迫切，因此国外的电商很多时候充当的是个人间的二手用品交易和一些市场买不到的商品的交易平台。

（二）国内零售商业发展跳跃性带来的困境

1. 现代实体零售业诞生时间迟。从 1992 年开始，中国实体零售商正式引入现代零售业态，1998 年电子商务开始出现，前后只相差 6 年，因此我国发展电商时，现代零售业其实是欠发达的，其中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大型超市的普及率、连锁零售商业的覆盖率都不高，全国前 20 家零售商只占城市零售总额的 13% 左右。自上世纪 90 年代后，中国工业化和信息化发展迅速，不同零售业态紧密地出现，虽然仅用了 20 年的时间就走完了美国超过一个半世

纪的零售业态变革，但从整个行业发展状态而言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我国的现代零售业不像发达国家那么过于成熟和强大，结果就是电商通过不断蚕食传统实体零售渠道的市场份额发展起来，而在发达国家电商目前更多是实体零售业的补充。

2. 国内实体零售业售后服务不完善。发达国家现代零售业体系较为完善，线下实体店退货人性化，通常30天内都是免费退货的，甚至出现过一年之内免费退货的服务，他们的售后服务完善，而中国很多的实体店货物售出后，退货换货非常麻烦，相反电商的服务态度很好，退换货也比较容易，如果有不合理的地方，可以直接在网上给予差评，这样将会直接影响这个企业或卖家的信用，而很多消费者是通过看这个企业或卖家的信用决定在不在这家购买，因此电商企业或卖家非常注重自己的信用和在消费者心中的形象，在售后服务方面做得比较好。

3. 国内实体店价格比电商高很多。国内电商的壮大很大程度归源于国内消费者对于价格较高的敏感度，而随着房价的上涨，实体店租金越来越高，人工成本也越来越高，造成实体店的商品售价居高不下，有的甚至是电商的5到6倍，而电商经营成本较低，早期的电商不需要交税，仅需要能够存储一定货物的空间，也不需要众多的导购和管理人员，在这种情况下电商的经营成本要远低于实体店的经营成本，实体店的经营困难也就能很好的理解。

4. 实体店同质化问题造成用户体验感觉差。目前实体店缺乏用户体验的顶层设计和生态链。很多实体店都注重绩效，过分关注销售业绩和利润，因此都会充分利用现有的空间，造成商品摆放紧凑，商店空间拥挤，所谓一寸空间一寸金。消费者进入这样的实体店购物，没有体验到购物的愉悦和优质的服务，并且实体店产品和布局差异性小，没有给客户足够的新鲜感和吸引力，购物愉快的体验本来是实体店的优势所在，结果反而成了实体店的劣势所在，再加上空间有限，产品选择上的局限性，相比互联网电商的消费多样性选择，更加突出了实体店的劣势。

5. 缺乏与供应商形成深入稳固的互利共赢机制。不少实体零售商在经营时对市场、商品研究不够透彻，门店管理效率不高，没有对自己经营的关

键产品进行精细化管理，并且为获得更大的回报，一直致力于压榨供应商的利润空间，以至于和供应商的关系较紧张，很少有实体零售商与供应商形成稳固、密不可分的互利共赢机制。在电商的冲击下，原先的供应商更愿意与电商企业或卖家合作，电子商务宽松的环境也使得供应商更愿意与电商企业或卖家形成紧密的战略伙伴关系，从而使得实体零售企业原先充当生产商到消费者之间桥梁作用的角色被彻底削弱。

6. 零售商业模式创新定位和措施不合理。在电子商务的强烈冲击下，零售企业、行业开始寻求实体店生存的机遇，体验店模式开始出现，通过打造一个全新的体验环境，和提供优秀、周到的服务，来吸引客户购买产品。这点国外实体零售业也在这样做，但由于国内消费者消费理念与国外不同，在实践中，很多实体零售业主会发现一个比较尴尬的经历，一是有些体验店很少有人光顾，根本起不到宣传、推广销售的目的；二是即使进入体验店的客户，购买的人其实也很少，大多都记住商品的名称，然后回家上网购买，体验店变成人们娱乐和发现适合商品的地方，已经失去了设立的原有价值。

不少学者建议实体零售业转型走全渠道，一些实体零售企业也正在做，线上线下全出手，听上去的确是一个好办法，但实践表明，真正的实体零售业成功转型，走全渠道的很少，做成了四不像，这一方面是因为传统实体零售业很多理念根深蒂固，很多做法都是传统的，让其快速转型，很不现实；其次，有的在改变中又把全渠道理解为电商加上实体验店，反而影响了企业的发展。

三、互联网时代实体零售商业面临的契机

虽然实体零售商业现在发展遇到了冲击，但业界普遍预测到2020年，纯网络零售占社会零售总额的比重大约在18%~20%左右，依然有80%以上的交易在线下发生，实体零售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也有一些电商人士认为，实体零售业将来肯定会重塑辉煌。实体零售业未来发展前景看好的原因很多，研究认为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

1. 制造业过剩产能将会转移，商品差异化加剧。在过去的10多年里，我国实体零售商业往往依靠规模化优势来获取利润空间，如规模化经营、规

模化采购等，依据规模化效应进行谈判，降低商品进价，达到击败竞争对手的目的。而未来电商不断发展，零售实体商业不仅面临同行的竞争，也将面对电商的更加激烈的竞争，以往以价取胜的策略已经无路可走，加大商品差异化，走特色、差异化经营，将是实体零售商业在未来竞争中的取胜法宝。而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未来需要进一步转移和释放，零售商业是其转移的重要渠道之一。互联网时代供应链不同环节的利益相关者，可以实现信息的无缝对接，可以更加灵活地进行定制化生产，这为牵线零售商业和制造业过剩产能对接创造了便利条件，从而构建一条贯通消费终端和制造业源头的一体化便捷型供应链。

2. 快速发展的技术正改变商业，为实体商业赢得独特发展视角。随着大数据的运用，零售商业的开店选址、供应链协同、精准营销以及对客户的细分，都将更多基于数据的分析；随着先进科技在实体零售商业的运用，体验式零售商业将会越来越具有吸引力，个人设计、工厂直供将大行其道，科技正在改变零售商业，为零售商业的发展赢得独特的视角。未来增强现实、3D打印、无人机送货、谷歌眼镜、室内定位导航、大数据分析、移动支付和传感器等众多技术将被广泛应用到实体零售商业经营中，线上和线下的边界也将模糊化，零售商业的发展空间巨大。

此外，近十几年来，伴随着我国房地产热潮和一些商业实体的圈地投资，商业物业的租金成本不断提高，近年来达到了制高点。过去一两年的零售商业关店潮，其中相当大程度上便是由于店铺租金太高而无法承受。随着“关店潮”发展，商业物业不久便会呈现总体过剩局面，可以预见，未来实体零售店铺租金将会普遍下调，这将大大降低实体零售商业的成本，提高实体零售商业的竞争力。

四、互联网时代实体零售商业模式创新的几种模式

1. 推行名品低价。信息爆炸时代，各种好玩、实用的产品信息透过互联网传递给消费者，消费者接触的信息越来越多，眼界越来越宽，对商品越来越挑剔，在这种情况下，推行“名品低价”，更适应消费者的心理和市场的需要。所谓“名品低价”

并非追求绝对低价，而是侧重性价比，较高质量的商品，较低的价格，目前国内外一些企业推行的小众品牌就是典型。国内外一些实体零售商已经将“名品低价”策略应用得非常熟练，取得了良好的市场反馈。如宜家、迪卡侬和优衣库等，销售与实体零售业市场相反呈现逆增长，其实现在连汽车行业的宝马、奔驰等很多奢侈品牌也都开始采用“名品低价”策略。

2. 发展社区商业。我国社区商业还处于初级阶段。以每百万人拥有社区便利店店铺数量统计，日本是388家，中国城市平均为54家，而且中国城市便利店单店效率远远低于日本。近年来无论是家乐福开出的esay、还是大润发首家高端超市RHLavia，亦或是华润万家旗下的乐购EX-PRESS标超，以及从零售商业跨国公司的风向标也可以看出，这种凸显便利的未来社区性超市，将成为业界一大亮点和成为实体零售业生存的主流业态之一。

3. 二手经济与实体店的联动发展模式。互联网的发展，消费者可以收集到越来越多的信息，和拥有更多的物品购买、处理通道，消费者不仅在网上购买新品，也越来越多在网上转售服装和其它二手商品。事实上，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在购买商品前，都会考虑该商品的转售价值。很多商品消费者都喜欢在网上比较他们手里的商品是贵了还是便宜了，会考虑自己的商品有没有出售的可能，也是响应环保号召，“废物”充分利用。这对实体零售而言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因为消费者能通过转售获益，再购买新的商品。实体零售商业可以利用这点，与二手成衣交易网站达成合作，允许消费者根据转售的物品，获取零售商业实体的优惠券、优惠卡或折扣，这将对实体零售行业产生直接影响。

4. 以体验和服务为主的购物中心。零售商业的另一个发展方向是向购物中心发展，成为大体量、一站式的商业综合体，大到有足够的吸引力、号召力和集客能力。这种购物中心的存在，也能带动周边商业配套的发展，从而成为一个商业和娱乐集聚区。事实上，国外一些大型超市也正朝着此方向发展，如沃尔玛宣布创办“乐世界”购物中心就是这一思路，注重购物体验，给消费者以震撼感，吸引人气，提升销售业绩，集区域零售商业体验和服务为一体。此外，未来的实体零售业一定是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武装起来的商业业态，其地理

布局、技术手段、商业模式都将会发生重大变化，线上线下融合是未来的必然趋势，全渠道战略也是实体商业和互联网商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5. 创造零售商业加盟新时代。传统实体零售商业的发展模式是跑马圈地，不断进行扩展，发展直营店，在互联网时代，实体零售商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向是朝着便利店、社区化和小型超市的方向发展。为应对激烈的竞争，降低经营成本，一些规划比较长远的商业集团开始动员员工进行创业，创新加盟方式，发展内加盟模式。这种模式的兴起，将有助于创造分散经营，同时也体现战略联盟的思想，降低经营的成本与风险，同时提高企业竞争力，是适应互联网时代发展的一种商业经营模式趋向性的变革，也创造了连锁加盟的新时代。

五、互联网时代实体零售商业模式创新策略

1. 创新不应改变商业逻辑关系。互联网时代很多实体零售商业受到冲击，但即使电商发展普及率很高的北上广地区，像宜家、迪卡侬、Zara等实体零售门店依然生意兴隆，互联网不但没有冲垮它们反而助其成长。经过研究我们也发现，很多传统零售企业转型线上，发展电商新渠道也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造成这样的原因在于，互联网虽然改变了人们的消费理念和消费行为，改变了供应链的秩序，但并没有改变零售商业的基本逻辑：即以消费者为中心来开发产品和创新服务，以拉动式供应链来驱动商业模式创新和加速产品和服务价值流动和实现，这也是商业的核心要义。大量研究表明，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的成功的零售商业企业，其普遍特征都是遵循零售商业的基本逻辑和核心要义，以客户为中心，开发自有品牌，注重创新，强化供应链协调和敏捷，推行体验式消费等，这些都是实体零售商业转型的重要方向。

2. 需要处理好供应链协同。实体零售商业发展一直以来就存在缺货和库存的两难困境，解决这一矛盾有赖于供应链上各个参与者的协同，包括分销体系、物流体系和生产制造。以前实体零售商业时代，一些零售商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付出的代价也比较大，在互联网时代并不是所有企业都可以采用类似方法。供应链协同

的关键在于数据的无障碍流通，而互联网最大的优势就在于数据和信息流动的快捷和低成本，因此在互联网时代数据全供应链分享的贯通非常方便，在信息高度共享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实现零售商业的低库存，甚至零库存，实现低成本、高效率。而跨境电商的兴起，相应服务机构的不断涌现，也为实体零售商整合全球供应链提供有力保障。

3. 从销售商品转向提供服务和情怀。互联网时代，消费者心态已经发生变化，零售企业应由销售商品向提供商品和服务综合型转变。事实上，在未来，仅仅提供商品和服务还远远不够，具有生命力的实体店也应是具有情怀的实体店。实体零售商业要从环境布置、商品陈列以及服务人员的修养都要显示出经营者的情怀。它告诉消费者，这不仅仅是零售商业店铺，更突显了对人性的关怀，彰显人格的存在，这也是零售商业差异化经营的重要途径所在，因为商品的差异化只是局部的、相对的，而情怀的关怀则是多样化的。

4. 注重产品研发和供应链掌控。现在经营比较好的实体零售企业，就是注重产品的研发，所有的产品基本都是企业自身研发，这样做的好处在于既保障了产品的质量，也对其他竞争者形成了天然的壁垒，构筑了自己独特的竞争优势。同时为了节省成本，互联网时代的零售企业应该全球布局产业链，规模化采购、以最低成本和高效率的模式组织生产，提升对供应链掌控和市场的把握能力。

5. 运用大数据提高管理绩效。互联网时代，实体零售企业要通晓运用大数据来对企业进行管理，把大数据贯穿到企业经营的每个环节，用大数据对顾客群体进行细分，运用大数据进行市场营销，要利用数据分析，对社交网络等网上浏览痕迹进行大数据挖掘，发掘市场的新需求，并根据分析的结果，掌握潜在客户的心理行为和偏好，根据客户的喜好进行精准化、个性化推荐，开发更具有针对性、更符合市场需求的个性化产品，减少竞争压力，以此增加新的客户、提高客户的忠诚度、降低客户流失率、提高客户满意度等。

七、结论

互联网时代电子商务快速发展，对实体零售商业形成一定冲击，但未来实体商业的前景仍然会

较好，实体零售商业店铺倒闭潮也是暂时的。发达国家零售商业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实体零售商业的问题在于发展历程短、售后服务等环节存在问题，再加上跑马圈地中店铺租金的不断抬升造成的成本提高。我们也应看到一些实体零售商业在这股浪潮中不仅没有受到冲击，相反经过经营模式创新，反而赢得更大的发展空间。这一切都证明实体零售商业如能通晓互联网特点，遵循零售商业的发展趋势，整合和优化供应链，注重研发和自由品牌，突出产品差异化，仍然可以大踏步前行。

未来，实体零售商业发展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运用新技术，创造自己的经营模式和环境，用新技术武装自己的商业经营，更加把握自己店铺的市场定位和客户精准细分，统筹涵盖线上和线下的全渠道，实现实体和虚拟的融合。实体零售商业的前景在于把握自身发展方向和各实体零售商业经营人的战略目标。

[参考文献]

- [1]盛亚，徐璇，何东平.电子商务环境下零售企业商业模式:基于价值创造逻辑[J].科研管理, 2015, 36(10): 122-129.
- [2]刘向东.移动零售下的全渠道商业模式选择[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29(3): 13-17.
- [3]李富.大数据时代消费者行为变迁及对商业模式变革的影响[J].中国流通经济, 2014(10): 87-91.
- [4]朱瑞庭,尹卫华.全球价值链视阈下中国零售业国际竞争力及政策支撑研究[J].商业经济与管理, 2014, 275(9): 17-24.
- [5]谢莉娟.互联网时代的流通组织重构——供应链逆向整合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 2015, 325(4): 44-56.
- [6]彭虎锋,黄漫宇.新技术环境下零售商业模式创新及其路径分析——以苏宁云商为例[J].宏观经济研究, 2014(2): 108-115.
- [7]李飞,贾思雪,王佳莹.中国零售企业商业模式创新要素及路径——基于胖东来的案例研究[J], 技术经济, 2015, 34(1): 37-45.
- [8]李富.大数据时代商业模式变革契机[J].开放导报, 2014, 177(6): 107-109.

Entity Retail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Space

Li Fu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Wuxi Institute of Commerce, Jiangsu Wuxi 214153)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retail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analyzing the dilemma and the possible opportunities of the entity retail business in the Internet age by the research of entity retail industry in developed country in the internet age. It also discusses several innovative models which is benefit to retail business out of predicament in Internet era, and points out the tactics and notices of the retail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in the Internet era.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although the Internet entity retail business will be impacted by the electronic commerce, the future prospects of entity Business are still good through the reasonable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Keywords: Internet, Entity Retail Business,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Development Space

(收稿日期: 2017-01-04 责任编辑: 垠喜)

【创新策略】

现代财政制度建设中的困惑如何破解

王庆

(兰州财经大学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20)

[摘要] 自2013年中央提出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以来, 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不断印证了其战略判断的准确性, 财政现代化建设对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到2020年基本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目前还存在理论界认知不统一、中央与地方实践分歧、系统性要求与渐进式改革相矛盾等困惑。应考虑通过深化财税改革、加强理论探讨和多角度阐述财政现代性等措施, 推进现代财政制度的建立。

[关键词] 现代财政 财税改革 跨学科研究

[中图分类号] F8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17)01-0065-04

[基金项目] 2016年度甘肃高等学校科研项目“建设幸福甘肃的现代财政机理与政策研究”。

[作者简介] 王庆(1977—), 甘肃山丹人, 兰州财经大学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财政系主任, 教授, 研究方向: 财政理论与政策。

一、建立现代财政制度面临的困惑

2013年中央提出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凸显出我国财政现代化对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意义。然而, 在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实践中也存在一些困惑。

(一) 认知上的不统一

自中央提出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以来, 理论界围绕着现代财政展开了讨论, 但讨论结果在聚焦于现代税收制度、现代预算制度和现代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同时, 却在更大范围内引出了对财政的纷争。纷争主要反映了自国家分配论后, 理论界对财政本质、属性等基本理论问题的界定出现的分歧, 尤其是随着市场经济模式弊端的不断显现, 这种分歧正在扩大。而从我国现实国情看, 一方面, 对中高速增长的需求依然迫切, 还需借鉴市场经济模式发展经济; 另一方面, 价值观缺失、环境污染等公共危机的不断累加, 又亟需从公共治理、伦理规范

等角度对市场经济主导的经济增长进行修正。从国家治理角度来勾勒现代财政制度框架, 对财政理论界来说, 不失是一种折衷办法。但就财政纷争而言, 这种折衷显然不够, 财政定位模糊不清, 既无法解决财政一直关注的传统问题, 也无法全面阐明财政与国家治理间的现代关系, 这也是为什么自2013年底中央提出现代财政制度以来, 理论界的讨论却不尽如人意。

而且, 现今更为棘手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实现公共财政研究与现代财政讨论的有效对接, 虽然对公共财政与现代财政的关系, 笔者进行了深入分析, 并认为从长远看现代财政改革有助于理解财政的公共性本质, 但这毕竟也只是一家之言, 还需经过理论界的深入讨论建立起公共财政与现代财政间的逻辑关联。

(二) 中央与地方的实践分歧

中央与地方政府对待现代财政的实践态度, 同中央与地方在财政收支上的配置变化有直接关系。

建国初期，统收统支体制保证了中央政府的稳定财源，1953~1957年，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平均为78%。1958年，财政体制进行调整，新体制下中央与地方在财政收入上的配置比例仍维持在80%和20%，但在财政支出上的配置比例从之前的73%和27%变化为44%和56%，地方收支缺口的突然放大促使财政体制于1959年继续调整，中央与地方的收入配置也随之变为24%和76%。1959~1979年，中央以平均23%的财政收入负担平均54%的财政支出的尝试，并未换来稳定的高经济增长，这一时期全国财政收入的平均增速为7.2%，最高时达到45.8%，最低时甚至为-37.8%。1980~1993年间中央财政支出平均占比下降到40%，相比所获财政收入平均占比提高到32%，中央收支倒挂情况有所改观，中国宏观经济开始双位数增长。可反观财政，长期包干制下，事权下放所导致的全国财政收支萎缩以及经营企业之利所导致的税外之费的不断放大，严重影响了财政整体运行质量。1993年，全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下滑至12.3%，这与我国人口、面积的体量极不相称，分税制改革势在必行。

从效果上看，分税制有效提高了两个比重，但同时却延续了包干制下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配置关系的变化情况。1994~2012年，中央财政收入平均占比继续放大到52%，财政支出平均占比继续下降到26%，收支倒挂的主体由中央政府反转为地方政府。而且，与分税制同步进行的还有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政企分开”的改革要求割断了地方政府与经营性企业间的直接利益链接，客观上加重了地方政府收支倒挂的局面。故在分税制不断深化的过程中，财政状况趋于好转的中央政府越来越强调财政运行的规范性和民生性，而财政状况转而恶化的地方政府则聚焦于获取财政收入，并在实践过程中逐渐固化到经营土地和债务融资上来。

基于这种认识，可以说2013年底提出的现代财政制度，某种程度上加剧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不同的财政运行趋向。面对国内外错综复杂的发展态势，中央政府需要财政运行更加规范、民生、多元和有效，而这本身就给地方政府带来了更大的财政压力。

（三）系统性要求与渐进式改革相矛盾

纵览改革开放以来的财税改革措施，包干制改革以利益出让为名将经营权和经济权下放，扩大了

我国经济主体范围，这虽有利于经济增长，但在下放过程中也造成财政运行的非规范化，如包干形式多样化、地方政府间非规范财政竞争等；随后的分税制改革和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在财政制度规范化方面有所建树，但又因财权事权不匹配、财政转移支付非均等化、财政运行GDP单一考量等原因，使我国财政在未能解决个体追求经济利益与整体实现平衡稳定间矛盾的同时，又产生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生产与分配、供给与需求等新矛盾，进而诱发土地财政、税费并立等非规范操作。进入21世纪，财税改革集中于预算方面，力图通过预算制度的规范化来提升财政整体的规范化，以增强财政支撑社会经济尤其是经济发展的能力，但从效果上看并未改变财政制度规范化与非规范化并存的局面。

从财税主体—政府与公众的视角来看渐进式改革的这一缺陷，有一定缘由：从政府视角看，渐进式改革容易形成固化的部门和地区财税利益，从而使后续财税改革措施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渐进式改革进程越长，这种阻力越大，反过来渐进式改革的速度就变得越慢，利益固化成为渐进式改革最大的障碍；从公众视角看，渐进式改革使个体对财税改革的整体规划和长远目标缺乏清晰认识，从而更在意短期利益，愿以公共责任缺失为代价换取灵活的非规范财税政策。故集理论与实践创新于一身的现代财政制度虽与当前国内外态势、财政自身发展相契合，但其系统性要求却与渐进式改革内在的维持现状张力相抵触，建立难度自然很大。

二、破解困惑的具体建议

201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加大积极财政政策力度，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并保障政府应该承担的支出责任。与此同时，亚投行在美联储加息的背景下正式成立，标志着全球迎来了首个由中国倡议设立的多边金融机构。这一系列重大事例的发生都折射出我国当前发展面临的挑战与机遇正在加速。基于此，我们亟需一个运行更趋完善的现代财政作为坚实后盾。那么，如何在2020年基本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笔者以为，可从以下几方面重点突破。

（一）深化财税改革

就建立现代财政制度而言，以实践推改革，

以改革促发展，是一条有效的建设途径。事实亦如此，自2013年底中央提出现代财政以来，财税方面的改革陡然加速，预算法修订、营改增、消费税与资源税调整以及环境税、房地产税和个人所得税的改革预期等，既吸引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也在无形中推动着我国财政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从2020年基本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目标出发，今后几年的财税改革应侧重以下方面：

1. 调整中央与地方事权。一是理论和实践层面上都要重视事权归属问题，变“以收定支”为“收支同等重要”；二是细分公共品或服务的实践类型，尤其是中央政府担责的全国性公共品或服务的范围要界定清楚，并以此为依据，放大中央政府事权，使中央政府在实现社会经济和谐可持续发展、形成全国统一有序市场、促进公平正义等公共伦理观方面发挥主体作用。同时，这也能有效缓解地方政府的支出压力，改善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促使地方政府在财政现代化进程中认同更为长远的财税改革目标；三是进一步改进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控制财政转移支付规模，降低返还性、专项性转移支付比例，使财政转移支付专注于弥补地区财力差异。

2. 规范财政体制。财政体制的规范性是自分税制以来就在追求的改革目标，但实际效果主要集中于宏观调控、财权划分和预算监管等内容，从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出发还需做到：一是实现法治财政。依法理财是财政实现现代化的基本前提，也就是说，没有健全的财政法律框架，效率再高的财政体制也不能称之为现代财政。这一点在以往的财政运行过程中经常被政府事务的灵活性所取代，应以此此次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为契机加以纠正，使我国在宪法、财政基本法和财政行政法规规章三个层次上的法律建设都得到提升。另外，还要严格规范地方财政立法，在保持地方一定自主权的同时加强监管；二是税制结构调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税制结构已经历过数次大的调整，一些主要税种的调整更是不曾间断，但即便如此，若从现代财政的要求出发，现行税制结构必须再有大的调整。而且，现行税种的数量不足使中央政府集中财力、改进收入划分的努力总是变成对地方财力的挤压，这也是地方财政非规范收入不断放大的重要原因。故应加快开征财产税类税种，调整现行所得税类税种，扩大直

接税征收范围和收入比例，综合个体收入、消费和财产能力分摊税负，在实践社会公平的同时扩大税源，尽早建立起中央与地方两级稳定的税源结构。

3. 深化预算制度。2000年以来的我国财税改革主要集中在预算制度方面，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支付、政府采购和收支分类改革的相继开展，强化了预算管理所应发挥的计划、协商和监管功能，但作为要建立的现代财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现行预算制度还需从以下几点出发深化改革：一是提升预算高度与重要性。大力宣传和普及预算理念，使年度预算工作成为立法机构、行政机构、社会中介组织和公众共同关注的头等大事；二是规范复式预算体系。1995年执行的《预算法》中确定的包括公共预算、国有资产经营预算和社会保障预算等在内的复式预算体系依旧具有现实意义，若能突破地方和部门利益，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规范编制并公开国有资产经营预算和社会保障预算等，那就为将全部政府收支纳入预算监管奠定了坚实基础；三是清晰预算周期各环节要求。完整的现代预算一个周期涉及编制、审核、执行和决算四个环节，现代预算编制要求精确细化，预算审核要求独立求疑，预算执行要求及时规范，预算决算要求公开绩效，应对照这些具体要求，对我国预算周期各环节存在的突出问题抓紧纠正，特别是预算审核与预算执行重叠的问题，要予以重视及早解决。

4. 革新财政行为考量。财税改革还需注重对财政行为考量的革新，毕竟，对各级地方政府而言，实践上需要具体的考量指标体系，上一级政府对本级政府工作绩效的评价也需要具体的考量指标体系。各级政府应围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发展理念，积极革新财政行为考量指标体系，使我国财政的现代化之路持续进行下去。

（二）加强理论研究

1. 财政学科的定位。公共财政论下的财政学科是应用经济学分支之一，这与20世纪90年代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求相一致，但若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要求相比，这一学科定位就显得有些狭窄了。再加之国家分配论的研究传统，对财政学科的跨学科定位之争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不过，就规范的理论研究而言，财政学科要跨的学科有哪些、这些学科围绕财政的交叉点在哪、跨学科下的

财政理论框架是怎样的等问题都很空洞，需要下大力气展开研究，以丰富财政的跨学科理论内容。

2. 跨学科下财政本质、属性与职能的界定。相应地，跨学科视角下的财政本质、属性与职能等基本理论问题也应重新界定。若交叉其它学科对政府财政行为的认识，那财政本质是否还可概括为公共财政论、超出经济范畴的财政又该具有哪些属性，以及满足国家治理要求的财政用什么职能体系，来替代马斯格雷夫的三职能论，都需要我国财政理论界反复讨论、集思广益，从而为现代财政制度建设提供较为统一的认知基础。

3. 与国家分配理论、公共财政理论的衔接。巧合的是，若用现代财政引发的跨学科视角重新审视国家分配与公共财政之争，会发现两者间的联系大过相互的分歧，这也说明围绕现代财政展开的理论创新具有很强的融合性。这一理论创新过程不是要否定以往的财政理论，而是循着建国以来的现代化之路实现不同阶段财政理论间的继承与发展。尤其是对公共财政理论而言，它对理性个体的主体权利申张，对形成有限政府、责任政府、绩效政府和法治政府功不可没，并将继续在未来的财政现代化之路上发挥重要作用。

（三）多角度阐述财政现代性

现代财政是一个综合话题，要想说清楚，哲学意义上的现代性、管理意义上的现代化、历史意

义上的继承与创新以及经济意义上的绩效性等，都是需要讨论的，这也是现代财政一提出就会引起财政跨学科研究与西方经济学研究之争的原因之一。不过，若参考这种理解，就会发现这两年关于现代财政的研究视角较为单一，或者出现了用西方话语中的“现代财政”简单替换，从而导致我国财政实践活动的指导性有所削弱，这就使实践者和社会公众很难对现代财政有深刻认识。故建设现代财政制度，需要通过跨学科研究来对我国财政的“现代性”破题，以使2020年后基本建立的现代财政制度符合我国国情，发挥出国家治理基础和重要支柱的作用。

【参考文献】

- [1]马瑛.财政学研究的不同范式及其方法论基础[J].财贸经济, 2015,(7):15-28.
- [2]王庆.论现代财政与公共财政—兼述我国现代财政制度的构建[J].当代财经,2014,(10):25-35.
- [3]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统计[M].伍晓鹰,施发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 [4]岳军,王杰茹.公共治理、现代财政制度与法治财政[J].当代财经,2015,(11):25-32.
- [5]新华社.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EB/OL].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15-11/04/c_128392424.htm,2015-11-4.
- [6]龙佳解,蒋红群.论当代中国现代性的困境及其重建[J].求实,2011,(1):47-50.

The Difficulti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Financial System in China

Wang Qing

(Lan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Lanzhou 730020)

Abstract: Since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8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propose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modern financial system",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onfirms the accuracy of the strategic judgment, and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strengthening the organization of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especiall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rough the financial modernization. However, if we need to establish the modern financial system in 2020, there exist such difficulties as the different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the practical attitude between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 and the lack of financial assessment. Therefore, we shoul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financial system through deepening the finance and tax reform, strengthening theoretical research, explaining the financial modernity in many aspects and innovating the financial assessment.

Keywords: Modern Finance, Finance and Tax Reform, Inter Disciplinary Research

(收稿日期：2016-11-08 责任编辑：廖令鹏)

【创新策略】

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新驱动问题

张书莲，冉丽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系；
暨南大学网络与教育技术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000）

[摘要] 科技型中小企业是我国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力量，常常受到发展资金、市场环境、战略文化和创新激励等因素的制约。应建立科技型中小企业民间投融资交易平台，完善科技型中小企业一体化公共服务体系，同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绩效考核制度。以扶持科技型中小企业通过创新驱动不断做大做强，从而提升区域整体创新能力和水平，推动经济发展模式向创新驱动型转变。

[关键词] 科技型中小企业 创新驱动 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 F27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17)01-0069-04

[基金项目] 广东省普通高校创新人才类项目（2014WQNCX122）。

[作者简介] 张书莲（1974—），女，湖北钟祥人，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系，讲师，博士，研究方向：战略管理；冉丽（1979—），女，四川成都人，暨南大学网络与教育技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信息管理。

一、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驱动的主要影响因素

（一）发展资金因素

当前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外部融资来源主要有三个：政府资助、银行贷款和民间投资。政府资助主要是指来自于政府的科技资助基金或者补贴，如广州市政府所设立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引入投资补贴”以及“科技信贷贴息”等。政府资助资金一般来说成本最低，多数情况下属于无偿性质，只要符合规定的申报资格即可获得审批。资助的力度即资金的多少主要根据企业自身的情况按比例计算，如广州市科技型中小企业“引入投资补贴”就是按

照投资企业单轮融资引入投资金额（未撤资部分）的10%（最高不超过100万元）一次性发放补助；银行贷款主要是指各类商业银行机构的科技贷款，该类贷款通常情况下会有政府提供信贷担保或风险补偿，所以贷款条件和成本要优于一般性质贷款。如广州市设立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信贷风险资金池”，通过该机制分担银行风险为企业争取更高的贷款额度；民间投资是指投资主体非政府和银行的社会资金，是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取外部资金的又一重要来源，特别是对于那些难以获取政府资助或银行贷款的早期创业型中小企业，如天使投资和风险投资等。民间投资的特点是与被投资企业共担风险共享收益，获取该类投资的成本取决于双方达成的利益分享协议，而投资额的高低则要看投资人的意

愿和能力。

（二）市场环境因素

检验企业创新驱动发展成果的核心标准是产品在市场应用上的成功。因此科技型中小企业需要对自身所处的市场环境有一个动态、综合和具体的分析认知，以便采取相应对策克服困难获取成功。本文主要聚焦两个环境因素：市场需求和市场竞争。

一般来说，相对于大型成熟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在知名度、资金实力或营销能力等一个或多个领域处于弱势地位，这就增加了企业产品获得市场认知和接受的难度。科技型企业和技术能力方面具有优势，但研发的产品是否能够与市场需求密切贴合，以及如何到达消费者并满足消费者需求，则不仅是技术能力的问题，还需要有卓越的营销能力。企业的营销能力看做是产品创新成功的无形因素，这种能力包括市场启动计划和执行、充分的市场调研等（Cooper, 1999）。企业营销和研发部门之间的合作模式会对企业新产品开发产生影响，在开发的早期阶段营销和研发部门的合作程度最高（Olson等, 2001）。企业营销贯穿于新产品开发的整个过程中，从研发构想设计直至上市成功，以保障企业创新驱动与市场需求密切关联，最大化发挥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技术优势，减少创新失败的风险，这对于抗风险能力较低的中小企业尤其重要。

即使科技型中小企业在初期阶段拥有技术或产品优势，也会有被其他企业后发超越而丧失竞争优势的风险。特别是同行业内的大型知名企业，如果也致力于同类产品的开发，将会成为中小企业的直接竞争对手。竞争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驱动发展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使企业产生“不进则退”的危机感，始终致力于产品技术的研发与更新换代，而不是在原有的竞争优势上“坐吃山空”，从而保持可持续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资源实力与行业内大企业相比处于弱势，中小企业有可能会承受不住强大竞争对手的挤压，最后被兼并收购甚至直接挤出市场而破产。科技型中小企业在产品研发之初，就需要对拟进入市场的竞争状况有充分认识，包括市场竞争程度、竞争对手分布和竞争产品情况等，尽量开辟“蓝海”。此外，还需要关注政府是否有针对中小企业的相关优惠政策，例如资金扶持、税收优惠、进入壁垒等，尽量运用政策红利，加速企业自身的发展壮大。

（三）战略文化因素

如果将资金和市场归类为制约中小企业创新驱动发展的外部因素，那么战略和文化就属于影响创新驱动的企业内部因素。一个清晰的产品开发战略有助于计划、获取和管理充足的资源用于具体的产品开发（Cooper和Kleinschmidt, 1995）。要想在不断变化的市场中获取竞争优势就需要保持战略的灵活性（柔性），它体现了企业的一种动态能力，即灵活运用、重构和整合资源的能力（Teece等, 1997）。对于科技型中小企业来讲，制定明确的战略定位尤其是产品战略定位，可以最大化集中利用自身有限资源，去获取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中小企业由于组织规模小、组织结构简单和信息沟通便利等特点，通常能够更迅速完成资源重组和结构调整，充分发挥战略灵活性，以紧跟市场发展变化，使自己始终处于不败之地。

一个支持创新的文化氛围有助于提高员工创新积极性，促进企业创新驱动，从而建立可持续的竞争优势。这种创新文化氛围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团队合作；在奖励、风险以及失败处理方面的支持；鼓励员工提出新产品构想；为员工提供更多自由时间去开发他们自己的新产品构想；提供创业基金或种子基金用于内部项目（Cooper和Kleinschmidt, 1995）。对于科技型中小企业来讲，创新是其成长发展的关键动力，因此需要充分调动全员的创新积极性，建立一个以创新为核心价值之一的企业文化氛围。

（四）创新激励因素

对创新人才的激励是企业保持创新活力、留住创新人才的主要措施。一个最佳的创新激励机制体现的不仅是对创新成功的长期奖励，同时也要对早期的创新失败予以宽容（甚至是奖励）对待，长期的薪酬计划、工作保障和对绩效的及时反馈是创新激励必不可少的内容（Manso, 2011）。企业采取的激励制度也会影响其将操作经验转化为创新活动的的能力（Leiblein和Madsen, 2009）。不同激励方式所发挥的作用也有所不同，股权激励和薪酬福利激励的影响最明显，其次是培训、发展和环境激励，成就激励的影响最小（蔡树堂和吕自圆, 2015）。

科技型中小企业更需要通过建立完善有效的激励机制来保持自身的创新活力。激励机制的设计要体现合理可行的原则，而不能是一种表面文章。

激励的对象可以是人，也可以是项目。激励不仅要
对成功者进行奖励，还要容忍一定程度的失败。针
对不同层次的人才采取不同的激励措施，确保激励
资源最大化利用。政府等企业外部组织也可以参与
到企业的激励机制中，政府激励的时机可以更加灵
活，例如分为事前、事中、事后激励，尤其是要加
强事前和事中的支持，而不仅仅是取得成果后的政
府奖励。最后，要确保激励制度的有效贯彻和落
实，确保使企业和政府的激励能够真正投向需要激
励的人或项目，杜绝贪污舞弊事件的发生。

二、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驱动的对策建议

（一）建立科技型中小企业民间投融资交易平台

中国的投融资市场存在着供应方和需求方对接
渠道不畅通的障碍，一方面大量的民间闲置资金
缺乏直接的渠道投资实体经济，因而转向股市和
楼市；另一方面，大量的中小型企业缺乏融资渠
道和来源，企业发展遭遇困局。出现这种状况的
原因，虽然和资本追逐更快更高利益有关，但缺
乏一个公开、透明和信誉度高的投融资交易平
台也是其中很重要的影响因素。虽然股市也是一
种重要的投融资渠道，但有资格上市的公司基本
上都是发展到一定规模的企业，即使是创业板，
也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而处于创业初期或规
模较小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一般不具备上市资格。
银行贷款也是一种重要的融资渠道，但多数投向
国有企业或发展较好的大型民营企业，中小型企
业往往要具备一些较严格的条件才能获取贷款。
最近几年，互联网金融发展比较红火，但更多的
在于存款业务，贷款业务并不突出，贷款金额
也较小，且更倾向于消费贷款，对于企业经营
贷款支持力度不够。因此，中小型企业更需要
一个公开、透明和信誉度高的民间投融资交易
平台。关于平台的创建有这样几点构想：

1. 以网络平台为主要形式。当前我国互联网普
及率和用户规模都处于较高水平，电子商务发展
处于世界前列，国家积极提倡“互联网+”产业，
因此平台的建立应以互联网为技术基础，设立权
威的交易平台网站，资本的供应方和需求方可
以在这个平台上选择自己的投融资合作对象。

2. 政府和银行有监督和审查的责任。资本是一

种特殊的金融商品，为了防范金融诈骗，还需要
配套的规章制度来确保交易双方的利益，这需要
政府相关部门和企业所属银行发挥监督和审查作
用，没有政府和银行的后台支撑，网络平台这个
信息发布和商业洽谈的前台也不可能成功。因此，
政府或银行需要建立专门的对口部门来处理来
自于该网络交易平台的业务。

3. 创建网络平台应循序渐进。在建立初期，网
络平台只提供信息发布功能，投资方和融资方把
自己的信息发布在网上，而具体的洽谈和交易则
在线下进行。等到市场运作开始成熟时，再将洽
谈和签约等功能开放。最后开放的是转账功能，
由于企业投融资的资金规模一般较大，所以网
上转账功能要谨慎实行。

4. 交易网站的创立人问题。由谁建立网络平
台是首要解决的问题。政府是行政机关，银行是
金融机构，搭建企业要考虑市场盈利，多方合
作将更有利于推动该平台的建立。政府提供财
政补贴资助和政策支持，银行出资入股，搭建
企业负责网站设立、维护和运营，建立一个全
国甚至全球范围的交易平台。国内电商巨头如
阿里巴巴、腾讯等在电子商务平台建设方面经
验丰富，可以加强与此类企业之间的合作。

（二）完善科技型中小企业一体化公共服务体系

当前有些地方已经建立了中小企业服务体系，
但仍然存在形式主义，只是搭个网站架子或挂
个牌子，实际效果和作用并不明显。因此有必
要完善科技型中小企业政府服务体系，将针对
中小企业的各项优惠政策、服务措施、扶持项
目都集成在一个平台或中心上，提供一体化、
全方位与系统化的高质量公共服务。关于服务
体系的构建形式与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建议：

1. 建立网络终端综合服务平台，丰富信息
沟通方式，及时将相关政策信息传达，同时
也可以及时收集企业反馈意见与建议。除了
传统的文件下达方式之外，还可以充分利
用互联网工具，建立网络终端服务网站，
通过微信、邮件、APP等工具开展工作。
将与科技型中小企业相关的扶持政策、服
务项目、组织活动、企业培训等相关信
息都综合在该平台上，实现服务一条龙、
一站式、一体化三个“一”，改变职能分
散、各自为政的局面。

2. 强化各地区中小企业协会（发展促进会）的作用。各地中小企业协会（发展促进会）是半官方机构，应将创新驱动战略落在实处，建立创新驱动发展联络处，联合其他相关协会或服务机构（如产业园区、孵化器管理机构），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具体的服务项目支持。例如，定期组织举办科技型中小企业博览会、交易会；定期组织科技型中小企业培训或论坛；协助中小企业与科研机构、投资机构开展合作；建立相应的学习交流群或平台等。

3. 科技型中小企业应积极申请资助与奖励，参与服务体系平台与服务项目。企业应积极了解政府出台的方针政策，积极申请资助与奖励并参与相关服务项目。一方面可以切实享受到政府资金资助和优惠政策，解决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另一方面积极参与科技交流与培训，提高自身的管理水平。如果地区政府举办博览会或交易会，也应借政府东风积极参与、开拓市场。

（三）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绩效考核制度

绩效考核制度根据考核主体可分为两个类别：一类是针对地区政府的绩效考核，考察地区政府创新驱动发展相关政策和措施的实施效果如何；另一类是针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绩效考核，对考核优异的企业实施外部激励和内部激励。具体设想如下：

1. 地区政府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绩效考核制度。对于地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绩效考核实际上也是本地区政府业绩考核的一部分。由于创新驱动是一个长期可持续的发展过程，因此绩效考核不仅应包括短期效益指标（如产值、从业人数、企业数量等），还应包括长期效益指标（孵化器、产业园区、拉动行业等），其中长期效益指标需要反复研究调查后慎重决定和选择。同理，绩效考核也应当经济指标与社会指标并重，特别是社会指标的制定比较复杂，地区的科技创新水平、科技应用程度以及创新意识水平等如何测量，也是需要深入研究调查后才能科学确定。

2. 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绩效考核与激励制度。例如：对于高层管理人员的考核，应以公司战略发展指标为重点，采用期权和股权激励更为有效；对于中层管理人员，应以项目或部门完成指标为考核内容，股权激励和晋升激励为主要方式；而对于基层员工，应以薪酬、培训和环境激励为主，鼓励员工积极提出创新构想，真正塑造全员创新的企业文化氛围。

[参考文献] 略

Innovation – driven Problems of Hi–tech Small and Medium – sized Enterprises

Zhang Shulian, Ran Li

(1.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Guangdong Technical College of Water Resources & Electric Engineering; 2. Network and Educational Technology Center,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00)

Abstract: High–tech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for the innovation 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China.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it is often restricted by the influence factors such as development funds, market environment, strategic culture and innovation incentives. Therefore, we should establish the trading platform for private investment in high–tech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and perfect the public service system for them. We should also implement the system to assess the innovation driven development performance. High–tech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become bigger and stronger by innovation driven with the support of these measures, so as to enhance the overall innovation capability and level of the region, and to promot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 shifting to innovation driven.

Keywords: High–tech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 Innovation Driven, Influence Factors, Countermeasures

(收稿日期：2016-11-19 责任编辑：廖令鹏)

【创新策略】

自贸区管理创新：境外经验借鉴

李猛

(中山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 广东 广州 510275; 澳门科技大学法学院, 澳门 999078)

[摘要]中国自贸区管理制度创新已取得显著成效,但在管理模式、投资自由、贸易便利、金融开放、市场监管等方面与域外先进自贸区依然存在一定差距,应当汲取域外先进自贸区相关经验,进一步丰富中国自贸区管理制度内容,实现管理制度结构优化升级,解决管理制度创新中的主要现实难题。

[关键词] 中国自贸区 管理制度创新 政府职能转变 境外经验

[中图分类号] F127.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17)01-0073-04

[作者简介] 李猛(1985—),山东兖州人,中山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博士后流动站入站博士后,澳门科技大学国际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自贸区法律问题与其管理制度创新。

中国自贸区战略任务是实现对外经贸自由化,消除减少贸易壁垒,反对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然而,该目标的实现还需要具有与之相应的管理制度予以配合。过往在外资领域我国政府偏重事前监管,对外资市场准入有着非常严格的审批制度,从国家经济安全角度虽有必要,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外商投资中国的热情,同时过于复杂的审核手续也无形中成为阻碍国际经贸自由的壁垒,这与中国自贸区所具有的自由、开放、平等等内在属性不相适应。作为“试验田”的中国自贸区,还承担着以管理制度创新推进本国政府职能转变的历史重任,应进行有益管理制度创新,对外资准入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尝试放宽市场准入前监管,转为事中事后监督,政府职能逐步由“管理型”转变升级为“服务型”。

一、中国自贸区管理制度创新现状

(一) 国际贸易管理制度创新

1. “安全高效,区内自由”的海关监管模式。海关先后推出“先进区、后报关”、“批次进出、集中申报”、无纸通关附随单证、集中汇总征税等多项监管服务措施,大幅度提高了货物通关效率、缩短了货物通关时间、压缩了货物通关成本;检验检疫部门陆续制定实施无纸化报检、快速通检、第三方检验结果采信、“十检十放”分类监管、跨境电子商务备案等创新举措,高速便捷的通检模式为区内企业运营节省了大量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

2. 跨部门综合性服务平台。通过“单一窗口”贸易公司一次性递交相关交易信息和单证,利用统一平台、网页或地点进行申报,并对公司所递交的所有信息进行一次性处理。“单一窗口”不仅更有助于口岸不同部门间协调配合,减少行政运行成本,更有利于减少货物在关口的等待时间,降低贸易成本,提高通关效率。

3. 货物分类监管和保税改革。区内对保税货物、非保税货物、口岸货物分类进行管理,在提高通关速度的同时合理把控风险。同时,在关税方

面，先后推出“展示交易保税”、“融资租赁退税”、“内销选择性征税”等优惠措施。

（二）国际投资管理制度创新

1. 外资进入负面清单制度。通过负面清单制度对不符合国民待遇原则的市场准入特别管理措施公开加以列明，凡不在负面清单以内的投资领域均可享有与本国国内企业相同的市场准入待遇。

2. 国际投资备案管理。一方面，政府对于负面清单之外的外商投资由行政审批改为备案管理，政府由市场管理者逐步转为市场监督者、服务者。另一方面，为支持鼓励区内企业向外投资，在投资项目审核环节同样采用备案管理，对于3亿美元以下的投资项目一律进行备案且可不再递交可行性研究报告，由自贸区管委会统一进行“一口受理”，一般5个工作日以内便可拿到项目许可证书。

3. 商事注册登记认缴制。改革商事登记制度，将注册资金由实缴制改为认缴制、由先证后照改为先照后证、推行简易注销程序、落实年度报告公示制度，一系列创新举措相互联系、相互配合使得外资区内注册越加高效便利。

（三）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创新

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完善信用信息记录、公开、共享、披露制度以及社会信用奖惩机制，营造良好的社会诚信氛围；建设监管信息共享服务平台，联动各部门间协作管理，为事中事后监管提供资讯支持；构建综合执法体系，促成各管理部门协调合作与联动执法，有力提升行政执法效率；实行企业经营异常名录制度，对不诚信企业进行曝光和惩戒，营造良好社会企业自律环境；完善国家安全审查和反垄断审查机制，通过国家安全审理与市场反垄断调查降低市场化改革风险，保障国家利益与安全。

（四）文化产业管理制度创新

放宽文化产业经营许可范围，实行文化产业负面清单制度，制定颁布了相应的实施细则，为自贸区内的文化产业经营与文化信息交流提供了相应的法制保障；简化文化活动审批流程；提供知识产权法治保障，设立文化创意法律服务平台、知识产权调解中心、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知识产权法庭、知识产权仲裁院（自贸区分院）等多种知识产权争端解决机构，对包含文化产业在内的各类知识产权纠纷提供高效、经济、便捷的多元化争端解决

服务。

二、境外先进自贸区管理制度经验

（一）香港自由贸易港

1. 外资市场准入制度宽松。外资注册程序便利，注册登记仅需三个步骤，网上递交申请一般一小时内回复结果，纸质申请一般四个工作日内给予官方回复；外资注册条件宽松，有特殊限制仅需缴纳很少的厘印税，且无需验资，实际到位资金数额也不设限定；外资管理市场化，除传统法律制度“硬约束”外，香港自由贸易港还会通过同业公会或商会等民间团体进行行业自律管理；市场准入度较高，几乎不存在绝对禁止从事的行业领域，对外资股比没有进行绝对的限制，港内、港外投资者均可实现百分之百的公司控股。

2. 金融市场对外开放。投融资服务便利，资金汇兑和信息流通自由便捷；证券市场自由开放，外国公司或个人只需在港内开立证券账户即可随时交易，国际投资者可自由买卖在本港公开发行的债券，境外借款人也可利用本地债券市场为其进行融资。

3. 海关监管制度便利。报关制度便利，典型的“先入关，后报关”的便利海关管理模式，为一些进出口货物提供暂准进口服务，颁发暂准进口凭证；通关制度便利，通过电子途径提前递交副提单数据，省却传统印发纸质“禁止移离物品通知单”复杂现时程序。

（二）新加坡自贸区

1. “服务型”政府之典范。双层级自贸区管理模式，由本国中央政府和自贸区内特定公司企业管理，中央政府发挥指引规划作用，区内特定公司企业负责自贸区日常经营，是典型的双层级自贸区管理模式；专设国际商业法庭，是新加坡最高等级司法审判机关的一部分，其判决具有最高效力，可最大程度上保障判决结果得到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承认和认可。

2. 市场监管制度完善。新加坡自贸区对外自由开放的市场环境离不开本国较为完善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

3. 企业赋税制度优惠。实行统一企业所得税政策，采取17%的公司税率，区内所有公司企业均可

享有对其前30万元应税所得进行部分豁免的优惠待遇。

4. 金融管理制度宽松。金融业入市门槛不断降低，外资限制逐步开放，推出“特许银行业务牌照”，外资银行可在自贸区内增设分行和自动取款机，另外在自贸区内增发部分业务牌照并取消外资银行在本地持股不得超过40%的规定。

三、境外经验对中国自贸区管理制度创新的启示

（一）宜推行双层级管理模式

当前中国自贸区所在地政府管理权限过分充足，多数管理事权仍集中于自贸区所在地政府及其相关部门，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区内管理备案的办事效率，束缚了自贸区管委会参与本区管理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制度创新红利并未得到充分释放。自贸区管委会作为自贸区“一线”管理机构，对区内事务最为了解，过窄的立法与管理权限范围制约了其应有功能的发挥。如果自贸区管委会能够拥有充足的立法权与管理权，可自行拟定符合自贸区特性的行政审批备案流程，具体操作在其内部统一消化解决，而无需转递其他部门分别进行审核，无疑将会进步简化和加速自贸区行政审批备案，有利于“一口受理”、“单一窗口”等制度创新真正意义上的实现。

鉴于我国自贸区现处于建设初期阶段，自贸区所在地政府的居间协调作用仍必不可少，三层级管理模式依然是当前阶段的较佳选择。但随着自贸区建设的日益成熟，从自贸区战略长远发展视角分析，需要通过增进自贸区管委会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其对区内各项事务的管理效率，管理模式由三层级转变过渡为双层级是中国自贸区未来发展的总体趋势。

（二）推进通关制度便利化

与香港自由贸易港、新加坡自贸区相似，中国自贸区在货物通关方面同样采取了“先入区、后报关”、“分送集报、自行运输”、取消进出口配额限制等管理制度创新，但在通关效率、货物分类监管、港区联动等方面与香港自由贸易港、新加坡自贸区依然存在一定距离，仍需给予进步提升，在自贸区贸易服务体系建设和贸易促进政策等方面也还

具有继续完善和深入挖掘的广阔空间。

在货物通关方面，香港自由贸易港推行“海易通计划”，通过该计划能够以电子化方式简化现行海关清关程序。我国除上海自贸区于2015年6月实施“商品易归类服务”制度、搭建电子信息化平台、建立商品及编码大数据库外，其他自贸区至今还未有建立起较为完善的货物通关电子信息平台。因此，可借鉴香港自由贸易港与上海自贸区有益经验，除人工商品分类和验货通关外，逐步在各自自贸区建立起货物通关电子服务平台，推行网上货物分类、文件审核、通关备案等便利措施，在便利货物通关的同时加强对通关货物的监管备案。

（三）进一步宽松外资市场准入

在市场准入管理制度方面，香港自由贸易港与新加坡自贸对于外商投资不存在持股比例限制，与之比较中国自贸区依然具有进步放宽监管的空间和余地。例如“《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规定区内证券公司外资比例不得超过49%，单个境外投资者持有上市内资证券公司股份的比例不可超过20%，全部境外投资者持有上市内资证券公司股份的比例不可超过25%”。我国可借鉴境外经验在自贸区金融业改革发展过程中逐步降低外资比例限制，吸引更多外商在中国自贸区内进行投资贸易。

在市场准入领域范围方面，香港自由贸易港与新加坡自贸区除关乎国家利益的特殊行业外几乎不做任何限制。中国自贸区负面清单经过两次修改其限制性管理措施现已减为122条，但过多的兜底性条款和“等”字的表述影响到负面清单的透明度与开放度，中国自贸区负面清单整体上依然较为冗长尚有进步简化的余地，自贸区市场准入领域也具备继续拓展开放的空间，并且在负面清单条文透明度与外资市场准入分类标准国际化等方面更需要及时给予完善。

在事中事后监管制度方面，上海自贸区于2016年正式发布《进一步深化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浦东新区事中事后监管体系建设总体方案》，其内容包括建立安全审查机制、反垄断审查机制、完善市场退出机制等八个方面。然而，该《方案》仅是做出方向性指引，内容上多是概括性表述，因此需要将《方案》进行逐步细化和具体化，并依照方案制定出台相应法律法规，从而保障《方案》在现实中的实施应用，以便通过建立完备

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合理规范区内市场竞争行为，创设更为良好的区内市场竞争环境。

(四) 试行赋税制度改革

企业赋税制度方面，中国自贸区内公司企业在离岸业务中仍需缴纳25%的企业所得税，该比例远高于同期香港自由贸易港的16%与新加坡自贸区的17%，并且不同于香港自由贸易港、新加坡自贸区对区内企业所得税采取统一税率的办法，中国自贸区内企业所得税至今依然是内外有别、有所分割。另外，在关税方面新加坡自贸区几乎对所有进出口商品免征关税，而中国自贸区对进出口货物并无明显关税优惠。虽说财税政策优惠并非自贸区创设的初衷，制度创新本身既是红利，然而基于自贸区的“试验特性”，其实可在自贸区内进行更多尝试，包括精简税务机构、给予区内企业适当税收优惠或特定范围内进行税收减免，区分离岸与在岸业务税率等等，借此提升中国自贸区的国际市场吸引力和竞争力，使中国自贸区真正成为全国税制改革的“探路者”和“先行者”，充分发挥中国自贸区在国家税制改革中的引领示范作用。

(五) 开放区内金融市场

中国自贸区在金融自由化和市场开放度等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尚有一定距离，由于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仍然受到严格管制，中国自贸区在人民币跨境使用、融资便利、汇兑自由、利率放开、外汇管制等方面仍有深化改革的空间，自贸区内金融市场

也需要扩大对外开放，在不断推动自贸区金融制度改革的同时更要做好区内金融监管和市场风险防范工作。

新加坡于2015年设立国际商业法庭，新加坡自贸区涉外商事案件审理更加专业、独立、公正、高效，不仅有利于营造良好的法治营商环境，更能有效增强本国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和自身的国际市场竞争能力，这对于中国自贸区涉外商事案件的审判以及本国司法改革均具有一定启示意义。尤其中国自贸区重点试行金融管理制度创新，区内国际金融案件日益增多，其中多数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复杂性，迫切需要更为专业、独立的审判机构审理此类案件。

[参考文献]

- [1]陆军荣,石建勋.海关特殊监管区的国际比较研究[J].经济纵横, 2008(9).
- [2]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课题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与中国香港、新加坡自由港政策比较及借鉴研究[J].科学发展, 2014(9).
- [3]张娟,刘钻石.上海自贸试验区的企业“走出去”平台分析[J].国际市场, 2014(4).
- [4]朱干宇.香港金融监管架构图[J].农村金融研究, 2009(5).
- [5]孙力舟.自由港政策 - 香港成功的重要秘诀[J].决策探索, 2013(23).
- [6]孟繁盛.新加坡“竞争法”过渡制度研究[J].黑龙江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10(5).
- [7]李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机构职能转变与创新[J].上海经济研究, 2015(5).

Learn from Overseas Experience for China's FTZ Management System Innovation

Li Meng

(FTZ Research Institute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Law School of Mac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cao 999078)

Abstract: Through the management system innovation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 agency's function, guarantee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decentralization policy" and administrative examination system reform. Although China FTZ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in the aspect of management system innovation, in the management mode, investment freedom, trade facilitation, financial openness, market supervision and other aspects still existed a certain gap with the foreign advanced FTZ, we should learn from the useful experience of foreign advanced FTZ to rich China FTZ management system content, optimize and upgrade China FTZ management system structure, resolve the major practical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China FTZ management system innovation.

Key words: China FTZ, Management System Innovati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Overseas Experience

(收稿日期：2016-12-21 责任编辑：垠喜)

【产业政策】

为什么需要产业政策

张 猛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济管理学院，广东 深圳 518055〕

[摘要] 实施明智的产业政策是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也是广泛使用的经济发展工具。发达的市场机制是经济稳定增长的基础条件，有效的产业政策似乎更有利于跳跃式增长。过去30多年的经济全球化为国际垄断资本提供了舞台，跨国公司掌控着全球价值链，适当的产业政策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保持和提升经济的自主性。因此，争论的重点不应是产业政策的存废，而是应当深入研究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实施明智有效的产业政策。

[关键词] 产业政策 新自由主义 特朗普 大纠正

[中图分类号] F062.9 F09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 (2017) 01-0077-03

[作者简介] 张猛（1976—），吉林松原人，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济管理学院助理教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发展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

林毅夫与张维迎两位教授就产业政策是应当发扬还是应该废除的争论引起了广泛关注。从历史角度看，有关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争论在经济思想史中似乎早有结论，但在现实中，无论是从历史与现实，理论和实践的角度看，似乎早已有之的结论并没有终结这一讨论所包含的深刻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究其原因，可能正如霍奇逊所说的经济学在忘记历史^①。在英国脱欧、美国大选表现出社会巨大分歧的历史背景下，主流经济思想正在面临着一轮“大纠正”，这是有关产业政策是否有必要的争论引起关注的新因素。

一、产业政策是推动经济发展的经验性命题

产业政策在历史上曾扮演了重要角色。从英国亨利七世限制羊毛出口，摧毁了低地国家的毛纺织

业，催生了英国现代工业开始，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配合成为国家富强的秘诀^②。英式自由贸易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禁止殖民地建立与英国竞争的工业产业。孟加拉的国家博物馆里还收藏着当地织工的手指，它们被殖民者残忍地砍下来，以恐怖主义手段阻止殖民地发展自己的工业，强迫殖民地不偏离有利于英国利益的“自由”贸易。而美国的独立正是由于迫切希望摆脱英国的束缚。

关于自由市场和产业政策的辩论早在英国殖民时期就已经深入开展了，德国历史学派先驱政治经济学家李斯特曾指责亚当·斯密虚伪，号召德国要实

[美] 杰弗里·M·霍奇逊. 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M]. 高伟 等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林毅夫教授把贸易政策作为产业政策的一部分，广义上也是合理的。林毅夫对产业政策的定义是“凡是中央或地方政府为促进某种产业在该国或该地发展而有意识地采取的政策措施就是产业政策，包括关税和贸易保护政策，税收优惠，土地、信贷等补贴，工业园、出口加工区，R&D中的科研补助，经营特许权，政府采购，强制规定等”。见产业政策思辨会，URL: <http://www.nsd.pku.edu.cn/home/activity-notice/2016/1107/27608.html> (2016-11-09/2016-11-23)

现内部统一，实施贸易保护，并发展自己的工业。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建议殖民地国家应该专注于原材料出口的“自由贸易”，而他在同一著作的另外一处又指出只有拥有制造业的国家才能胜出^①。实施与《国富论》倡导的自由贸易政策相反政策的国家多数取得了长足进步，最耀眼的是德国、美国、日本。这些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运用市场保护的产业政策培育了本国企业，增强了竞争力。美国在建设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铁路期间，英国的钢铁价格十分便宜，美国没有依照自由贸易理论去购买英国的钢铁，而是通过巨大需求带动国内产业，美国钢铁产量很快就成为世界第一，因为规模而创造了成本优势。美国建国200多年，市场保护的历史长达100多年，只有在美国企业取得绝对竞争力之后美国才开放了市场。

英国人和美国人都明白：自由市场对强者有利，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在英国统治世界的时期，没有任何一个殖民地国家通过遵循自由贸易的规则成为强国；在美国称霸全球的时代，也没有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通过全面自由贸易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历史的经验表明，明智的产业政策有利于推动保护本国弱势产业的成长，有利于后起国家实现经济增长的转轨，这对新兴经济体走向成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产业政策依然是发达国家当前经济发展的工具

很多经济学者不愿意相信，产业政策至今在发达国家也依然盛行，产业政策的形式发生了一些改变，产业政策的性质和实施目标并没有变化，设计得都更为精致和严密了。比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对Google搜索引擎算法研究的资助；苹果公司创业得到过美国政府所属的小企业投资公司资助。美国企业在计算机、电子、宇航、医药产业等领域所具有的令竞争者难望项背的超强优势，与美国各级政府长期持续有计划的支持和资助是分不开的。奥巴马政府推出的“人类脑电图计划”、“肿瘤登月计划2020”，将进一步强化美国在人工智能、攻克癌症以及精确医学方面的综合优势和主导地位。

众所周知，欧盟脱胎于欧洲煤钢共同体，这是世界上最成功的产业政策组织。针对煤炭和钢铁

实施的产业政策成为战后欧洲最终实现再崛起的经济基础。为了与美国竞争，欧盟各国合纵连横，政府牵头组织数个欧洲国家的公司联合组建空中客车公司及庞大的生产体系，打破了美国凭借波音公司构成的全球大型客机的垄断。此外，欧盟对农业有巨额补贴，对美国倡导的转基因农业进行抵制，是欧盟保护农业及相关产业重要的产业政策。为了扭转欧盟经济体内各国信息技术产业持续落后于美国，甚至是日本和中国，市场被苹果、脸书、谷歌、亚马逊等美国企业垄断的不利状况，欧盟委员会于2015年制定了关于统一数字市场的方案。方案规定，欧盟28个成员国将形成统一的数字商品、资本、内容和服务市场。其中，建立统一的欧洲数字市场，将为欧洲公司挑战谷歌和脸书等美国企业提供重要的制度性保护^②。

巧妙、灵活的产业政策也广泛存在于其他发达经济体。新西兰是世界上公认的最自由的经济体之一，但对核心战略产业、农牧业则实施强力的管制性保护。猕猴桃出口由佳沛（Zespri）垄断，乳业则由恒天然（Fonterra）垄断。事实上，恒天然本身就是新西兰政府实施保护策略的产物。当年，新西兰断然拒绝了瑞士雀巢在新西兰收购乳制品的要求，而后发起了建立本国的奶农合作企业恒天然。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对具有战略意义的矿业与能源产业实施严格的国家管制，至今都未有过放松。

三、产业政策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健康的经济增长一般来说有两种态势，一种是稳定增长，一种是跳跃式增长。稳定增长来自资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数量的增长和劳动熟练程度上升。在产业结构不变条件下，受制于资本回报率递减等因素，经济总量不会出现突破性跳跃式发展。明智有效的产业政策，有利于资源从低产出和低收益部门流向更高产出和收益的部门，通过产业结构转换和产业结构升级实现跳跃性增长。蛙跳与稳定增长交替推动是后起国家实现追赶的一般性策

[美]戴维·兰德斯. 国富国穷. 门洪华. 新华出版社. 2010. P331; 赖纳特. 富国为什么富穷国为什么穷. 杨虎涛等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P19
见商务部. 欧盟公布统一数字市场战略[N]. 中国商务部网站 URL: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m/201505/20150500972234.shtml> (2015-05-14/2016-11-25)

略。世界经济发展史的成功案例也一再表明，创新不仅取决于勇往直前的企业家精神，也取决于对真正甘冒和承担风险企业家提供支持和保护的政府。有效的明智的产业政策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条件下，降低企业的创新风险或是提高企业的创新收益。政府不断提升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水平，加大基础科学投入是重要的，减少创新企业的时间空间上的不确定性成本，提供更加充分的信息可能更加重要。否则，企业宁可等死，也不会去甘冒风险地去找死。因此，产业政策一旦成功能够带来长久的外部性利益，因此政府乐于实施产业政策，即便产业政策并不保证一定会成功^①。

发达国家的产业政策所追求的是取得竞争优势。不仅美国追求的核心产业的强势领先；西欧和日本也长期致力于成为和保持一些行业的领导者，没有听说它们在利用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韩国在冲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实施重点产业政策，在国际市场上与日本企业比综合性价比优势，也没听说韩国在泡菜、稻米、海鱼方面寻求比较优势的指引；欧洲中部的瑞士处于高纬度山区，其著名的企业雀巢却因运营热带农产品食品（如咖啡）而享誉世界，可见发达国家的经济成功并非一般性地建立在比较优势上的，而是建立在竞争优势上。与产业政策相匹配的是发达国家的贸易和投资政策，其保护手段非常复杂和精密，在强化自身竞争力的同时还要打击对手。中国遭受的数量巨大的反倾销调查，足以证明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目标明确、手段隐蔽、措施精准、效果显著，而投资保护更是如此，中国在发达国家投资遭遇的不公正对待，要比在贸易领域遭受的不公正对待更显常态。

这一切事实经历告诉我们，发达国家指导我们的理论，自己是不用的。

简言之，很多经济学家批评政府之手，是因为在配置资源方面政府之手与市场之手常常存在摩擦，但政府之手的作用不仅仅是配置资源，还在垫高弱势产业、保护本国经济和打破市场低水平均衡方面发挥着市场之手无法代替的重要作用。客观地说，经济发展既需要市场之手，也需要政府之手。

既然产业政策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为什么有如此多的中国经济学家会视而不见？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与古典经济学不同，现代主流经济学最初的理论并不是起源于对客观经济现象的观察并加以抽象提炼出来的，而是在二战后一些天才的经济学家依靠无以伦比的想象力和理想主义创造精神创造出来的，其中，数理假设与经济假设并用得到严谨的逻辑解，再返回现实寻找代理变量来寻求实证检验，这样一个标准的研究方法存在着内生矛盾，引发的是证实与证伪过程中的逻辑错误。原因在于实证研究中的代理变量并不符合纯而又纯的数学与经济学双重假设要求，要用不纯的现实去证明现实中并不存在的纯粹假设。

[参考文献]

- [1][美] 阿纳托莱·卡列茨基. 资本主义4.0:一种新经济的诞生 [M]. 胡晓姣, 杨欣, 贾西贝. 中信出版社, 2011.
- [2][挪威] 埃里克·S·赖纳特. 富国为什么富 穷国为什么穷 [M]. 杨虎涛 陈国涛 等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 [3][英/韩] 张夏准. 富国的伪善: 自由贸易的迷思与资本主义秘史. 严荣.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Martin Wolf. A much-maligned engine of innovation[J]. Financial Times. URL: [http://serve.3ezy.com/www.ft.com/cms/s/2/32ba9b92-efd4-11e2-a237-00144feabdc0.html\(2013-8-4/2016-11-16\)](http://serve.3ezy.com/www.ft.com/cms/s/2/32ba9b92-efd4-11e2-a237-00144feabdc0.html(2013-8-4/2016-11-16))

Why Industrial Policies Are Needed

Zhang Meng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henzhen Graduate School, Guangdong Shenzhen 518055)

Abstract: Sensible industrial policies are not only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developed countries, but also current tools widely used in developed countries. Market mechanism improves linear growth and industrial policies more efficiently promote the leaping growth, facilitating to achieve first-mover advantage, maintaining competitive advantages. As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sinc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dominate the global value chain and world market, without appropriate industrial policies and market protection, it is difficult to maintain economic independence. How to learn the experience and untold knowledge owned by developed countries should be the next focu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Key words: Industrial policy, Neo-liberalism, Trump, Great Correction

(收稿日期: 2016-11-29 责任编辑: 垠喜)

【产业政策】

优化服务外包产业的税收政策

黄娟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重庆 401120)

[摘要] 在我国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驱动下, 服务外包行业发展迅猛, “营改增”后, 服务外包产业税收优惠政策持续发挥效力。本文以南京市的服务外包产业发展为例, 探究现行服务外包业税收政策、税收优惠实施的落地效果, 同时分析服务外包业的发展现状, 指出产业升级面临的困难, 提出改进相关税收优惠政策的方向和路径, 以进一步完善支撑服务外包行业运行的政策环境与财税体系。

[关键词] 营改增 服务外包行业 税收优惠 产业升级

[中图分类号] F30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17)01-0080-04

[基金项目] 高职院校预算绩效管理研究(编号: GZY201509-ZJ)。

[作者简介] 黄娟(1981—), 女, 重庆人,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 财务会计、税法。

为适应我国经济新常态发展, 近期国务院发文, 将服务外包产业上升为国家战略, 服务外包行业将成为我国参与国际贸易、产业分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服务外包产业的快速发展与政府扶持政策密不可分, 税收政策的引导作用尤为重要。

一、服务外包税收优惠政策及实施效应分析

(一) 营改增后对服务外包业的增值税扶持

自2010年7月起, 国家对21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的企业, 从事离岸服务外包业务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营改增”试点开始后, 有关营业税的优惠政策又被平移到了增值税政策中。2016年营改增全面实施后, 财税[2016]36号文件中规定了服务外包行业的零税率服务项目, 包括离岸服务外包业务、信息系统服务等, 这一政策降低了服务贸易的成本, 提升了国际竞争力, 实现了与国际通行税制的接

轨, 增强了中国企业参与全球资源配置的能力。

(二) 对服务外包产业的所得税扶持政策

小型微利企业占我国企业比重在80%以上, 也是服务外包企业可享受的所得税优惠的主要形式。除了所得税政策外, 软件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优惠政策, 而南京市服务外包企业中, 从事信息技术外包的企业占70%以上, 其中多数企业具备软件企业资格。

对服务外包企业给予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所得税优惠主要是15%税率优惠, 而四次调整的主要内容是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认定条件的变化, 包括三个方面的调整内容: 一是对技术先进型服务业务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由70%降到50%; 二是离岸外包收入由不低于50%降至不低于35%; 三是取消了企业取得有关国际资质认证的要求。

(三) 现行服务外包产业税收优惠政策效应分析

从以上政策文件规定内容来看，国家对服务外包产业的政策扶持力度远较其他行业更为宽松，如政策享受条件不断放宽，管理层次下放市级，给予地方较大自主权等，这些对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如南京市外包企业2008年不足300户、外包执行额5.1亿美元，发展到2015年已近2000户、外包执行额130亿美元。但与服务外包产业规模日益壮大的现象不相称的是，2009年以来，与服务外包企业对接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所得税优惠数据却显得极为“羞涩”，税收优惠政策惠及面很低，其引导激励作用明显不足。

截至2014年底，南京市经认定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只有30户，仅占南京服务外包企业户数的1.64%。2014年度全市也仅有11户企业申报享受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所得税减免2195.63万元，另有8户企业申报其他优惠减免所得税1221.42万元。尤为“尴尬”的是：虽经南京市主管部门多方努力，2015年也仅有1户企业获得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认定。

从近年来南京市外包产业发展及税收优惠执行情况看，造成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优惠政策效应不显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 优惠政策门槛高。享受优惠的限定条件设计与我国外包企业发展的现状相去甚远，达到门槛的企业偏少。此前国家已将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认定条件中技术先进型服务收入占总收入比例从70%降低到50%，离岸外包业务收入比例降至35%。但从南京及苏州、无锡实际来看，服务外包企业离岸业务比重仅占25%，即使承接离岸外包业务也多为境内转包方式，承接一手单合同占比偏低。按市商务局2014年调查，全市离岸外包业务收入比例在35%以上的企业数占比不足5%。政策覆盖率低，实际执行效果不佳也就难以避免。

2. 政策有效期短，导向功能不明显。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所得税优惠，第一次试点政策执行期2.5年，第二次在示范城市执行期5年，第三次又延期5年。虽然按惯例，这一期限仍有可能延长，但短期优惠和政策的不确定性也影响了企业的积极性。印度发展软件外包初期，就对服务外包业务进行了5免5减半长达10年的税收优惠，随后通过特区政策再给予10年的税收优惠；以色列对其自由出口加工区的离岸外包活动甚至给予最长可达40年的免税待遇。印度、以色列服务外包产业发展领先全球，长期稳

定的税收政策扶持功不可没。

3. 优惠政策同斥性明显。按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2015年8月份的《中国服务外包企业国际竞争力调研分析》披露，我国服务外包的离岸业务主要集中在信息技术外包（ITO）领域；其中软件研发及外包业务为56.8%，信息技术研发服务外包业务为27%，二者占服务外包的离岸业务的83.8%。南京市外包企业中，ITO企业也在70%以上。此类企业多数都具备软件企业资格，可以申请享受软件企业“两免三减半”所得税优惠，部分企业还具备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可以享受15%税率优惠。相比较而言，门槛高且不确定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的招牌吸引力并不大。

4. 直接优惠方式受制于企业经营成果，降低了受惠面。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优惠税率属于直接优惠方式，是针对企业的经营结果的减免税。但部分已认定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尚处于创办初期，经营规模小，研发投入大，周期较长，企业亏损面较大。如南京市2010~2011年，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亏损面在50%以上。到2014年，亏损或因弥补亏损而未享受15%税率优惠的企业也达37%。

二、服务外包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国际经济的复苏缓慢，国内商务成本的不断攀升，服务外包产业的增速开始下滑，外包企业的发展面临着诸多问题与挑战。

（一）服务外包国际竞争日趋激烈

由于人工工资、房屋价格持续上升等因素，中国在成本上已经没有竞争优势，产业转移已经成为中国近几年无法回避的问题。5年间，中国的人工成本平均每年上升10%到15%，很多发包商已经转向马来西亚和泰国等东南亚国家选择服务外包企业，对国内的外包产业产生巨大的冲击。

（二）专业人才供给短缺

人才是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核心和关键要素，对整个产业的升级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纵观国内服务外包行业，真正具有高端研发、创新能力的人才比例并不高，特别是精通专业外包技术又精通多国语言的复合型人才更是奇缺。反观服务外包第一大国印度，在从业人员当中，研究生以上专业人才占50%以上。未来几年，人才缺口将成为服务外包发

展的挑战之一。

（三）多数服务外包企业利润率低

很多外包企业处于外包业务链的下端，缺少核心技术，话语权、议价权不够，利润低薄。据江苏省商务厅《2014江苏服务贸易发展研究报告》，江苏省大多数服务外包企业承担的业务是以分段软件开发、软硬件测试、数据录入等基础信息技术外包（ITO）为主，而从事大的系统解决方案和大型系统集成等高附加值的业务流程外包（BPO）和知识流程外包业务（KPO）比重偏小。而按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2015年8月份的《中国服务外包企业国际竞争力调研分析》问卷调查结果，60%的服务外包企业利润率在10%以下。

三、优化服务外包税收政策的若干建议

从我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现状、趋势，及前期税收优惠政策实施效应来看，现行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税收政策仍存在完善空间。在用好用足现有政策，发挥政策综合效应的同时，政策设计层面，应考虑进一步完善和改进相关税收优惠政策，针对问题，从扩大政策惠及面降低负担、提高研发能力增强核心竞争力、有利人才培养与引进等方面，有的放矢地提供税收政策扶持。

（一）完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扩大受惠面

1. 将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优惠纳入高新技术企业优惠范围，对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给予长期、稳定的15%低税率优惠。在现行《企业所得税法》框架下，新增长期行业优惠有立法局限，可行的办法是将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优惠纳入高新技术企业优惠范围。修改“高技术服务业”领域，将ITO、BPO、KPO三类外包服务范围并入高技术服务业领域。同时根据外包服务产业特点，设置相应的核心自主知识产权和研发费用标准等认定条件。

如此，一方面可以化解不断降低离岸比例仍不能有效提高外包企业受惠面的“尴尬”局面；另一方面可解决单方面扶持离岸外包而“忽略”在岸外包的不公正问题。同时，用“高技术服务”的高新优惠取代“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优惠”更体现了对“技术先进”的要求，促使服务外包产业向产业链高端延伸发展。

将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优惠纳入高新技术企业优惠范畴，不再强调离岸收入比例要求，可让更多外包企业享受低税率优惠。更重要的是，税收优惠扩大到在岸服务外包范畴，不仅有利于整合资源，降低潜在发包企业的成本；也有利于服务外包企业通过在岸外包业务，积累经验，提高技术成熟度；更有利于国内服务外包企业间形成相对合作的内部行业链。改变中国过去十几年外包行业分散严重局面，更快地促进大型承包商形成，增强企业承接大额合同的能力，增强与印度、拉美等大型外包供应商的国际竞争力。

2. 用所得减免方式延续对离岸外包业务的税收扶持。对符合条件的离岸外包业务所得，可以参照技术转让所得优惠方式进行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采用此种间接优惠的方式，将惠及所有离岸外包企业，和离岸外包业务增值税零税率优惠一并产生更可观的政策促进效应。

3. 打破现行的示范城市区域限制。《意见》已明确将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数量从21个有序增加到31个。此举虽有利于提高产业集中度、增强聚集效应和国际竞争力，但却对其他地区服务外包企业显失公平，既有悖于新所得税法公平原则，也不利于服务外包企业向劳动力成本较低的二、三线城市发展业务，降低成本。

4. 明确技术先进的相关要求，促进企业加强研发力度，增强国际竞争力与话语权。从南京近5年的数据来看，外包企业在研发投入方面呈逐年增长态势，但与高新企业和软件企业明确的研发投入要求相比，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缺少量化的研发指标。

（二）恢复对技术开发、技术服务等所得减免优惠政策

2008年施行的《企业所得税法》中，取消了原税法中对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技术承包等技术性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的规定，仅保留技术转让所得减免优惠政策。但按科技部《2013年全国技术市场统计分析》，我国2013年度7469.13亿元的技术合同成交额中，技术开发与技术服务作为技术交易的主要形式，签订合同数与金额均占全国80%以上。在继续对技术开发与技术服务交易实施增值税减免的基础上，再恢复对技术开发、技术服务等所得减免优惠政策，无疑将对技术外包市场带来强烈刺激作用。

（三）完善有利于促进外包企业人才培养与引进的优惠政策

人才是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核心和关键要素。但如前文所述，外包产业存在的人才问题是一方面人才缺乏，另一方面在人才培养上却明显投入不足。现行促进服务外包产业税收政策中，也缺少针对人才的扶持政策。建议一是参照国家鼓励软件企业发展的税收政策，对经认定的服务外包企业实际发生的职工培训费用，可按实际发生额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二是允许达到技术先进服务要求的服务外包企业按2.5%比例计提职工教育经费并在税前扣除。即在保底扣除2.5%比例基础上，对超出部分据实扣除。如此不仅可保证企业对高技能人才培养、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等经费需求，也会极大增强职工教育费用扣除政策对企业的吸引力。三是将目前高新企业的股权奖励个人所得税政策适用于外包企业。

（四）提升外包企业财务核算与税收政策应用水平

在放宽政策限制的同时，促进服务外包经济发展和政策落实，也需要各级主管部门进一步完善相关服务举措。要大力推进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认定工作。有针对性地做好服务外包相关税收政策宣传和引导工作。重点做好尚未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软件企业、重点软件企业等资质证书的各类软件开发、服务企业的政策辅导和宣传工作，提高服务外包税收优惠政策的影响力，引导这些企业积极申请

办理技术先进型企业，以扩大服务外包税收优惠政策的覆盖面。督促辅导外包企业完善财务核算水平，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职工培训费用税前扣除、固定资产加速折旧及研发人员股权激励等优惠政策应用水平。在有效降低外包成本和税负的同时，大力培养和吸引服务外包高端人才，提高核心技术，增强国际、国内竞争力。

[参考文献]

- [1]陈进.北京现代服务业研究[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9：3-10.
- [2]谭仲池.现代服务业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4-7.
- [3]汪应洛.服务外包概论[M].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
- [4]卢锋.服务外包的经济学分析：产品内分工视角[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 [5]肖全章.促进我国服务业发展的税收政策研究[J].经济问题，2011（6）：106-109.
- [6]安体富.刘翔.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税收政策研究：国际比较与借鉴[J].学习与实践，2011（2）：5-11.
- [7]刘清亮.营改增政策对第三方物流企业的影响及完善政策导向的思考与建议[J].交通财会，2013(8).
- [8]葛英伟，张楠%.营改增对哈尔滨市经济的影响及对策[J].对外经贸，2013(8).
- [9]黄洪.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对企业税负的影响[J].商业会计，2012(10).
- [10]陆琳.营改增政策对企业经济的影响[J].中国乡镇企业会计2013(8).
- [11]孙孟娟.营改增对服务业企业影响及应对策略研究[J].现代商贸工业，2013(18).

Optimize the Tax Policy of Service Outsourcing Industry

Huang Juan

(Chongqing Industry Polytechnic College, Chongqing 401120)

Abstract: In our country to speed up the drive to build an open economic system, the service outsourcing industry is developing rapidly, "replacing business tax with value-added tax(VAT)", preferential tax policy for the service outsourcing industry continues to play in Nanjing City, the development of service outsourcing industry as an example, the landing effect of service outsourcing industry, the implementation of tax preferential tax policy research at the same tim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service outsourcing industry analysis, pointed out the difficulties facing the industrial upgrading, the direction and path of improvement of preferential tax policies, to further improve the operation support service outsourcing industry policy environment and property tax system.

Keywords: Replacing Business Tax with Value-added Tax(VAT), Outsourcing Industry Tax Incentives, Industrial Upgrading

(收稿日期：2017-01-09 责任编辑：垠 喜)

【产业政策】

从三个维度看“德国制造”

李新华

(上海市现代管理研究中心, 上海 200052)

[摘要] “德国制造”之所以在全球市场保持强大竞争力, 职业教育、“隐形冠军”和工匠精神的支撑作用功不可没。当前我国制造业总体而言大而欠强, 在坚持制造业立国的同时, 要从加强创新能力建设, 加快职业教育优化升级和培育工匠精神三方面入手, 夯实做强中国制造业的根基。

[关键词] 职业教育 隐形冠军 工匠精神

[中图分类号] F26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17)01-0084-04

[作者简介] 李新华(1976—), 山东日照人, 上海市现代管理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研究方向: 产业政策、创业与创新。

一段时期以来, 人们经常指责德国过于依赖制造业, 没有跟上以互联网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的发展。但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 德国凭借强大的制造业实力在全球经济中表现抢眼, 让人不得不去探究长盛不衰的“德国制造”究竟是如何练就的。

一、“德国制造”的前世今生

在今天的世界市场上, “德国制造”的标签代表着品质和信誉, 然而谁能想到, 曾几何时, “德国制造”代表的是劣质而廉价的低档货。

历史上, 与大多数后发工业化国家一样, 德国也曾走过“山寨”之路。德国于19世纪30年代才开启工业革命序幕, 由于资源禀赋和内部市场狭小的制约, 其工业产品只能向海外市场寻求出路。当时, 世界市场几乎已被先行工业化的英法等国瓜分完毕, 急于走上强国之路的德国人, 只能以剽窃设计、山寨产品、伪造商标等手段仿造别国产品, 并依靠压低工人工资、延长工人工时造就的价格优

势, 通过廉价倾销冲击市场。

来自德国的粗制滥造的廉价乃至冒牌产品, 对英国等发达国家的市场造成巨大冲击。1887年4月, 英国政府对原先的《商标法》进行修改, 规定所有外国产品, 无论来自哪个国家, 如有可能与英国本土产品混淆, 在进入英国本土或其殖民地市场时必须贴上“made in……”的标记。表面上看, 英国《商标法》的修改貌似针对所有国家, 但实际上却是专门为德国量身定做。英国试图以这种带有羞辱意味的法律, 将当时劣质的德国货与优质的英国货区分开。“德国制造”这个最初带有耻辱意味的标签由此诞生。

不过, 英国《商标法》的修改并没有给“德国制造”造成太大冲击。在此之前, 德国“机构动力学之父”勒洛就曾在美国费城第六届世界博览会上, 批评德国产品价廉质劣, 在德国内外引发巨大震动。从那个时候起, 感受到莫大耻辱的德国工业界开始清醒: 占领市场不能靠产品的廉价, 而是要靠产品的质量。之后, 越来越多的德国企业把“用

质量去竞争”作为座右铭，通过对产品质量近乎严苛的追求，最终使“德国制造”的品质超越了“英国制造”。

二、“德国制造”的三个维度

在漫长而艰难的制造业立国之路上，“德国制造”从耻辱到骄傲的蜕变以及德国制造业强大实力的形成并非偶然，我们可以从职业教育、隐形冠军和工匠精神三个维度来观察。

1. 职业教育——“德国制造”的人才基石

“德国制造”的成功就离不开高水准的技术工人。作为一个资源较为贫乏的工业国家，德国政府认识到，本国制造业的发展必须依赖受过良好教育的技术工人，而这正有赖于德国发达的职业教育。

德国的职业教育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早在13世纪，德国手工业就已发展出50多种细分工种，建立起“师傅带学徒”的学徒制匠人培养模式。中世纪晚期，德国引入“学徒、熟练工、师傅”的匠人分级制度，并以成文条例的形式确定下，要求匠人须考取专业资格证或申请专利才可以从业。17、18世纪，德国进入手工业兴盛的资本主义萌芽时期，这个时候成为匠人要历经三个阶段：一是跟着师傅当学徒，二是满师后外出漫游，三是自行为师带徒弟。进入近现代，德国职业教育的最大特色就是“双轨制”职业教育的建立，即由学校和企业联合开展职业教育。其中学校为“一轨”，负责教授专业理论知识；企业为另“一轨”，负责安排学生到一线实习和培训。

在推广“双轨制”职业教育过程中，德国政府针对350多种职业制定毕业考核标准，以确保职业教育和技术人才培养的高质量。同时，技术工人在德国还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优厚的职业收入和广阔的职业上升空间。因而目前在德国，约有70%的青少年在中学毕业后会接受“双轨制”职业教育。正是这些高素质的技术工人把研发蓝图变成精美产品投放市场，助力“德国制造”在全球化的市场竞争中树立起无以伦比的品牌和信誉。

2. 隐形冠军——“德国制造”的竞争力基石

提到“德国制造”，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西门子、大众等全球知名大企业，但实际上，数量位居全球之冠的“隐形冠军”才是“德国制造”的真正

竞争力所处。

从1986年起，“隐形冠军之父”赫尔曼·西蒙就注意到：德国出口贸易乃至整体经济的强大竞争力，主要得益于中小公司，特别是一些在全球市场上处于领先地位却不太为公众所知的中小企业。他将这类中小企业称为“隐形冠军”，并制定出三条衡量标准：一是市场份额在全球市场排名前三，或在所在大洲排名第一；二是年营业收入不超过50亿美元；三是社会知名度较低。德国是名副其实的“隐形冠军”之国，据西蒙统计，全球目前有2734家“隐形冠军”，其中德国就有1307家，占总数的47%；位列第二的美国，只有366家。德国的这些“隐形冠军”都是所在产品领域的全球市场领导者。它们专注于某些狭小市场，对所从事的行业求深不求宽，从一个看似不太起眼的细分市场开始“深耕”，不断通过积累技术和产品优势，最终在全球范围内成为行业领跑者。

没有企业能够靠模仿而成为全球市场领导者。德国的“隐形冠军”之所以成为“德国制造”的竞争力基石，是因为它们都具有非凡的创新能力和各自领域不可或缺的核心技术拥有者，手中掌握着其他企业无法替代的“秘密武器”。在这个基础上，它们才能实施价值驱动型而非价格驱动型发展战略，通过占据产业价值链的顶端来避免价格战并保持长盛不衰的竞争力优势。加大研发投入是实现创新的开始，德国“隐形冠军”们的研发开支是普通工业企业的两倍之多。但更重要的是“隐形冠军”的研发产出，“隐形冠军”中每千名员工拥有的专利权数，是专利密集型大公司的五倍（31：6）。德国联邦专利商标局的年度统计显示，在专利申请量位居德国前50位的企业中，“隐形冠军”一直都占1/3的比例。

自1995年起，德国的“隐形冠军”以年均10%的速度成长，如今已是20年前的6倍多。20多年来，1300多家德国“隐形冠军”创造出超过150万个新工作岗位，就营业收入来说，这些“隐形冠军”中产生了约220位亿万（欧元）富翁。

3. 工匠精神——“德国制造”的文化基石

工匠精神意味着专注与敬业，意味着精益求精、精雕细琢，更意味着对标准与规则的尊重与恪守，对高品质产品的责任感与自豪感。工匠精神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找到，但像德国这样历经数百

年培育和积淀，将其内化为整体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一部分的却并不多见。

德国“工匠精神”的铸就，既有文化方面的传承，更有制度方面的保证。早在中世纪，由于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德国匠人将所从事的职业视为上帝授予自己的天职，做好这份营生不只是为了赚钱，更是对上帝最好的侍奉。在这种强烈宗教责任的感召下，他们对自己的职业怀有始终如一的热爱，甘愿奉献终生；对自己的产品有着止于至善的追求，追求品质的完美与极致。时移势易，工业化取代了小作坊，但“手艺人”的基本精神没有变。即便是在眼球经济、互联网思维等新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德国人依旧坚守着埋头苦干、专注踏实的工匠精神。

当然，如果只将德国“工匠精神”的形成和传承归于其民族文化有失偏颇，其中的制度因素同样不可忽视。一方面，德国通过行业自律和政府规制，营造“工匠精神”传承的内部小环境。德国制造业有行业自律的历史传统。中世纪的德国手工业匠人就已结成各种行会，并制定出一些规章制度确保本行业匠人“要对货物质量负责”，“要抱有不卖次货的雄心”。在行会看来，这是本行业匠人的道德义务、社会责任和职业荣誉所在。如今德国政府也在借助各种行业组织，建立起严谨的工业标准和质量认证体系，并通过监管和处罚严格的政府规制来确保标准的执行。另一方面，德国制定有严密的专利法、商标法、竞争法等法律，通过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营造“工匠精神”传承的外部大环境。一个市场上，如果生产假冒伪劣产品者得不到有效监管和惩罚，就会形成劣币淘汰良币的市场环境，行业从业者也就会丧失坚守“工匠精神”的热情与土壤。

三、“德国制造”带给中国的启示

近200年来，德国始终坚持以制造业为立国之本，凭借其严谨和坚持成就了享誉全球的“德国制造”。“德国制造”的成功，给中国的产业发展带来诸多启示。

1. 避免盲目跟风新概念，坚持以制造业为立国之本

在产业发展上，一根筋的德国人凭借对制造

业的专注与执着，避免了泡沫经济破灭后的经济衰退。2008年金融危机前，产业空心化趋势在欧美发达国家普遍显现，主要表现为：制造业向外转移，工业在GDP中的比重逐年下降，金融、房地产、服务业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逐年上升。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制造业在德国GDP中的比重的确要高得多，因而人们经常批评德国过于依赖制造业，认为这拖累了其向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体转变。但德国经济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却让这些批评统统闭嘴。脚踏实地以制造业立国的德国经济，不只在全球金融危机中维持强劲增长，其失业率也不到英国、西班牙等国家的一半。

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依然复杂严峻，中国经济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各地都在急于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在“贪新求洋”的心态下，一些地方开始瞧不上制造业尤其是传统制造业，认为其不具有吸引资本和市场青睐的概念魅力。尤其是在出口萎缩，制造业发展面临较大困难的情况下，以互联网概念为代表的虚拟经济更是异军突起，成为各地竞相发展的香饽饽。然而纵观中国产业发展的历程，各种时髦概念潮起潮落，各领风骚三两年，但在大潮退去之后，留下的往往是跟风失败者的累累尸骨。因此在产业发展上，我们应保持一份清醒与定性，不在浮躁的氛围中迷失方向，坚持制造业在经济中的核心和基础地位。

2. 从创新、人才和文化三方面着手，夯实做强中国制造业的根基

以“隐形冠军”为代表的德国制造企业的实力，不在于企业之大，而在于企业之强，而之所以强，就在于其拥有的创新能力、技术工人和工匠精神。随着发展形势的变化，中国制造业必定要超越最初的粗放式发展阶段，向更高层次的制造业发展阶段过渡，这三方面要素的培育必不可少。

一是通过创新能力建设，为中国制造业向产业价值链的上游乃至顶端发展，提供核心竞争力支撑。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要加快科技创新体系的构建，建立起贯通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的创新生态系统，着力培育一批具有核心技术竞争力的制造业企业和代表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趋势的新兴制造业。另一方面，要树立一个观念，那就是“没有落后的产业，只有落后的技术”。通过创新，运用高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使趋于衰

退的传统制造业逆向回归，创造出新的产业发展空间，是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尤其是对于传统制造业比重还很大的中国而言，在这方面仍有非常漫长的路要走。其实，德国的诸多“隐形冠军”也并非都从事所谓的高精尖行业，例如德国伍尔特公司自1945年成立以来就专注生产单一产品——螺丝，但它们依靠创新能力创造出属于自己独特技术、工艺和零部件，从而成为行业翘楚。

二是加快职业教育的优化升级，为做强中国制造业提供技术人才支撑。首先是做好技能人才培养专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要因应未来中国制造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的要求，有前瞻性地布局和发展相关技能专业的职业教育，构建起与中国制造业升级版相适应的技能人才培养专业结构。其次，是要做好技能人才培养模式的优化升级。吸收和借鉴德国等职业教育发达国家的先进模式和经验，建立和完善以企业为主体、职业院校为基础、校企合作为主要模式的技能人才培养模式。最后，要做好技能人才培养质量的优化升级。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要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构建起以“厚基础、精专业、强能力”为内涵的技能人才质量培养模式，建

立和健全技能人才的考核和认证体系。

三是大力提倡和培育工匠精神，为做强中国制造业提供文化支撑。在“德国制造”高品质表象的背后，有着深厚的内在文化基因，那就是今天我们大力提倡的工匠精神。不容否认，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也自有其工匠精神的传承，但时至今日我们又大声疾呼工匠精神的回归，从一个侧面说明工匠精神在中国存在和传承的土壤和环境出现了问题。我们要借鉴德国工匠精神培育和传承的经验，不单是从精神文化层面鼓励和提倡工匠精神，更要从制度层面入手，为坚守和传承工匠精神的匠人和企业提供保障。最重要的是通过市场监管法规的完善和严格执行，让工匠精神在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下发挥出其应有的文化价值和市场价值。

[参考文献]

- [1] 陈润.德国商业两百年:工匠精神永不磨灭[J].中国民商, 2016(7).
- [2] 葛树荣, 陈俊飞.德国制造业文化的启示[J].企业文明, 2011(8).
- [3] 赫尔曼·西蒙.隐形冠军:未来全球化的先锋[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

Made in Germany: Observing from Three Dimensions

Li Xinhua

(Modern Management Center, Shanghai 200052)

Abstract: dual-track system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hidden champion and craftsmanship spirit are keystones for “Made in Germany” turning into a pride of Germany and maintaining strong competitiveness in global market. Today,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in large scale but weak competitiveness. In order to become a competitive manufacturing country, China should develop innovation capacity, upgrade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and cultivate craftsmanship spirit.

Key words: Vocational Education, Hidden Champion, Craftsmanship Spirit

(收稿日期：2017-01-04 责任编辑：廖令鹏)

【开放论坛】

中俄“一带一盟”战略对接框架

杨文兰

(内蒙古财经大学,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00)

[摘要] 由中国倡导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与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 同为欧亚大陆的经济发展战略, 二者在战略利益上趋同, 在地域辐射空间上有重叠, 在经济合作内容上有交叉。两大战略对接应以互联互通及要素流动为基础, 以经贸发展与产能合作为着力点, 以项目合作与金融支持为手段, 以平台搭建与合理的制度安排为保障, 构建起“一带一盟”战略对接的框架体系, 这对深化欧亚各国经贸发展与产业合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一带一盟” 丝绸之路经济带 欧亚经济联盟 战略对接 框架体系

[中图分类号] F1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17)01-0088-03

[基金项目] 2016年度内蒙古财经大学“中蒙俄经贸合作与草原丝绸之路经济带构建协同创新中心”重点招标课题: “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战略对接框架下中俄产能合作问题研究(2016zmez03)及后期资助项目“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蒙俄跨境电商物流协作创新发展研究”(2016zmeh01); 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边疆民族地区开放发展与丝绸之路经济建设研究”(15XMZ082); 内蒙古与蒙俄产业对接保障问题研究(编号2016ZJD020); 2016年度内蒙古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社科研究基地专项课题(重点项目)。

[作者简介] 杨文兰(1969—), 女, 河北阜平人, 内蒙古财经大学“中蒙俄经贸合作与草原丝绸之路经济带构建协同创新中心”研究人员, 商务学院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 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俄蒙对外经济关系等。

2015年5月8号, 中俄两国首脑共同签署《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联合声明》, 使这一由俄罗斯智库—瓦尔代国际俱乐部力挺的学术主张从学术探讨层面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①。“一带一盟”战略对接作为一项国际间的战略合作, 不仅涉及到中俄间战略利益协调的问题、欧亚大陆战略融合的问题, 还涉及到沿线国家的利益诉求问题。

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以“五通”为内容, 构建了其政策框架, 而欧亚经济联盟是以关税同盟与

统一经济空间为基础, 实现经济联盟内部的资本、劳动力、商品和服务的自由流动。两大战略都立足于欧亚大陆, 强调经贸发展, 都涉及要素的自由流动。因此, 两大战略对接要本着“求同存异”原则, 从战略对接的基础出发, 探究两大战略对接的着力点及突破点。

瓦尔代国际俱乐部成立于2004年9月份, 由俄罗斯新闻社、外交与国际委员会、《莫斯科时报》等机构发起的组织, 是莫斯科为国际知名的俄问题专家和学者举办的专业聚会, 具有强烈的普京色彩。是俄罗斯精英阶层决策构思的重要窗口。

一、互联互通与要素流动： “一带一盟”战略对接的基础

欧亚大陆，特别是“中亚地区”，号称欧亚大陆经济发展的“凹陷带”或“塌陷区”，其东部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西部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重要的地缘优势及丰富的能源资源，成为众多国家竞争的主要目标。中国倡导的东西战略——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及俄罗斯主导的南北战略——欧亚经济联盟，东西战略与南北战略的交点恰恰就是中亚地区。两大战略对接通过“互联互通”，实现要素的充分流动，将形成战略对接的基础。

1. 互联互通。内涵包括两方面：一是互联。边境毗邻的国家存在“互联”的自然基础，这种互联是以毗邻国家间良好的政治关系为前提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框架下，我国与欧亚国家间的“互联”由概念上升到了内容；由毗邻国家扩展到了“相望国家”；由自然联系上升到经济融合。特别是这种“互联”已由单个国家的毗邻关系扩展到国家间发展战略的衔接。二是互通。我国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核心内容是“五通”，其中政策沟通是桥梁、设施联通是基础、贸易畅通是目的、货币流通是媒介、民心相通是保障。在“一带一盟”战略对接中“五通”将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2. 要素流动。要素是经济发展的基础，要素既有自然的禀赋，也有后天的积累。在“一带一盟”战略对接下，通过要素的自由流动，实现要素在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各国的畅通，充分发挥要素互补的作用，实现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各国在能源勘探、开采及加工、农业种植、纺织行业、钢铁、化工、机电产品生产等相关行业的合作与发展，共同促进各国在复杂国内国际环境下经济恢复与发展。

二、经贸发展与产能合作： “一带一盟”战略对接的着力点

在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背景下，中国的战略选择是“走出去”，在此过程中，一方面是通过“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另一方面通过“走出去”战略实施，实现对外产能合作。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框

架下，加强成员国间的经贸发展与产能合作，也必将成为两大战略对接的着力点

1. 经贸发展。中国与欧亚各国要素禀赋不同，经济结构互补，有贸易发展的基础和条件。特别是近年来，伴随着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中国不断密切与欧亚各国的经贸关系。中国连续5年为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俄罗斯连续多年也位列我国前十大贸易伙伴行列（2015年除外）；中国是哈萨克斯坦最大的贸易伙伴；是白俄罗斯在亚洲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

2. 产能合作。欧亚联盟成员国大都能能源资源丰富，但产业发展相对落后，特别是在装备制造、轻纺工业发展方面严重滞后，与中国产业形成了互补。因此，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中，将产能合作作为对接的着力点，完全符合相关国家的利益诉求。目前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各成员国间的产能合作成效显著。

三、项目合作与金融支持： “一带一盟”战略对接的手段

“一带一盟”战略对接从理论上已获得了相关国家的认可，但如何对接，目前仍然处于不断探索阶段。基于中国与欧亚联盟各国要素禀赋不同、产业结构互补、产能错位发展的客观事实，本文认为“一带一盟”战略对接应以“项目”合作为突破，以金融支持为后盾，使其成为“一带一盟”战略对接的强有力的手段，不断促进与深化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国家间的合作。

在“一带一路”战略倡议下，中国与包括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在内的沿线国家在项目合作方面不断突破，在深化双边与多边合作关系的同时，也为“一带一盟”战略对接奠定了基础。

战略对接、项目突破、产能合作都离不开中国雄厚的资金支持，在“一带一盟”战略对接中，除了中国超过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外，还有丝路基金与亚投行的资金支持，成为“一带一盟”战略对接的坚强后盾。丝路基金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将成为利用我国资金实力直接支持“一带一盟”建设的有力推手。

四、平台搭建与制度安排： “一带一盟”战略对接的保障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战略对接，涉及欧亚大陆众多国家，各国利益诉求存在差异，因此，建立利益协调平台，形成有效的交流机制尤为必要。

（一）搭建合作平台

上合组织的成员都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及欧亚经济联盟的主要成员国，其发展宗旨与两大战略不谋而合。除此之外，“一带一盟”战略还应搭建以下平台，第一，学者间对话平台，比如定期举办高峰论坛。第二，综合交流平台，包括政府、企业及学者间的交流平台，充实并深化对接内容。第三，融资平台，“一带一盟”战略对接仅依靠丝路基金及亚投行资金远远不够，基于此，应将所有国家的私人资金吸纳进来为沿线国家提供融资。

（二）制度安排

“一带一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涉及众多国家，其经济发展层次不同，相互关系各异，利益诉求互不相同，两大战略对接不可避免地会面临许多问题及挑战，为此，相关国家应以创新的制度安排来规避战略对接所带来的问题与风险。

第一，建立中俄两国作为主导国的交流机制。中国是丝绸之路的倡议国，俄罗斯是欧亚经济联盟的主导国。中俄作为战略对接中两个最大的国家，其

地位不言而喻。在战略对接中，中俄关系的发展可以说左右着战略对接的走向。因此，中俄两国应建立双边国家间的交流机制，发挥两国的引领作用。

第二，确立“风险分担、利益共享”原则。战略对接将欧亚大陆国家连接成了一个整体，特别是在互联互通、项目推进及产能合作方面，要分担和共享，这也是我国“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原则。

第三，形成开放、包容及均衡的发展理念。将“一带一路”战略发展理念移植到“一带一盟”战略对接中，打破欧亚大陆固有的有形藩篱，畅通欧亚各国无形的思想藩篱。以创新合作模式，让和谐、友谊、包容的发展理念在欧亚大陆生根发芽。

总之，“一带一盟”战略对接是一项系统的工程，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一带一盟”战略对接应以经济协调发展为核心，以互联互通为基础，促进要素充分流动、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以产能合作为抓手，以项目对接为突破，实现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通过搭建合作平台，提供金融服务，形成有效机制来协调欧亚各国关系，以促进欧亚各国经济迅速发展。

[参考文献]

- [1] 胡键.“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与欧亚大陆秩序的重塑[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5年第(4).
- [2] 郭朝先,邓雪莹,皮思明.“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的现状、问题与对策[J].中国发展观察,2016(6).
- [3] 于津平,顾威.“一带一路”建设的利益、风险与策略[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1).

Connected Framework of China and Russia under “One Belt one League” Strategy

Yang Wenlan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Inner Mongolia Hohhot 010000)

Abstract: The Chinese economic zone Silk Road Strategy advocated by China and the Russian-led Economic Union both ar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the Eurasian continent, actually they have many similarities in many aspects, for there being convergence in the strategic interests, overlap in the geographical radiation, and cross with the content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Therefore, the two strategies docking should regard the factor mobility and interoperability as the basis,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and capacity development as the focal point, the project cooperation and financial support as a means, building a platform with a reasonabl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for the protection, then constructing the framework system of the strategic docking of the “one belt and one league”, which will have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deepen the economic and trade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cooperation between Europe and Asia.

Key Words: “One Belt One Leagu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Strategic docking, Framework System

(收稿日期:2016-11-03 责任编辑:垠喜)

【开放论坛】

近20年中国经济增长轨迹分析

——兼论相对低速增长长期经济稳定的双重条件

朱小平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 上海 200060)

[摘要] 本文对近2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广义货币量M2及固定资产投资、房屋建设投资等项指标的相互关系,作了模拟性趋势分析,说明M2总量与社会总负债密切相关。由数据模拟分析,近20年,由固定资产投资、房屋建设投资共同推动的增长可分为四个阶段。相对低速的经济增长长期宏观债务稳定性需有双重条件,即中国经济在相对低速增长长期若是稳定的,则在宏观上可观测到的必要条件,就是M2/GDP比率不再持续上升。

[关键词] 经济增长 轨迹 20年 问题

[中图分类号] F12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 (2017) 01-0091-06

[作者简介] 朱小平(1954—),重庆江津人,1980年代在江西省政府经济研究中心从事经济改革与发展的研究、咨询。任首届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1990年代以来从事民营企业的改革与发展的研究、咨询。2011年受聘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2016年受聘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特约高级研究员。研究方向:基础经济学及历史。

一、综述

众所周知,自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以来,随着中央实施一系列改革、开放的政策措施,我国经济增长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本文的分析就是基于这个阶段宏观经济增长的若干现象。

考察宏观国民经济增长,出于不同的视角也就有不同的方法。本文关注于总投资、广义货币M2和国内生产总值GDP之间的动态相关性,及其经济意义的解释。

在现代信用货币制度下,M2变动不仅受实体经济状况诸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受到货币管理者货

币政策的重大影响。虽然作为货币管理者即作为中央银行的中国人民银行并不是经济政策的最高决策者,但人民银行无疑是货币政策的唯一发布者与最高执行者。特别是1995年首次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即中央银行法)以来,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的地位与职能得到清晰的界定,其独立性大大加强。因此本文分析的时间段即以1995年为起点,以2014年为终点^①。

由于本文写作时国家统计局尚未公布2015年的相关统计数字,故本文大部分内容的分析未包含2015年以后的状况。附带说明,为节约篇幅本文不详述近20年来的经济政策方面的演变及其作用。

近2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投资作用是决定性的。而投资主要就是固定资产投资与房屋建设（包括城镇房地产开发在内）这两大类活动。所以，这里采用了两个指标用于表示投资活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全社会房建面积。前者采用统计局发布的数值，而“全社会房建面积”则是统计局发布的“全社会房屋建设面积”与PPI价格指数（以1995为100）的乘积。由于国家统计局没有发布类似“全社会房屋建设投资”这样的指标，故这里用“全社会房屋建设面积”与PPI价格指数乘积近似表示“全社会房屋建设投资”的经济意义。数值来源均来自国家统计局网页（下同）。

有几个需注意的现象。第一，2004以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曲线位于GDP核算中的新增固定资产投资曲线的上方，与其形成剪刀差形状。这里的GDP指标均指支出法核算的国内生产总值。第二，2013年之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新增固定资产投资曲线总是在GDP核算中的“新增固定资产投资”曲线的下方，从2013年开始全社会新增固定资产投资曲线位于GDP核算中的新增固定资产投资曲线的上方。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既有统计口径上的，也有增长模式上的。从统计口径上讲，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是资金开支性质的统计指标，GDP核算中的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则是资本形成性质的统计指标。这两个统计指标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居民、企业或政府部门凡当年用于固定资产添置、建造的资金开支（包括借贷利息开支）都属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统计科目。而从理论上讲，GDP核算中的新增固定资产投资仅指当年形成的固定资产。特别的，用于固定资产建造的土地使用权方面的资金投入也都被计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但是土地类费用开支不包括在GDP核算中的资本形成里，类似的还有投资借贷的利息开支。

“当年形成的固定资产”如何来具体界定又是有困难的。因此GDP核算中的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实际是依据宏观经济学收入核算理论中的总储蓄恒等于总资本形成的关系核算出GDP中的资本形成后，再减去存货变动才能核算出来。当年总储蓄、存货变动这两个指标都是可以由直接统计来得到的，所以，GDP核算中的资本形成以及其中的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在统计得到GDP的总数值后，就都能被核算出来。很显然的，就是企业当年用于固定资

产类的投资开支并不表示就是当年形成的固定资产数量。由于投资建设存在的时间周期，当年形成的固定资产往往是前几年已列支的固定资产开支使用的结果。因此，全社会新增固定资产投资与GDP核算中的新增固定资产投资两者意义不同，既不能完全相等也不可能保持有恒定的比例关系，只能在变动趋势上保持一致。但是从经济行为上讲，全社会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又是GDP核算中的新增固定资产投资的动因与来源。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的变化，可以从投资对于GDP增长的推动效率退化来给出一个解释。

2008年以前，M0指数基本上跟随GDP指数同步上升。2008年以后，M0指数滞后于GDP指数的增长。图形上两者形成的剪刀差越来越大。其次，2010年以前M1、M2指数间基本上也是同步增长的，2010年以后，M1指数就比M2指数增长慢得多。

1993~1994年出现CPI高增长后，随之而来的紧缩又使CPI指数在2000年前后有一段负增长，自2003年后才呈现温和上涨。所以，从整个时期来讲，CPI指数累积总效果近似为零，不用考虑。

二、波动模拟与阶段分析

指标M0/GDP、M1/GDP在时间段里变动幅度相对较小，M2/GDP则有显著变动。长期模拟则是利用生产函数模型。由于任何函数曲线都可以用多项式来逼近。所以可用时间为变量的不同次数的高次多项式，来模拟原始数据内涵的短期波动性。

与计量经济学的预测模型不同，短期模拟关注于原始数据内在的波动性与模拟曲线波动性的几何相似，而非数值准确性。几何相似的意义就是原始数据曲线与模拟曲线之间应当是“峰、峰对应”、“谷、谷对应”。模拟效果，个别时间点上的数值误差虽然很大，但整体上基本满足了“峰、峰对应”、“谷、谷对应”的要求。

以平滑后的名义量值年同比增长速率度量，GDP在2000~2013年间处于高速增长期，其速率超过每年10%。而M2供应量的增长则始终以每年10%以上的速率增长，2008~2011年间受应对美国次贷危机而实施的扩张政策（俗称“四万亿”）的影响，M2增长速率有一个峰值期（超过20%）。因此比率M2/GDP的变动（即M2增长速率减去GDP增长速

率)，除了2004~2007年间是负数值外，其他年份都是正数值。从而，比率M2/GDP长期看来其趋势就是一直在上升。

融资行为主要是为投资服务的。由于投资者的自有资金往往少于他的投资项目所需资金、持有资金者所有的资金量往往多于他的资金使用需求，由金融部门做为中介完成富余资金持有者的资金向投资者借贷融通，现代社会的大多数投资才可能实施。而在由商业银行体系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现代金融部门中，由这样的投资—融资行为，就会在商业银行体系中内生地创造出信用货币（存款）M2。M2总量与融资借贷总量及融资借贷方式有密切关系。因此M2总量中由很大部分不是交易类货币而是支付类货币，所以不能将M2/GDP指标看成是交易类货币构造出来的马歇尔k值。否则会造成“货币迷失”问题，即M2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率远高于GDP的增长速度，却没有引起恶性通货膨胀的现象。但是没有办法来区分M2总量中交易类货币、支付类货币各占多少，这两类货币之间也不存在大致上会固定的比例。

然而很显然的是延着M2→M1→M0的顺序，货币的支付属性降低、交易属性上升。因此比较M2、M1、M0三者与GDP比率的关系，可见M1/GDP、M0/GDP比率在2000年以来基本保持稳定。2014年的M2/GDP指标减去M1/GDP指标的差值约比1996年的数值增加一倍以上。比率M2/GDP要比M1/GDP的增长快得多。所以大体上说，M2/GDP比率的上升主要是由投融资行为推动的。

除去融资借贷行为在银行体内部产生M2增量以外，由每年的净出口和进入中国的外商投资在央行、商业银行兑换成人民币，由此产生了银行体系中的“外汇占款”的增量也是M2的重要来源。

由于商业银行体系内生的广义货币不是央行的货币发行，所以不能够简单地将M2总量说成就是央行的货币发行。但商业银行体系内生广义货币数量的能力又受到央行（银监会）执行的宏观货币政策（存款准备金率、利率及贷款总规模等）的控制，M2的增长速率就是由央行决定的。M2的来源主要就是外汇占款与银行体系的内生货币信用。由于货币信用的一个度量指标就是债务数量，所以M2增量也就是债务数量的一项间接性的指标。

投资与M2以及M2/GDP比率的速率关系，以不变价计的GDP指数看，2003~2009年期间是高速增长（≥10%）增长期，而以名义值计的支出法GDP（指数）看，2000~2013年是高速增长期。

可以将近20年来的经济增长划分为四个阶段。1995~2000年投资决定期；2001~2005年投资拉长期；2006~2012年投资率递减期；2013年以来进入投资效率劣化。

投资决定期中，比率M2/GDP波动几乎完全是两个投资指标的波动的加权平均所决定。投资拉长期中，GDP增长主要受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超高速增长所拉动。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超高速增长相比较，在这一阶段里，包括商品房投资在内的全社会房建面积投资的增长速率明显低的多，而GDP增长则是加速的，所以比率M2/GDP有降低的趋势，并且在GDP增长速率达到最高点时，比率M2/GDP的增长速率达到最低点为负数值。在此之后，投资效率开始逐步递减。

在投资效率递减期，M2增长速率继续加速，GDP不变价指数增长速率则逐步减速。投资指标中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在M2增速的加速（即“四万亿”效应）下继续维持高位，但2009年以后快速递减，而全社会房建面积投资的增速却逐步加速，并在其后维持高位速率，国民经济增长动力中房地产投资因素日益堪重呈双投资因素推动，比率M2/GDP的增速从最低点调头向上。

自2012年下半年以来，两个投资指标的增速先后失速，也就拉低了GDP增长速率，导致M2增速随之递减，国民经济事实上进入了投资效率劣化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除去M2/GDP比率增长速率具上升趋势外，其他速率型指标都是递减的趋势。这就是投资效率劣化的典型标志。

上文已经说明M2总量中包含有很大部分是融资行为决定的商业银行体系内生的信用货币，因此在资产负债表上对应于生息债务。所以M2/GDP比率不可能无限上升，否则，最终日益庞大的巨量M2中对应的生息债务产生的巨量利息负担，必定要压垮国民经济的正常循环状态，债务链崩断，爆发金融危机强制性清算债务的时刻就要到来。虽然并没有一个理论方法能够精确地给出金融危机出现的条件与时间点，但上述内在机制的存在无疑是确定的。因此，一个能够在债务循环上长期保持稳定的国民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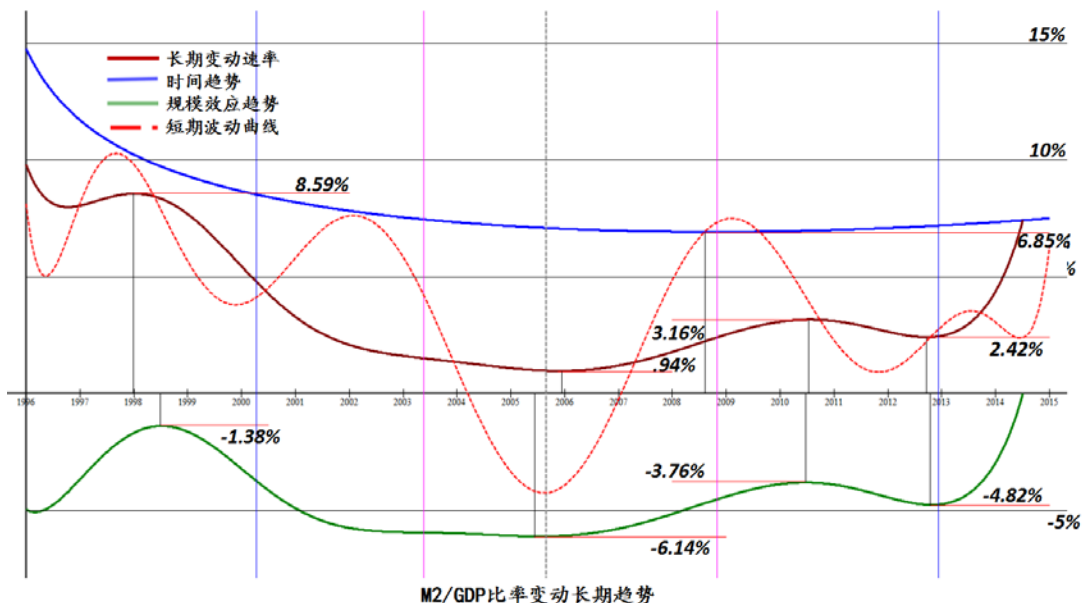


图1 长期变动模拟之一

济体，其必要条件就是M2/GDP比率能够保持稳定，也就是说，M2/GDP比率增长率长期平均应该接近为零。当然，就中国原先所处的发展中状态讲，M2/GDP比率随经济增长而上升具有合理性，因为经济体系的货币化程度在不断提高、金融体系的深化也在不断提高。这是良性的发展状态。在这个良性状态中，应该看到的就是投资效率在提高或者至少保持稳定的投资效率。所以以这样的要求来检验，1995~2004年中国经济符合这个良性的发展状态。这也是虽然M2/GDP比率增长速度在这一时段里是很高的，但由于GDP增长速率能够维持高位并加速，所以，它保证了M2/GDP指标增长最后向下得到一定的修正。这也是经济增长此阶段与其后阶段的重要区别所在。

三、长期趋势分析

在作长期分析时，假设了GDP、M2都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全社会房建面积这两个投资指标的函数，并用可变系数的CES生产函数对其做长期模拟。利用生产函数可以将长期趋势分解为随时间变动的部分和经济规模扩大效应的部分。

图1是对比率M2/GDP增长率的模拟，其中长期变动趋势曲线是模拟曲线，时间趋势是可变系数

的CES生产函数的系数随时间的变动曲线，规模效应曲线表示可变系数的生产函数的经济规模部分的影响。模拟的拟合系数分别为.9737（M2）和.9731（GDP），是很有效的。这也就说明中国经济近20年来的增长确实可以用投资行为来描述。

由图可见，时间累积效应曲线始终是正数值，规模经济效应则始终是负数值，两者迭加的综合效应则始终是正数值。图2则是更简洁地表示图1的关系。

时间累积效应曲线是正数值表示国民经济体系在投融资行为上，具有累积性的融资依赖性。它说明随着货币化程度的提高和金融的深化，融资路径会累积性地加长加深，国民经济增长日益依赖债务融资的更快速增长。因此，在宏观统计上会表示出M2/GDP指标随时间延续而不断上升。规模经济效应是负数值表示随国民经济总规模的增长，投融资的产出效率的提升，从而在资金的使用上，会有宏观节约效应。负数值规模经济效应对M2/GDP指标的增长又产生抑制作用。因此，M2/GDP指标随时间延续以多快的速率上升，取决于这两个效应的迭加。从模拟的结果看，平均地讲，时间累积效应是M2/GDP每年上升7.19%，规模经济效应则是M2/GDP每年减小2.16%，迭加效果就是M2/GDP约每年上升5%。应当注意这是一个相当快的上升速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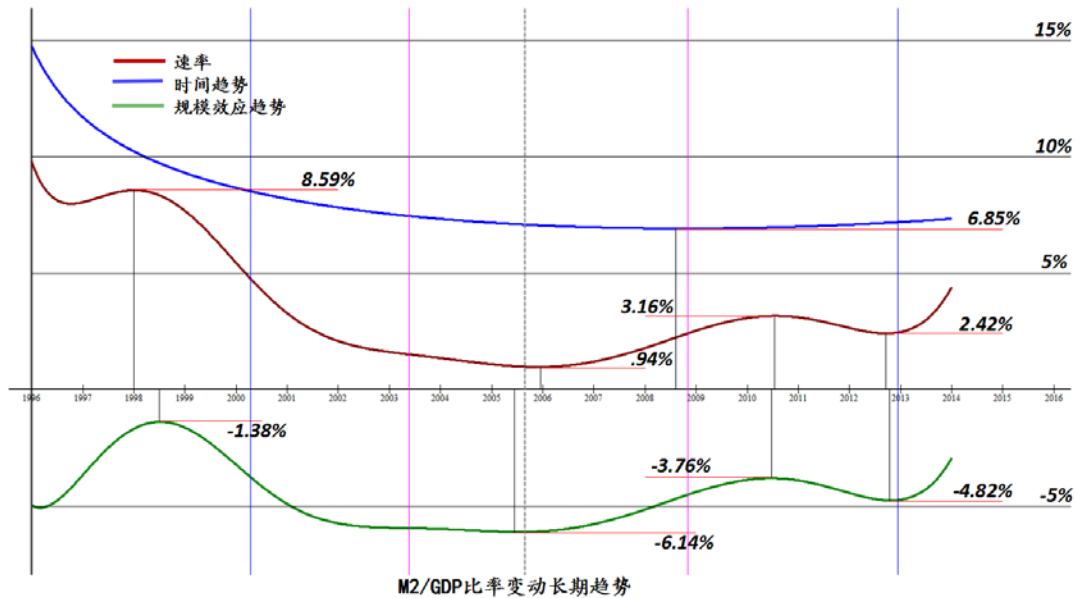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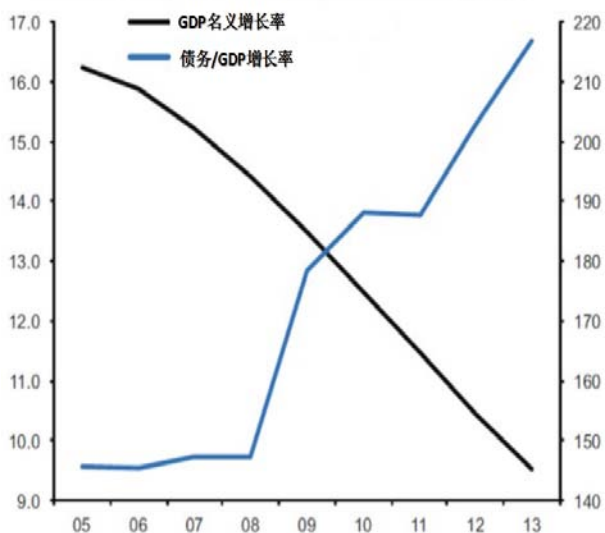


图2 长期变动模拟之二

从图中可见，这两个效应数值上的最小值度发生在2005年中前后。在2005之前，这两个效应呈减小的曲势，自2005年以来，两个效应的曲线均调头向上，并且，在2013年以来，两者均快速上升。与短期波动所标现的情形一致，长期来看，2013年以来的投资推动GDP增长的效率明显劣质化了。两个效应曲线近年来的上升，显示了原先国民经济完全依赖投资推动的增长方式已经接近极限，否则，由于M2/GDP指标进入快速增长的阶段，若继续完全依

赖债务—投资推动的增长，则或迟或早会遭遇社会总债务循环不可为继的约束边界。其约束性的内在经济宏观机制，就是M2总量的增长总伴随着社会总负债相应的增长（虽然不一定完全成固定比例），因此，当M2总量的增长比GDP增长更快推动M2/GDP指标快速上升，就表示每单位国民收入的产出依赖越来越大的债务融资投入。如图3所示，中国经济增长近年来GDP增长率、负债率增长率出现一个劣质性交叉。



来源：华尔街见闻

图3 中国GDP增速下行、负债爆增

M2/GDP指标上升速率通常要显著高于可能的利率下降的速率，并且，利率下降通常存在下限，最终产出每单位国民收入就需支付越来越大的债务付息。这也就是说按生产要素收入构成的国民总收入中支付的利息收入部分的比重，会随M2/GDP指标快速增长而提高，于是国民总收入中其他的要素收入部分：工资、利润等必受到日益挤压，中国经济增长就日益劣质化了，其最终后果只能是趋向经济循环遭遇无法承担如此之高的债务总量而被迫进行债务清算。

再若从开放的视角来分析，由于中国经济具有不可逆的开放度，就要受到国际市场外部条件的约束。在国内原有的以投资推动GDP增长的效率递减时，若继续用宽松货币政策支持大规模投资，经济就会进入宏观研究中最忌讳的一个状态，就是所谓的米德冲突。以稳定汇率为目标，采取资本观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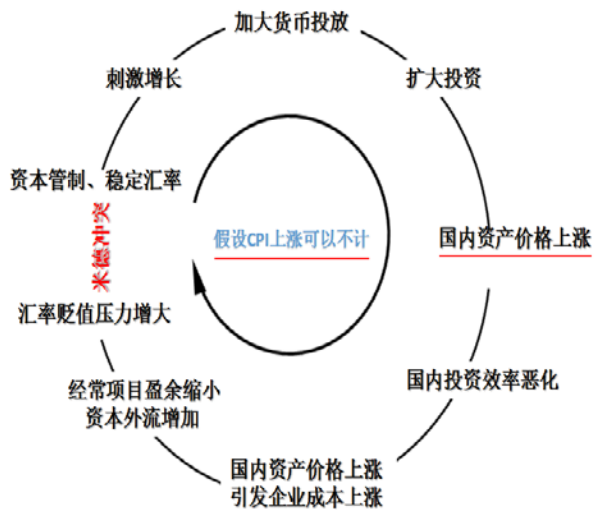


图4 宏观经济的“米德冲突”

并扩大货币投放，刺激房地产链等措施，短线似乎贬值预期和资本外流收敛、但国内资产价格以上升，最终导致米德冲突：即资产通胀再起导致生产成本高企，国内投资回报率会以更快的速率下坠；衰退性顺差萎缩，经常项目盈余恶化，汇率贬值压力急剧上升。外部约束如果变成内部约束，直接对

应的则是债务危机提前的爆发。在外部约束硬化的强制作用下，政策措施的后果与政策目标的预期形成冲突。如图4所示。所以，随着中国经济增长进入相对低速增长阶段，如果放任M2总量继续快速上升（比如继续保持以GDP增速2倍的速率上升），则社会总负债将相应的以比GDP增速更快的速度上升，在米德冲突的硬约束之下，宏观经济运行不能够保持持续稳定。

长期趋势分析的结论就是，中国经济在相对低速增长期是稳定的，则双重条件就是：GDP增速在相对低位能够保持稳定，同时，社会总负债率能够从最高点平缓降低。即GDP增速、债务率的变动不能随时间延续，沿着直线呈剪刀差状态，而必须是沿曲线变动，才能进入稳定区域。由此可知，中国经济在相对低速增长期若是稳定的，则在宏观上可观测到的必要条件，就是M2/GDP比率不再持续上升。

这就是对于未来中国经济运行宏观观测上的一个重要视点。

Analysis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Path in the Past 20 Years: Relatively Low Growth Period of Economic Stability of the Dual Conditions

Zhu Xiaoping

(Department of Politic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0)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gross domestic product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in the past twenty years GDP、Broad money M2 and fixed assets investmen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ousing construction investment and other indicators are simulated and analyzed. This paper explains M2 source of the majority of the broad sense of the amount of money is the currency of payment non transactional currency. This part of the money is the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behavior in the commercial banking system in the creation of the essence of the credit currency. So, the total amount of M2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total liabilities of the society. Data simulation analysis nearly twenty years,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the growth of housing construction investment to promote the growth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vestment efficiency. Since 2004 ,High investment to promote the gradual decline in the efficiency of growth, Growth rate decreased. Since 2013 the efficiency of investment tends to be inferior. In this paper, we also give the dual conditions of the relatively low speed economic growth period.

Key words: Economic Growth, Track, Twenty Years, Problem

(收稿日期：2016-12-25 责任编辑：靳叶)

【开放论坛】

珠三角港资企业转型升级方略

张文闻¹，李小瑛^{1,2}

(1. 中山大学港澳与内地合作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2. 中山大学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275)

[摘要] 本文从珠三角港资企业的发展现状出发，总结珠三角港资企业转型升级的主要问题，包括核心竞争力不足难敌国外市场的竞争、缺乏企业家精神、政策优惠不再、政府税费过高、人才缺乏等。港资企业应把握“一带一路”战略、CEPA合作，建立跨境电商平台，打造港商品牌，适时采取跨国并购，实现跨越式发展。

[关键词] 港资企业 转型升级 珠三角

[中图分类号] F27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 (2017) 01-0097-03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珠三角港资企业转型升级研究” (13JJD790039)；中山大学粤港澳研究院课题“珠三角港资制造业转型升级”。

[作者简介] 张文闻 (1987—)，广东广州人，中山大学港澳与内地合作发展协同创新中心西方经济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城市经济学；李小瑛 (1983—)，重庆人，中山大学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港澳与内地合作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城市经济学、劳动经济学。

一、珠三角港资企业发展现状

2014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在“三期叠加”压力的倒逼下，珠三角企业加快转型升级的步伐，港资企业的发展发生了一些新变化。

一是港资企业是广东数量最多的外资企业。截至2014年底，在珠三角地区港资企业共19305家，占全部港资企业的83.9%。珠三角地区港资企业投资总额1962.03亿美元，注册资本1251.43亿美元。广东省珠三角9市累计批准香港直接投资项目109741个，合同外资金额3134.91亿美元，实际吸收外资金额1868.2亿美元，分别占同期港澳资投资各项总额的

84.58%、85.27%和85.68%^①。从地域分布来看，珠三角地区19305家港资企业中，5439家集中在东莞地区，占比28.2%；5434家集中在广州地区（含增城、从化），占比达28.1%，两地合计占比超过五成^②。

二是港资制造业企业面临困难。广东省港资企业主要从事制造业，包括橡胶和塑料制品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纺织服装、服饰业等制造业。近年来，港资制造业面临困难。以港资制造业重镇东莞为例，根据《东莞港（澳）资企业现状与前景调查》，有约三成企业认为订单减少幅度普遍在15%~20%之间，订单减少的行业主要集

广东省商务厅。

中在纺织、服装、鞋类和家具；有三成制鞋订单已经转移到东南亚国家生产；所调查的企业普遍预期利润下降10%~15%，服装、制鞋、玩具等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利润率已经从高峰时的20%下降至6%左右。

三是港资制造业企业搬迁倒闭加剧。2012年以来，广东省港资企业搬迁倒闭加剧。2014年广东省累计关停搬迁港资企业1032家，占全省关停搬迁企业数的63.71%。根据《东莞港（澳）资企业现状与前景调查》数据，2012年东莞港资企业约有15000多家，但到了2014年初下降到7500家左右，到2015年底只有不到7000家。在国内外经济环境不断恶化的情况下，这个趋势恐怕仍将继续。

四是港资服务业企业占比逐年上升。从2006年占比2.87%增至2015年13.02%^①。

二、珠三角港资企业转型升级的主要问题

（一）核心竞争力不足难敌国外市场激烈竞争

第一，港资企业核心竞争力不足。与美欧日等国外在华跨国企业相比，港资企业主要从事中低端制造业，经营规模普遍较小，研发能力相对较弱，品牌影响力也较小。由于港资企业进入国内市场早，同时具备人缘、语言、文化等优势，取得一定的成功。但随着我国不断扩大开放，美欧日等国外跨国企业相继进入中国市场，人才、资本、技术占据优势，港资企业在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难敌美日欧大企业的竞争。第二，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代工订单减少。由于港资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主要从事传统代工制造业，严重依赖欧美日的订单。近年来美国经济逐步复苏，吸引大量美资企业回流。而且美元进入升息周期，市场上对美国经济的乐观预期，也吸引了相当数量的资本和订单回流。另外，由于中日关系持续低迷，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提升，劳方的议价能力不断提高，使得部分日资企业成本增加，只能选择回流。这部分回流的美国、日本企业主要是处于上游的制造业企业，它们的退出直接影响下游港资制造业企业的订单。第三，发展中国家订单分流。珠三角地区的人力、土地、资源等成本不断提高，使得很多厂商不得不搬迁到越南、柬埔寨、印尼等地。这些地方的成本只有珠三角的1/2，成本上升造成的订单转移，也使

珠三角港资企业倍感压力。

（二）缺乏“向内看”的企业家精神

一些港资企业家缺乏“向内看”的企业家精神，不够了解国情，对国内的政策、制度研究不深，不能灵活调整经营。首先，新一代港商缺乏老一辈港商的冒险、进取精神，特别是愿意在中国内地拼搏，以合理的失败成本追求商机、克服困难直到实现目标的企业家精神。其次，部分港商缺乏战略思维，没有准确把握国家“一带一路”大战略、CEPA粤港澳深度融合等政策，在内地市场的资金投入、业务拓展等方面存在局限性。港资企业更倾向于通过简单的加工贸易获取利润，缺乏系统性、战略性眼光和能力对企业进行全面升级改造。与本土的民营企业家相比，港商亟需奋发图强，发挥“向内看”的企业家精神。

（三）政策优惠不再

首先，外商优惠逐步取消。2008年以来，我国陆续颁布实施了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劳动合同法》，外商投资企业所能享受的优惠待遇已基本取消，劳动力工资上涨，企业用工成本上升，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影响较为突出。其次，国内劳工薪金问题逐渐受到重视。全国最低工资标准逐年增加，珠三角地区最低工资标准增长很快，这对于外资企业，尤其是从事制造业为主的港澳资企业影响深远。

（四）政府税费过高

珠三角港资企业认为国内税费项目繁多，征税费率高，令企业负担沉重。尤其是“五险一金”（养老、医疗、失业、生育、工伤保险和公积金），已经占工资总额的近一半。根据《东莞港（澳）资企业现状与前景调查》，东莞地区制造业企业员工平均工资为3000元，最少要缴纳1000元，再加上为留住员工的食宿、交通等补贴，用工成本达1400元左右，对企业的竞争力有很大影响。

（五）缺乏高素质人才

港资企业主要从事简单代工制造业，所需的技术和人才的层次较低，缺乏培养人才和提升技术的机制，使不少企业转型升级困难重重。尤其多年来的“招工难”，高素质人才严重缺乏，使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被迫淘汰转移。2014年东莞企业用工

① 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

缺口平均在15%左右，其中高素质技术工人最为缺乏。随着一部分企业转型升级，引进新技术和新机器，企业需要大量高素质技术工人。

三、珠三角港资企业转型升级方略

(一) 把握“一带一路”，扩展新兴市场

首先，“一带一路”有力扩大港资企业发展的市场，优势产业可以抢占先机。特别是“一带一路”对香港的益处不止限于大企业，有专长或特别专注细分市场的中小企业，也可从中受惠。其次，港商可以传统商务业务为基础，拓展消费链上游产业。港资企业应把握新机遇、新商机，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拓展新兴市场。

(二) 建立跨境电商平台，促进内销网络

面对国内电子商务快速发展，港资企业的电商平台亟需建立，学习国内企业家先进的发展观念和商业模式。首先，香港电商应转变旧思维，适应国内电商生态。和国内相比，香港电商以专业化为主，忽略了发展平台的重要性。港资企业开拓内地市场，必须转变在香港的电商模式，尽快抢占内地市场。其次，香港电商企业要积极在内地设点，建立电商平台。尤其应该在珠三角、广东自贸区（南沙、前海、横琴）内，利用地理优势、文化优势，尽快铺开设点，加快构建内销网络。

(三) 积极向“内”看，抓住CEPA机遇

港商应积极向“内”看，研究国内的政策、战略，搭上国家崛起的快车，深化区域合作，实现转型升级。从2003年开始，CEPA协议不断创新，给港资企业尤其是服务业企业进入广东提供便利。港资

企业需学习、适应新的政策环境，利用好CEPA等新政策措施，使港资服务业进入珠三角，实现港资企业转型升级，互利共赢。

(四) 打造港货品牌，提供差异化商品

首先是要打造港货品牌，加大宣传，建立品牌优势。其次，香港电商要充分利用跨境电商的差异化商品优势。作为自由港，香港的贸易体系经过多年发展已经非常完善。从事贸易的企业经验丰富，他们与内地企业相比，最大的优势在于供应链。港资企业的供应链流程更顺，速度更快，经手的进口商品种类也更多，能为内地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差异化商品。尤其是随着内地民众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对商品的品质有了新的要求，港商品牌大有市场。

(五) 适时采取跨国并购，提高核心竞争力

进行合适的跨国并购，能有力地将资源合理整合，实现后发企业追赶。港资企业应找准自身产品和消费者的市场定位，运用与国外企业代工建立工作关系，培养企业社会资本，适时提出跨国并购。通过并购国外企业的技术、品牌、市场、人才，提高核心竞争力，实现跨越式发展。通过技术再投资、品牌深化，实现自主创新，最终实现转型升级。

[参考文献]

- [1]毛蕴诗等.制度环境、企业能力与OEM企业升级战略——东菱凯琴与佳士科技的比较案例研究[J].管理世界,2009(6).
- [2]阮建青,张晓波,卫龙宝.危机与制造业产业集群的质量升级——基于浙江产业集群的研究[J].管理世界,2010(2).
- [3]汪建成等.由OEM到ODM再到OBM的自主创新与国际化路径[J].管理世界,2008(6).
- [4]中山大学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东莞港（澳）资企业现状与前景调查[R].2016.

The Strategy of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Hong Kong – owned Enterprises in Pearl River Delta

Zhang Wenwen, Li Xiaoyi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dong Guangzhou 510275)

Abstract: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main problems i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Hong Kong enterprise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including lack of core competitive, entrepreneurship, beneficial policy, talents, and high tax. Strategy is that Hong Kong enterprises should be involved in “Belt and Road”, CEPA, establish cross-border E-commerce platform, build up famous brand of Hong Kong products, and realize cross-borde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to achieve catch-up development.

Key words: Hong Kong-owned Enterprises,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Pearl River Delta

(收稿日期：2016-12-18 责任编辑：廖令鹏)

【博士视点】

政务服务管理模式及治理策略选择

艾琳, 王刚

(中国政法大学吉林大学, 吉林 长春 130012; 深圳市政府, 广东 深圳 518023)

[摘要] 政务服务中心的自身属性决定了它所实施的管理创新、业务创新和服务创新是政府层面的, 具有整体性、系统性和关联性特征, 必然要超越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成为政府职能转变、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构成。政务服务对信息化技术在集中管理、部门协同和用户导向下的广泛应用, 政务服务中心的组织体制加速变革, 需要探讨互联网下政务服务不同治理模式的运作机制及选择策略。

[关键词] 政务服务中心 电子政务 互联网机制创新 政务服务治理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17)01-0100-06

[作者简介] 艾琳(1982—), 女, 满族, 吉林省吉林市人, 法学博士, 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后, 美国波士顿大学访问学者, 吉林大学法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 社会法、行政法; 王刚(1965—), 陕西西安人, 深圳市政府公务员。

党的十八大以来, 随着简政放权、政府职能转变改革的深化, 承载着改革抓手、平台整合和机制创新任务的政务服务中心, 既要解决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把改革举措落到实处; 还要不断改善政务服务的品质, 办理好行政审批相对人办事办证“最后一米”的问题, 建设人民群众满意的政府。政务服务的价值, 在于它将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依照自己意愿找政府办事”, 与审批部门“依法依规提供办理服务”有机结合。这种“依申请许可”的办理行为, 既是公权力的专属职责, 又是社会化的普遍服务。近年来, 从中央到地方均在重新审视政务服务中心的定位、职能和作用, 寻求利用信息化重构政务服务的管理体制、服务方式、运作机制, “互联网+政务服务”开启了政务服务治理的全面升级。

一、政务服务改革的核心成就

政府的核心价值在于为社会提供政务服务和公共产品, 成为行政学共识的政务服务则是从政务服务中心的诞生开启的。作为一项“起自基层”的政府改革, 政务服务中心经过近20年的发展, 已蔚为大观。目前, 全国近乎所有的市、县(区)、镇(街道)政府, 1/3的省级政府设立了政务服务机构; “一站式”政务服务模式在促进政府自身改革、改善政府运行机制、提升行政效能, 以及让人民群众享有规范、透明、尊重、便捷的政务服务, 提升政府公信力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 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关键方面:

(一) 确立了行政审批的服务导向

建立政务服务中心的出发点, 是为了方便群众办事, 它所确立的“权利”、“义务”观念, 是

对“权力”、“官本位”意识的颠覆；公开透明、行为规范和可评价可追溯的政务服务形态，是对暗箱封闭、随性任意和缺乏制约监管的行政审批方式的根本改变。政务服务窗口组织、办理方式和业务运作安排，以申请人为导向作为基本准绳，“把便利留给群众”体现于具体行政审批活动之中。对以民为本理念的不懈追求，以及所确立的服务政府的行政文化，为政务服务中心准确自身定位、持续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内在生命力。

（二）推动了管理创新和机制优化

政务服务中心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产物，又有力有效地推动了政府相关改革。集中审批办理、审批服务、审批监管的运作模式，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行政审批信息的不对称性，使事项精简更具有针对性、合理性；打破条块分割的部门壁垒，实施了行政审批跨部门流程优化，提升了政府的系统效能；将行政层级的横向平台整合与纵向体系建设相结合，着力打造对外办理的无缝隙服务；推行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标准化，建立起事项统一、要求同质、结果一致无差异的政务服务；着眼于理顺行政审批、行政监管与行政服务的关系，以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推进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务服务中心独有的“以点带面”的实施模式、资源汇聚的平台整合、终端倒逼的创新机理，弥补了传统体制下的条块分割、楚河汉界的固有缺陷，又降低了体制改革、机构变革可能带来的“震荡”风险。

（三）改善了发展环境和政府形象

方便人民群众办事、改善投资发展软环境、促进本地经济社会发展、争创区域竞争中的体制优势，是政务服务中心的核心使命，也是各级党委政府重视和强力推进的重要原因。“只进一家门，办妥所有事”的运作模式，面对面的窗口式办理体现的平等尊重的行政文化，行政审批事项要素、办事环节、许可结果的公开透明可预期，围绕行政效率的材料精简、环节减少、流程优化，都大大改善了行政审批相对人对政府的信任度、认可度。比如政务服务中心在促进招商引资、重点企业或重大项目尽快落地建设等方面推出了诸多针对性的服务举措，这种集合式的创新和服务供给，是审批部门分散办公、各自受理状态下做不到的，是“一站式”集中审批成为增强地方竞争力的重要实现。

“一站式”政务服务在实践层面确立了必要

性、合法性，使政务服务中心以其巨大的工具理性和现实的价值理性在相互融合中得到升华，带动了政府的系列变革和持续创新。但是，脱胎于管控制度、权力导向的政务服务中心，有着自身发展难以克服，或者说存在着限制其效能充分发挥的诸多预设束缚。

二、政务服务中心的外部困境

政务服务中心遇到的最大困境，是要提高行政审批的整体效率、服务品质，就必需得到审批部门的支持配合；但是，改变现状的具体实践使它时常站在了审批部门的“对立面”，矛盾和冲突就自然产生了。

（一）条块分割造成的束缚

中央集权下的层级管理、条块分割与官僚体制结合所形成的权力部门所有、部门权力个人行使的格局，与政务服务中心打破部门业务边界的横向平台整合在先，以平台为基点的纵向贯通在后，实现协同运作的整体政府目标之间存在着较明显的冲突。相对于行政职能“上下对口”的管理体制，无主管“婆婆”的以申请人为导向、克服碎片化的一体化运作模式，对审批部门权力任性所形成的抑制，使不少地方的政务服务中心作为政府机构中的“另类”存在，这也决定了既有体制对它保持高度的警觉。

（二）机构小职能弱的困扰

初创时的政务服务中心，仅是汇聚审批部门服务窗口的场所。在满足申请人不断升级的服务需求，发挥政府改革的推手、整治机关作风的抓手作用过程中，政务服务中心起到了其他行政机关不具备的作用，强大的聚合功能、整合能力使其朝着职能化、实体化方向不断推进。然而，全面提升行政效能、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创新使命，与政务服务中心在行政管理体制中的机构状况、实际地位，以及对政务服务资源的组织协调和统筹能力之间，有着巨大的落差，“小马拉大车”的现象十分普遍。至今，不少地方政务服务中心的职能不匹配、机构不合理、体制未理顺、编制无保障的问题仍然存在。

（三）欠缺法律制度的支撑

作为一种自下而上的管理创新、体制创设和服

务创造，政务服务中心创立初期存在行政职能、管理体制上的抵牾，政策指导不明确，法律保障也不充分。任何政府改革创新都不可能不受制于现实的制度土壤、体制环境和行政文化，政府内部对政务服务中心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改革成效缺乏共识，有的认为集中审批是形式主义，政务服务的创新举措得不到有力支持、甚至难以开展；以职权法定、依法行政的视角对集中审批合法性的置疑，在学术界同样普遍。《行政许可法》颁布后，政务服务中心依据该法第二十六条“联合办理、集中办理”的表述中寻找并不很确凿的法律依据，加以扩展阐释。即使中央文件一再强化政务服务中心的地位、作用，但欠缺法律支撑保障仍困扰着政务服务中心。

上述情况表明，政务服务中心在与传统权力观念的冲突中，在传统管理体制的夹缝中，甚至可以说在一些行政机关的挤兑中，以及不被“放心”和“自证价值”的生存处境中，决定了它必然要遵循以申请人为导向的外部倒逼路径，积极进取，对革除弊端、自我完善和创新发展怀有强烈的内在冲动；也决定了政务服务中心会不断尝试一切新的服务手段和业务工具，如对信息化技术的高度重视并积极地去主动适应和深化应用。

三、电子政务与政务服务的融合

政务服务中心与信息化在逻辑上具有高度的契合性，比如都需要横向的整合、纵向的贯通，都强调集约、互联、协同。共同的逻辑属性，互补的功能属性，决定了二者的结合，必然整合为新的基于统一、整体、系统的政务服务运作机制。借助电子政务既有的发展基础，政务服务中心的汇聚、整合、扩散效应全面提升，通过数据共用、信息互用和结果共享，扩展业务边界和服务功能；另一方面从办公自动化走出的对技术导向“孤掌难鸣”的电子政务而言，则找到了一个符合信息技术发展方向的依托平台和应用载体。

（一）电子监察绩效评估的引入

早期的电子监察是附着政务服务中心建立的对行政审批的时效监管，虽功能简单但对提高审批效率促进很大，特别是借助纪检监察的职权突破了审批部门之间的行政壁垒、打通了异构的信息系统。随着统一的行政审批业务平台的建立，在线审批、

流程优化和信息共享等受到重视，政务服务中心普遍建立了本级政府的行政审批事项管理系统和证照数据库，对行政审批的监管由对关键节点和许可结果的时限监督，拓展为基于行政审批业务完成情况的全过程监管，以及工作人员与申请人互动情况、政务服务社会评价的绩效评估，由静态到动态、由节点到过程、由态度到行为的政府自我监管效能大为提高。

（二）跨部门协同的全流程办理

整体大于具体、系统高于个别，申请人如何“到一处”、“找一门”顺畅地办成“所有事”，一直是政务服务中心进行行政审批简化优化、政务服务创新提升的基本目标。为此，各地政务服务中心普遍将“全事项管理、全流程优化、全过程共享”作为信息化技术应用的核心要求，力求借助信息化技术打通体制壁垒、业务梗阻、信息闭塞，按照审批事项关联性、业务协同性和服务品质化的目标，实现对跨部门业务协同办理的平台支撑、系统支持，行政审批的一体化、政务服务的整体化程度大大提升。

（三）网上网下一致的服务平台

政务服务中心利用互联网的超时空及灵活性、便利性特点，打破审批部门、行政层级、管理区域的权力分割，按照不同政务主题优化组合网上审批事项和业务办理，建立了线下与线上相结合、可选择的政务服务模式。基于应用办事的网上办事大厅整合了“不及时、不准确、不回应、不实用”的政府部门网站，建立了协同服务、关联服务和跨部门服务的统一网上申请入口，通过交叉认证、单点登录和统一事项编码、统一申报流水号管理等，开展在线审核、一网通办，推行了“信任在先、审核在后”的审批创新。

信息化技术在政务服务中心的广泛应用，是“一站式”政务服务的重要转型，它在提高审批效能、改善政务服务的同时，由于贯彻了整体性的要求，改变了行政机关之间的审批业务承接关系，由画地为牢状态结为更为紧密的有机体，进一步鼓励政务服务中心沿着集合受理、集约办公和集成服务的道路向前推进。政务服务与电子政务的深度融合，超越了简单的“政府上网”，既促进了政府的自身治理，也促进了职能转变，其成效和影响当然不会仅局限于政府内部。

四、政务服务管理模式的对比分析

“管人与管事分离”的二元治理模式，一直以来是制约政务服务中心进一步提升管理水平、服务效能的主要障碍，也是被诟病的管理缺陷。为了克服作为服务平台的主体缺失，政务服务中心先后采取了强化内部规范管理、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公开审批办事全要素、建立政务服务标准、重构跨部门业务流程、审批事项与证照批复统一数据应用等举措，集中整合的范畴持续拓展、程度不断加深，收到了十分显著的成效。为突破“二元结构”为核心的体制束缚，政务服务中心实施了三种管理模式创新：

（一）部门业务的集合模式

为解决服务窗口业务办理能力不足、强化对服务现场的管理，政务服务中心推行了“两集中两到位”改革，也就是审批部门内部的行政许可权集中制度。做法是将部门的审批业务划归一个内设机构统一行使，通常是设立行政审批办公室；行政审批办公室整体进驻政务服务中心，审批部门对行政审批办公室负责人（即服务窗口“首席代表”）授权到位，行政审批事项在政务服务中心办理到位。

“两集中两到位”没有解决政务服务中心“二元结构”主体缺失的管理困境，但推进了政务服务中心“由虚转实”，提升了集中服务的治理效力，大大提高了行政审批的效率，得到广泛实施。重要的是，作为衡量政务服务中心发展阶段的核心标准，集合模式还与其他行政管理创新奠定了基础。比如哈尔滨市就在此基础上“搬神撤庙”，实施了以优化处室配置、创新管理体制为核心的“大处室”改革，力求破解制约行政效能的“中梗阻”问题。

（二）政府职能的归并模式

归并政府职能，是指将原分属于不同审批部门的审批职能、审批业务与审批事项，或还与政务公开、电子政务、电子监察等职能，归并整合至新设立的行政审批局。行政审批局被形象地称为“一颗印章管审批”，是对本级政府行政审批权所做的横向职能归并、实体构建，之前的审批部门不再承担原有的审批职能，重点是履行好政策制定、监管职责和延伸服务。专司行政审批的职能机构创设改革起自成都市武侯区，天津市滨海新区着眼于政府整

体改革和职能转变，推行了“十个一”^①的系列改革，产生更加广泛的示范效应。在2015年5月，中央编办、国务院法制办在天津召开了全国推进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试点会议，要求各地借鉴并推进这项改革，之后又扩大了试点地区。“一颗印章管审批”在原有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模式边际效益持续递减的背景下，另辟蹊径，将改革的重点放在了行政职权的重构上，在优化政务服务的同时，推动了行政体制改革，带动了政府管制方式、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系列变革。

上述两类政务服务的治理创新，都可以称为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但二者在“相对集中”调整的程度、改变的范畴和产生的影响上，是有本质区别的。由于政府职能的归并模式推进阻力相对较大、需要系统构建，或许有些地方没有认识到“一颗印章管审批”是以小博大的系统性政府改革，即这项起自行政审批权的改革对行政体制改革、政府职能转变的重大意义。于是，一些地方“便宜行事”，采取了不触及职权转移、体制变革的“进一步退半步”的政务服务方式创新，重点是围绕如何优化服务、提升公众的获得感，以广东为代表的受审分离的内部代办模式即是如此。

（三）受审分离的代办模式

受审分离代办模式的最大特点在于不触及职权转移、体制调整，它采取的是“统一分一统”的“前台分类集中受理、后台分工各自办理”业务运作。主要做法是：有统一的业务受理信息系统，与部门审批系统进行数据交换^②，实行“一个口进”；对个人办事、企业办事、基本建设等按服务主题细分，实行“一窗通办”；窗口收件人员全部为政务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审批部门在后台协办，做到前台“一口受理”；审批部门只承办窗口转交的许可申请，在后台“分别审核”；行政审批的权责关系不变，但审批部门可委托窗口对只须形式性审查的事项直接办理，提高即办率。此种模式下，政务服务中心对审批部门的办理时限和许可结果统一监管，避免“体外循环”，维护了“一站式”组织形

^①一颗印章管审批，一份清单管边界，一个部门管市场，一支队伍管执法，一个平台管信用，一份单卡管通关，一套体系管廉政，一张绿卡管引才，一包教材管培训，一个号码管服务。

^②采取系统对接方式实现的数据交换的程度、范围和应用，受制于审批部门的业务系统状况，特别是数量繁多、自我封闭的垂直系统；也会因管理的不同存在较大差异，也就是说在实施操作和实现结果上自由度很大，这种不稳定性进而会影响到行政审批受理、业务办理模式。

态、受理形式和信息系统的统一。通过另设服务界面和受理平台的方式，在改善申请人办事体验与照顾现行管理体制之间，达成了对既有权力配置格局妥协下的新平衡。该模式较有说服力的提法是“把简单留给群众，把复杂留给政府；把简单留给审批部门，把复杂留给技术”，并以“容易接受的稳健方式”在佛山等地取得成效，之后进一步总结为“一门式一网式”模式在广东等地得到推广。

（四）集约模式的差异比较

“两集中两到位”增强了政务服务中心的运作效能，为职能归并或业务帮办模式做了组织、管理和业务上的准备。职能归并是“体制+制度+职能”的改革，将政务服务方式创新与管理体制变革在职能转变层面实现了有机结合，着力解决行政职能交叉行使、重叠管理的问题，削弱了原审批部门的职权；帮办模式是“技术+方式+制度”的创新，更为注重服务界面的打造，将简化、方便企业和自然人办事作为核心。“一门式一网式”下政务服务中心要“代”审批部门受理材料，既不“剥夺”审批部门的实质权力，还缓解了这些单位编制不足、人手不够以及窗口留不住公务员的问题，舒缓了直接服务申请人的工作作风压力，自然比行政审批局更容易被接受。行政审批局使原本分属不同组织体系的信息系统要实现的数据开放、互联、共享以及流程再造等变得相对简易，必然能够做到“一网式”；“前台受理、后台分办”是机构与职能统一下的内部业务分工，且出于廉政要求更强调“接办分开”。“一门式一网式”在打造许可申请统一受理界面、运作平台的同时，需要密切分属不同部门、受审分离的前后台协作，策略上的便宜实施使“一网式”实现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要更多，必须依靠技术突破、业务变通和人员增加来实现，这将是长期的改革痛点。

无论政务服务中心实施何种管理模式，就总体趋势而言，都是在加强政务服务的集中范畴、提升政务服务的集约程度、促使政务服务走向更为紧密的服务集成，于是互联网、大数据被引入政务服务治理当属必然。

五、基于互联网的政务服务治理策略

2015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全国人大九届三次会

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之后国务院密集出台了“放管服”和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的政策文件。在互联网浪潮中，政府应该更加充分地运用信息化技术，将内部治理与外部服务有机结合：建设资源共享、业务协同的“一体化”运作，为公众提供最为简便的“一网式”服务，开放政务服务数据、实现社会化应用，打造智慧政府。

（一）无缝隙服务的整体政府

整体政府是要解决政府运作中的碎片化、条块化、本位化的问题。按照“大政务大服务”的思路，采取合并同类项的方式归并政务资源，深化大部门制改革，将体制完善与机制优化有机衔接，使行政运作简易化、明晰化；建立多级政府贯通的虚实结合的政务服务平台，并以此带动其他相关改革，提升政府整体效能。推行行政审批的“一表式”申请，将线下服务与线上办理、“一窗式”受理与“一屏式”提供有机结合，配套建立布局合理的自助服务终端，打通本行政区域的辖制、层级和权属界线，为行政审批相对人提供服务无界限、受理无缝隙、标准无差异的均等化“一门式”政务服务，以公众的获得感优化政府形象、营造优良的施政环境。有了统一的跨部门平台、数据库和通用系统的支持，行政审批的信息共享、结果互认和协同运作就有了保障，对自然人事务就可形成“网上大厅办事为主、自助终端办事为辅、实体大厅办事为补”的服务格局，体现整体政府要求的互联网政务服务就呼之欲出。

（二）全覆盖的虚拟私人空间

按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分类，为行政相对人建立专属的虚拟私人空间，标志着电子政务由信息技术推广和办公自动化的普及阶段，经过监管手段和业务拓展的推进阶段，进入到了满足公众需求的引导阶段。如果说电子政务之前是以公务员为核心，进入服务引导阶段，就要把电子政务的重点转为服务社会，即要使公众成为电子化的政务服务的使用主体，这首先是观念和思维模式的转变。以居民身份证号、组织机构代码作为唯一身份识别和信息索引，辅以手机识别，推行网上办事实名制，解决身份认证、关系信任和网上申报三大问题；对“市民”和“企业”两类主体，通过信息逻辑关联和数据沉淀集中自动获取与自己相关的数据信息，

基于互联网“我的空间”集合主体资料、办事结果、诚信信息、政策动态、材料资源、关联定制等“私人数据资产”，建立“我”与其他社会主体可信赖的网络契约。对数据库中的信息项，审批部门在办理业务中可以自动提取、智能推送，申请人无需重复举证，所谓“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互联网下的政务服务虚拟与现实融为一体，正变得愈加真实、可感有温度。

（三）政务数据的社会化应用

行政审批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晴雨表，是公共管理状况最为集中的体现。政务服务数据是审批部门与申请人依法互动形成的政府数据，既具有涉及面广、个体广泛、内容丰富的特征，又具有指向清晰、针对性强和数据视角多元、便于分类整理的特点，社会化应用的前景极佳^①。要以社会公众为导向，将规范内部管理与优化对外服务相结合，将促进政府职能转变与促进社会主体多元参与相结合，将提升行政效能与追求善治目标相结合，在实施政务服务数据开放中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政务服务数据开放必须坚持公益性原则，但也要区分不同类型数据的不同特征，避免无差别数据开放导致的信

息失控。为保障数据开放的社会化应用效果，要依据政务服务数据资源的目录体系采取分级开放的策略，防止政务服务数据的泛化提供和滥化使用，确保数据开放的应用质量和社会效益。为此，政务服务数据资源的开放应整体组织、系统实施，适度加工以提高数据质量和可应用性，“一站式”政务服务中心需要承担起相应的主体责任。

政府改革切入点和方式的选择，与职能转变的目标、体制机制的创新彼此相关、相互作用，需要有机统筹。政务服务治理变革涉及政府公共管理的核心职能，关系政府与社会公众界面的功能重塑和提升，对政府其他改革会产生巨大的牵引作用，属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中的关键性改革。鉴于政务服务的专属性和公共性，政务服务中心的集成性和创新性，互联网的开放性和联结性，三者与实践层面的融合推进，将促成新的政府改革大格局的形成，顺应了现代政府的发展趋势，即在实践层面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政府问题。

艾琳、王刚：《行政审批数据资源开放的实践思考——基于“一站式”政务服务的数据治理》，《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二期。

The Pattern of Government Service Management and the Choice of Governance

Ai Lin, Wang Gang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the people's Government of Shenzhen, Shenzhen 518023)

Abstract: The character of the administration service center has decided that the innovation of management, operation and services are governmental levels, which possesses the characteristic of integrity, systematicness and relevancy. Therefore, it will overcome the administrative approval system, turn to be the most valuable part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and structural reform of administration. With the widespread us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or administrative service in centralized management, department operation and client orientation, the changes on the system and the mechanism of the administration service center are being accelerated. It is aimed to identify the operation mechanisms and determined strategies for different governing models based on the internet.

Keywords: Administration service, E-gov, Management Innovation, Mode Orientation

(收稿日期：2019-11-30 责任编辑：垠喜)

【博士视点】

浙江发展对外文化贸易新路径

查志强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研究所, 浙江 杭州 310007)

[摘要] “一带一路”给浙江发展对外文化贸易带来重大机遇。文章结合对浙江对外文化贸易发展业绩和主要特色的分析,提出了拓展人文交流、推进合作平台、加快体制创新等发展路径,以及以推进市场拓展、品牌培育、产业扶持、试点城市改革创新、环境优化等五大工程为主要内容的工作举措。

[关键词] 浙江 对外文化贸易 路径 举措

[中图分类号] G114, F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17)01-0106-04

[基金项目] 浙江省社科规划项目(16LLXC005YB)。

[作者简介] 查志强(1973—),浙江杭州人,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城市与区域经济,国际经济与贸易。

一、浙江省对外文化贸易发展的基础

2015年全省文化服务进出口总额5.03亿美元,同比增长15.10%,占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的1.14%,占比持续增加。主要集中在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广播影视服务,占出口总额近80%,影视剧出口逐步加大,浙江影视文化产品已逐渐为发达国家受众所接纳。目标市场方面,2015年浙江文化服务出口至新兴市场拓展加速,位列目标市场第六至第十位的分别是韩国、吉尔吉斯斯坦、意大利、泰国和法国等新兴市场。2016年上半年,美洲(美国)、亚洲(中国香港)、非洲(阿尔及利亚)成为浙江文化服务的重点出口市场,占比近半。2015年,杭州继续领跑全省文化服务贸易出口,占全省文化服务出口的48.77%,比重下降近30%。2015年全省新增文化“走出去”项目3个,浙江画之都、杭州夏天岛、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等企业分别在美国、日本、法国、德国成立了分公司,投资总额超过300万美元。

浙江线上线下结合开拓市场成效显著。2015年全省组织文化企业参加文化类线下论坛展会活动6场,分别为法国戛纳电视节(春秋两季)、日本东京游戏展、亚洲电视论坛、美国E3游戏节和中国国际动漫产业合作(品牌)授权洽谈会。38家浙江文化企业参加展会,现场成交意向近3000万美元。文化出口领军企业不断增多,2015年浙江省出台了《文化出口重点企业项目管理办法》,并认定了2015-2016省级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和项目92个;杭州、绍兴、丽水等市的文化贸易试点城市工作扎实推进。借助第十一届中国国际动漫节举办之机,136家动漫、影视、游戏企业的279个境内外知名品牌形象参加了第二届中国国际动漫产业合作(品牌)授权洽谈会,意向成交金额在8000万元(人民币)以上,有力推动了浙江文化企业产品、服务品牌培育

和产业升级。

二、“一带一路”给浙江发展对外文化贸易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一带一路”沿线有44亿人口，经济容量约为21万亿美元，分别占全球的63%和29%。浙江与东南亚、中亚、中东欧的经济联系十分密切，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在对外文化贸易领域的合作潜力巨大，合作空间也十分广阔。通过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可有力促进浙江与沿线国家在文化产品和服务贸易领域的互联互通，提升浙江的文化产业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有助于浙江调整和优化对外文化贸易结构，推动对外贸易方式转变。

浙江文化产品和服务进出口的主要对象是美、日、韩、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等，与“一带一路”国家的文化贸易额偏低，与其中一些国家的文化贸易几为空白，显示出极大的贸易空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属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处于经济发展上升期，拥有丰富的文化底蕴与人力资源，对文化消费的需求日益增长，但面临资金、技术与人才瓶颈，互利合作前景广阔。这无疑是浙江拓展文化贸易伙伴、扩大地域辐射、扩大开放空间的历史机遇。

经过多年的努力，浙江已形成一批富有浙江特色、具有国际影响的文化产品。但大多为传统单一的劳动密集型内容，高科技影视、网络视听知识、动漫游戏等科技含量较高的文化服务产品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历史传统、宗教信仰、文化积淀、大众喜好和审美情趣各异，根据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特点加大研发力度，加快贸易方式转型，出口各具特色、为目标国家消费者喜爱的文化产品，让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消费者接受中国文化、接受浙江的文化产品，将成为浙江对外文化贸易产品内容创新的新机遇。

在看到机遇的同时，我们也应充分意识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在经济发展、硬件环境和文化认同方面的差异较大，部分国家间矛盾频发，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经济发展均衡性严重不足，基础设施标准不一，浙江文化企业“走出去”的风险防控面临较大压力。除上述共性问题外，我们还

需认识到，浙江虽具有较强的先发开放优势，但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也面临着一些挑战。

一是因全方位开放导致的浙江原有先发开放优势被逐步弱化的可能。“一带一路”战略格局下形成的沿海、沿江、沿边全方位开放，使得浙江作为开放前沿阵地之一的地位有被边缘化的可能，反而可能成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文化贸易中的后方腹地。

二是原有开放模式的路径依赖亟需重塑对外开放理念。原有开放模式对浙江经济的支撑趋于弱化，低端制造出口甚至成为打造浙江经济“升级版”的掣肘。“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在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同时，也将加剧沿线国家对国际市场份额的争夺，浙江传统文化产业发展将面临新的考验。

三是文化产业竞争力和企业“走出去”能力偏弱尚难应对全球竞争。浙江虽然经济实力较强，但是文化产业国际竞争优势尚不明显，文化创新能力仍有待加强，“走出去”规模与经济总量不协调；文化领域对外直接投资增速虽然较快，但投资方式主要集中于设立境外营销网络，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动力则相对不足。

四是文化企业对“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认知度仍有待提高。文化企业对沿线国家人口与资源状况、市场需求、风俗习惯、投资环境和法制建设等基本情况仍缺乏了解，也缺乏相应的信息获取和政策支持。

三、浙江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的新路径

（一）发展路径

1. 拓展人文交流，提升浙江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影响力

加强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友好城市建设。抓住“一带一路”战略机遇，扩大省内城市与沿线国家的友城合作，建立完善“一带一路”沿线战略支点城市的交往布局，基本建立友城之间的政府互访机制，建立与沿线国家驻沪总领事馆及相关政府机构的定期沟通机制，积极参加各种宣传推介本国经贸、投资和文化的交流活动，推进友城之间务实交流合作。

充分发挥社会机构、侨务侨智涉外资源。支持

行业协会、商会等机构以及浙江“走出去”企业在沿线相关国家设立商业代表处或联络处，定期与沿线国家对等机构联合举办经贸投资论坛或展销会等活动，协助双方企业开展对接。引导沿线国家重要侨商、新华侨华人和侨裔新生代积极参与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举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华侨华人座谈会、专题对接会、推介会，确定一批海外示范性侨团，当好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桥梁纽带。

2. 夯实合作平台，形成文化贸易发展沟通机制

搭建文化交流合作平台。加快构建友城人文交流圈，继续举办海上丝绸之路文化节，争取联合海上丝绸之路相关城市开展历史研究及学术研讨，密切人员往来。以各类国际化论坛为对接平台，依托义乌办好丝路城市国际化论坛、中非民间论坛、中国西亚—北非论坛等。

推进教育国际化发展。依托省内高校、职业技术学院，与沿线相关国家高校建立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领域合作关系，鼓励开设沿线国家小语种专业，发展国际合作办学，推动双边留学生交流及学者互访，采取有效措施扩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浙留学生数量。

加强文化旅游推介与合作。着力提升浙江的国际知名度。发挥文化的桥梁引领作用，加大浙江传统文化的对外宣传推介力度，打造一批体现浙江文化特色的文化精品项目，进一步拓展沿线国家的对外文化贸易市场。发挥大专院校、文化机构团体等作用，在沿线国家联合举办相关活动，传播富有浙江特色的中国文化，从而提高对沿线国家优秀人才到浙江经商、学习、创业的吸引力。引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明健康、特色鲜明、积淀深厚的文化项目，依托国际友城交流活动、柏林国际旅游交易会、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等会展平台，积极对外推介“诗画江南、山水浙江”的浙江特色旅游资源。打造一批富有浙江文化内涵的文化会展品牌，办好中国义乌国际旅游商品博览会和义乌文化产品交易会，共同开拓客源市场，联合打造国际精品旅游线路和旅游产品。引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旅游项目、品牌酒店和高端旅游人才，引导和鼓励浙江企业到沿线国家开发旅游资源和产品。

3. 加快体制创新，提高文化贸易发展水平

建设高端智库。依托省内研究机构 and 高校，建

设一批既熟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情况，并与其保持密切往来的新型智库，加强对沿线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研究，为浙江文化企业对接“一带一路”提供及时而专业的智力支撑。设立由知名专家学者、企业家组成的“一带一路”专家咨询组，负责为浙江文化企业“走出去”提供决策咨询。

立足项目支撑。项目应作为浙江文化企业切实融入“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支撑，通过项目出成效、出影响。设立重大文化“走出去”项目储备库，推进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投资研究，加强与国家部委、省级职能部门的沟通衔接，争取一批事关浙江长远发展的重大文化项目列入国家、省级重大项目储备库。注重项目实施推进，形成“谋划一批、实施一批、储备一批”的格局，实现可持续发展。

夯实政策支持。在充分调研和借鉴兄弟省市经验的基础上，调整出台适应“一带一路”战略的对外文化贸易扶持政策，加大财政资金对“一带一路”建设工作的投入。加强与国开行、进出口银行的合作，结合设立浙江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投资基金，与国家政策性基金捆绑使用，为重大文化贸易项目和相关企业“走出去”提供金融支撑。用好国家金融政策工具，加强与中信保等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合作，为文化“走出去”企业解决融资难，并提供规避风险的重要支持。

创新发展机制。顺应文化企业“走出去”需求，积极打造投资便利化的制度环境，为有序稳妥地扩大开放提供制度保障。简化审批事项和手续，推进境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加快建立“负面清单”投资管理制度，完善服务文化企业“走出去”的信息咨询、金融支持、外汇管理、风险防范、人才培养、外事服务等支撑体系。深化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完善文化企业境外投资的政策支持。

强化服务保障。加强对浙江文化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工作的宣传力度，激发文化企业参与热情。加强对文化企业的信息供给和政策咨询，针对文化企业“走出去”的实际情况及未来参与可能，根据沿线不同国家的发展水平、文化背景和政策环境，对不同类型文化企业进行分类指导。建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险防控机制和工作体系，为文化企业提供风险信息发布、预警、跟踪、处置指导

和后期服务风险防范,保障“走出去”企业和项目的合法权益。积极推进人员“走出去”便利化,创新全球化背景下文化“走出去”企业和人员的服务新模式。

(二) 工作举措

拓展对外文化贸易市场。努力培育并鼓励引导企业参与线上线下文化服贸对接交易平台,为文化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开辟更多更广的渠道。积极推进线上文化交易平台(Mega Media)建设,加大对文化服务出口企业扶持力度,在政策扶持及便利化等方面加大部门协调力度,确保平台效应发挥。积极开拓新兴市场,组织和帮助更多文化服务出口企业利用线上文化交易平台走出国门。积极推进服务贸易国际交流合作,搭建线下对接平台。组织省内文化企业参加线下对接交易平台,进一步加大力度鼓励省内文化企业参加戛纳国际电视节等境内外优质服务贸易展会,力争在参展企业、参展面积、结识客户、参展成效方面取得显著提升。

培育对外文化贸易品牌。加大对已获认定的国家、省级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的支持力度,组织参加相关文化品牌对接会,通过与境外文化服务类品牌商的合作,提升浙江文化企业的品牌意识和品牌建设能力,继而推进浙江文化品牌“走出去”。

加大对外文化贸易产业力度。按照国务院关于

促进文化服务的要求,结合浙江实际认定一批对外文化贸易基地园区,夯实文化服务贸易发展产业基础,切实提升对外文化贸易基地在全省文化服务贸易出口中的比重。

创新文化服务贸易试点城市改革。作为在国内首个推出“文化服务”改革试点城市的省份,需遵循“扩量提质固基”原则,在省级层面加快制定考核评价体系并辅之以相应的政策支持,切实检验改革创新成果。

优化对外文化贸易发展环境。加强对外文化贸易工作宣传力度,优化政策环境,用足用好现有文化服务贸易扶持资金,健全完善适合浙江对外文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支撑体系。扩大统计对象,推进文化服务贸易监测点建设,完善文化服务贸易统计监测分析体系。

[参考文献]

- [1]肖琳.海陆统筹推进,构建“一带一路”[J].太平洋学报,2014(2),103-104.
- [2]夏阳.“一带一路”孕育服务贸易新机遇[N].国际商报,2016-6-3.
- [3]花建.“一带一路”战略下增强我国对外文化贸易新优势的思考[J].中国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5(4),14-21.
- [4]唐月民.“一带一路”战略下我国对外文化贸易格局的新变化及路径选择[J].文化产业研究,2016(1),152-163.

On the New Path of Zhejiang's International Cultural Trade Development

Zha Zhiqiang

(Institute of Regional Economics, Zhejia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Hangzhou 310007)

Abstract: “One Belt and One Road” strategy provides new opportunities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trade in Zhejiang.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chievements and features of Zhejiang's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trade, puts forward some development paths such as expanding cultural exchanges, promoting cooperation platform, speeding up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Furthermore, some work measures are proposed, such as promoting market development, cultivating brands, supporting industry, innovation of pilot cities and optimizing the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Keywords: Zhejiang, International Cultural Trade, Path, Measure

(收稿日期:2016-11-30 责任编辑:廖令鹏)

【博士视点】

粤港澳经济圈OEM企业转型建议

张滨，刘小军，李永健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广东 珠海 519041)

[摘要] 本文通过GDP总值数据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状况，基于粤港澳经济圈原始设备制造商(OEM)企业的经济地位和现状，总结了“一带一路”给OEM企业转型带来的机遇，针对粤港澳经济圈OEM企业面临的问题，对OEM企业转型升级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 “一带一路” OEM OEM企业的转型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17)01-0110-03

[基金项目] 广东省教育厅2015广东高校重大科研项目——青年创新人才类项目“‘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粤港澳物流协作创新发展研究”(2015WQNCX174)。

[作者简介] 张滨(1965—)，天津人，吉林大学珠海学院物流管理与工程系主任，教授，研究方向：物流与供应链管理；刘小军(1984—)，陕西韩城人，吉林大学珠海学院物流管理与工程系主任助理，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物流与供应链管理创新、供应链信息系统、“一带一路”跨境物流协作；李永健(1985—)，广东汕尾人，吉林大学珠海学院物流管理与工程系实验室主任，研究方向：物流工程。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对粤港澳经济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粤港澳地区原始设备制造商(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 OEM)企业更应该抓住这个战略契机，把握机遇，助力粤港澳地区众多OEM企业完成转型。

一、粤港澳经济圈OEM企业面临的问题

1. 生产要素成本不断上升。近年来粤港澳OEM企业面临生产成本不断上升的压力。中西部地区经济不断发展，粤港澳劳动力不断向中西部地区流动，加上中国进入人口老龄化，新增的廉价劳动力逐渐减少，因此，粤港澳OEM制造企业劳动力需求和市场供给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劳动用工供不

应求已成为劳动力成本上升的主要市场因素；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2010~2015年以来广东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不断上涨，对于需要以大量的固定资产为支撑的OEM企业来说，其固定资产成本也随之上升；在汇率方面，2010~2015年人民币对主要外币都有不同程度的升值，人民币汇率的上升加重了粤港澳经济圈OEM企业出口的负担；在环境方面，政府出台《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来促进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OEM企业粗放式的生产制造带来的环保成本不断上升。

2. OEM制造低端微利且依赖程度高。粤港澳大多数OEM企业处在全球价值链的最低端，进行劳动密集型制造和装配，生产制造附加价值低且利润微薄。品牌、技术和销售渠道完全由委托方控制，

导致市场能力严重缺乏，对委托方依赖程度高。OEM企业微薄的利润经不起要素成本的上升，承受不住市场急剧变化的冲击。经济衰退使买家将业务从边际生产者转向核心生产者，促使不少高度依赖制造的供应商失业；国际消费者需求下降，使得发展中国家大量体系脆弱的生产商倒闭。在金融危机期间，经济疲软导致全球经济需求下降，国际订单也随之减少。因此，对外依存度高的广东OEM企业经营面临危机，劳动力密集型工厂倒闭数量不断增多。

3. 同质化竞争严重。OEM制造企业同质化严重，恶性竞争使全行业的整体利益受到损害。中国代工生产的技术含量低，可替代性强，无论在国际代工市场还是国内代工市场都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并且出口价格随着OEM企业的增加而持续下降，不断接近制造成本底线，很大程度上就是基于竞争的原因。如果这种情况长期得不到改善，将会导致代工企业利润趋向于零。当订单需求相对稳定，而OEM代工企业数量不断增长，则会出现供过于求的现象。

4. 国际制造市场变化导致订单减少。粤港澳OEM企业不仅生产要素成本持续上升，还要面对以东南亚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代工市场的崛起，和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带来的冲击。东南亚不仅经济正快速发展，制造技术水平逐渐提高，而且具有廉价的劳动力、原材料、土地等要素低价格和优惠政策等优势。人口红利已不再是中国OEM制造的优势了。跨国OEM委托方为了寻求利益最大化，会把目光转向全球范围内的代工市场，转向与加工制造成本更为低廉的OEM制造商合作，大量的OEM订单流向东南亚等地区。与此同时，欧美发达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来实施“再工业化”战略。许多发达国家减少甚至取消在华的OEM订单，在国际市场的剧烈变化、OEM订单减少且不稳定的情况下，缺乏核心竞争力和品牌的粤港澳OEM企业有被替代的风险。

5. OEM企业出口贸易遭遇多重壁垒。欧美等发达国家借助技术壁垒提高我国企业产品输入的门槛，削弱我国OEM制造企业的低成本竞争优势。此外，随着发达国家对绿色标准的重视，其质量环境认证等贸易壁垒对我国产品出口造成很大的制约。粤港澳经济圈众多OEM企业属于中小型民营企业，

存在规模小、技术含量和生产经营管理粗放等问题，对出口贸易壁垒处理能力不强，易受到环境政策等外部因素的冲击。

二、粤港澳经济圈 OEM企业转型升级建议

1. 借助“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走出去。广东港口众多，粤港澳地区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排头兵。粤港澳地区要利用优势，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创新贸易合作，加快OEM企业转型升级，借助“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走出去。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合作伙伴不仅只有东盟，它还将南亚、西亚、北非、欧洲等各大经济板块串连起来，可以给粤港澳经济圈OEM企业带来以点带线，以线带面的发展机遇。粤港澳经济圈的OEM企业还可利用自身在国际上具有较强的实力、特色，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重要载体，以港口为推力，先带动较具实力的家电制造、运输装备制造、家具等产业先转型升级，后带动其他产业。

2. 以跨境电子商务推动转型升级。OEM企业转型升级为OBM与ODM，需要寻找到新的发展点与品牌运作模式，让自主品牌在全球站稳脚步。新兴的跨境电子商务贸易模式利用大数据分析寻找更加适合的品牌建设与运作模式，可以减少传统贸易所带来的多层次操作，提高通关效率。跨境电子商务能够推动“中国制造”成为“中国品牌”，给予粤港澳经济圈OEM企业转型升级为OBM与ODM更加高效、高质量的转变模式。

3. 借助自贸试验区便利化的贸易政策，促进OEM企业转型升级。广东已有广州南沙自贸区、深圳蛇口自贸区、珠海横琴自贸区，正在深入推进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强化粤港澳国际贸易功能集成，推进贸易发展方式转变，为粤港澳经济圈OEM企业加快转型升级的步伐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自贸试验区是探索更为开放和更加便利的贸易先行试点，可以加快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推进“一站式作业”，推动“三互”大通关，即监管互认、执法互助和信息互换以及发展跨境贸易电子商务。粤港澳经济圈OEM企业需要抓住自贸区所带来的好机遇，借助自贸试验区高效率、高质量的便利化贸易政策减轻进出口环节的成本负担，推动加工

贸易产品“全国行”、“全球行”，尽快实现转型升级。

4.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理选择转型升级模式。OEM企业的转型升级需要适合不同情况的国家发展形势进行转变，因此，粤港澳经济圈OEM企业需要在“一带一路”战略下合理选择与沿线国家的转型升级模式。利用好自身不断增强的技术、科技、资金等方面的优势转型升级为ODM模式，更加注重在产品设计方面增强利润空间。促进OEM企业由低端向高端发展；延长产业链，与互联网融合，与智能化生产制造融合，向生产制造与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转变，提升产品优势。可以将生产基地向东南亚国家转移，继续承接跨国公司的代工生产；也可以承接跨国公司的代工生产直接转移给东南亚国家的代工厂；最重要是的粤港澳经济圈OEM企业需

要开始从研发设计与营销着手，寻求全球的市场需要，自建品牌，向OBM模式转型升级。

[参考文献]

- [1]龚雯, 田俊荣, 王珂.新丝路: 通向共同繁荣[N].人民日报, 2014-06-30(1).
- [2]胡娟红. 珠三角产业转型升级的动因及路径研究[D]. 暨南大学, 2014.
- [3]张逸群. 国际代工企业: 从OEM到ODM, OBM[D]. 华东师范大学, 2010.
- [4]李燕平. 低碳经济背景下广东省民营企业转型升级研究[D]. 广东商学院, 2013.
- [5]蔡春林. 广东自贸区建设的基本思路和建议[J]. 国际贸易, 2015(1): 15-21.
- [6]王晓萍, 胡峰. 中国代工制造业向东南亚转移的驱动机制研究[J]. 国际贸易论坛, 2014(3):73-76.

Suggestions on Transformation of OEM Enterprises in Guangdong – Hong Kong – Macau Economic Circle

Zhang Bin, Liu Xiaojun, Li Yongjian

(Zhuhai College of Jilin University, Zhuhai 519041)

Abstract: According to "One Belt One Road" strategy, the article is analyzed its operation on 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 (OEM) Enterprises' Transformation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u economic circles. Firstly, the article analysis the economic situation of the countries along "One Belt One Road" through the total GDP data, and study of Hong Kong and Macao economic circle OEM enterprise value. Secondly, based on the domestic some scholars study on Transformation of OEM enterprises and Hong Kong and Macao economic circle OEM enterprise's economic status and the present situation, the article summed up the "The Belt and Road to OEM business transformation opportunities.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u economic circle OEM enterprise issues,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OEM enterprise transformation are put forwarded.

Key words: "One Belt One Road" Strategy, OEM, Transformation of OEM eEnterprise

(收稿日期: 2017-01-12 责任编辑: 靳叶)